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 月刊 ·
1985
三月號
總 21 期

本刊專訪國內民運戰士黃迪

北京高幹子弟
座談大揭內幕

胡耀邦前途難保

— 鄧小平 權力轉移形勢總分析

● 鄧小平突起「退意」 ● 解放軍面臨新問題

內幕

K字樓

北京監獄內幕

香港維多利亞監獄見聞

中國外幣黑市：\$ 1.00—8.00 人民幣



專題

論文革

文革給中國走向 多元化創造契機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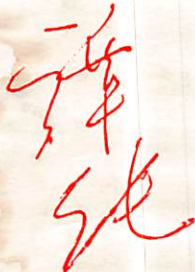
● 徵文啟事 ●

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兩周年紀念日。中國之春堅持了兩年，近幾期愈辦愈好，對中國政局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了支持中國之春雜誌，鼓勵各界人士踴躍投稿，愛護這棵民主幼苗，我準備捐助貳仟美元做為獎金，獎勵自第二十期至第二十六期即將發表的優秀文章。獎金為：一等獎——壹仟美元；二等獎——陸佰美元；三等獎——肆佰美元（此外，編輯部將另付正常稿酬。）

評獎的辦法為：編輯部發出調查信，在廣泛徵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由編輯部作出決定。徵文的要求如下：

- 1 文章內容與中國民主前途有關；體裁（論述、報導、文藝作品）不限；
 - 2 文章要力求有新的創意。
 - 3 徵文截稿日期為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
- 敬請大家踴躍投稿。

加拿大溫哥華僑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售地於民

——農業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

今年，中國的改革風從農村吹到城市，人們的注意力也移向城市。然而，農業的問題真正解決了嗎？農村的改革可以就此止步了嗎？中國聯國內的同志最近在農村做了一些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土地的所有權。這個關鍵性問題不解決，農業就不能進一步發展，最終，工業的起飛也將被農業發展的停滯拖住後腿。

人民公社時期，做為農民的基本權力——土地的所有權、耕作權和產品支配權，均被剝奪。結果，農業被徹底搞垮了。

鄧小平實行包產到戶政策後，農民獲得了土地耕作權和產品支配權，農業的局面有了好轉。但是，農民仍然沒有土地的所有權。當前，農民處境是：他們相當於佃農的地位，向共產黨政府——全國唯一的地主——租用土地，然後，交上租子，自己支配剩餘的產品。按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號文件的規定，農民租用土地的期限暫為卅年。

實踐表明，農民的自主權多一分，農業就發展一步。共產黨對農業少管一分，農村的形勢就好轉一步。然而，由於共產黨政府還控制着農業最大的權力——土地的所有權，農業的發展很快近於飽和。

不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包產到戶政策，將農村土地分得支離破碎，其分散程度甚至超

過土改之前。在農民無權買賣土地的情況下，種田能手不能獲得大量土地進行耕作，生意能手也不能轉手土地而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由於土地不屬於農民自己，農民總有一種「臨時感」，因此，不注重保養土壤，土質有越來越差的可能。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土地得不到相對集中，就無實現農業機械化。不實行機械化，大批勞動力就無法解放出來從事工商業。

我們主張，為突破上述瓶頸，應該將土地的所有權歸還給農民，這是農業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將土地的所有權交給農民的方式有兩種：或是分給農民；或是賣給農民。白白分給農民，共產黨可能不會甘心，那麼，可考慮售地於民。

將土地賣給農民，而不是像當前這樣租給農民，政府和農民都會獲得好處。

其一，政府可以獲得大批資金，用於四化。
其二，農民買得土地，可獲得安全感。
其三，農民獲土地所有權後，可進行土地的自由買賣。政府從土地買賣中抽取稅收，進一步獲利。

其四，土地向耕種能手集中，為未來機械化做好準備。農田集中後對農業機械的渴求將大大刺激工業的發展。

其五，農民中辦工業、辦商業及其它第三產業的能手，可將土地轉賣獲得資金，充分發

揮他們的特長。

當然，售地於民、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也會引起若干問題。但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而應採取預防措施，將副作用盡量減低。我們初步想到的一些可能出現的問題有：

第一，有些農民目前買不起自己向政府所租賃的那份土地，為克服這一問題，政府可採取分期付款政策，農民亦可以將正在分期付款的土地轉賣給他人。另外，售地於民的政策一定要靈活，應允許有些農民不願意購買土地，只願意租用土地。

第二，為限制超級地主的出現，政府應制訂相應的稅收政策。例如，可以規定，擁有土地愈多的人，購買土地的稅愈高，上交的所得稅也愈高等等。

第三，對於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政府應利用稅收的資金設立必要的福利機構加以解決。農業發展的規律應該是：個體戶（小農經濟）——專業戶（土地逐漸向耕種能手集中，非耕種能手改從事其他職業）——農場主（土地集中，機械化的大農業）。如果不將土地的所有權歸還給農民，不敢邁出這勢在必行的關鍵一步，農業就不會獲得進一步的飛速發展，其命運必將猶如籠中的小鳥一樣，既不會死亡，也不會健壯。

我們崇尚社會主義平等原則，但這種平等，并非物質分配的絕對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是報償按能力高低和勞動多少而付出的產品分配的絕對平等，最終就會出現大家都是乞丐的現象，因為，在世界上，只有乞丐之間最為平等。

售地於民，勢在必行！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二十一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五年三月號總二十一期目錄

社論

3 ❖ 售地於民 —— 農業改革勢在必行的一步

封面文章

6 ❖ 如何使群丑圖不再出現 (本刊編輯部)

讀者來信

7 ❖ 中國政治也來點改革好嗎? · 「小平您好」疑雲得解 ·

國歌二三事 · 「故國的來信」讀後 · 中國總要有人出來說話 ·

中國之春應有更深廣的內容 · 我一直在尋找時代的語言 ·

國旗應改 但非其時 · 文壇「宗師」「隱居」壇外 ·

為看中春 費盡心思 · (大陸旅美學界 劉世才等)

向海峽兩岸建言

10 ❖ 從美日電腦在歐洲市場的優勢簡談中國資訊工業的發展

(美國華裔工程師 楊雲)

13 ❖ 「我們飯店不打顧客」

—— 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 (北京) 董旭生

14 ❖ 回國講學後記與訪問觀感(上) (美國華裔工程師 陳寒梅)

民運報導

19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22 ❖ 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信

國內快訊

23 ❖ 鄧小平突起「退意」 (北京) 柳平

24 ❖ 特異功能「救」葉帥 (北京) 柳平

25 ❖ 解放軍面臨的新問題 (國內) 楚青原

27 ❖ 城市改革弦外曲 (中國大陸留學生) 呂東萱

28 ❖ 北京青年的「三熱」 (中國大陸留學生) 呂東萱

29 ❖ 可怕的一比八 (中國大陸留學生) 黎玉瓊

30 ❖ 杭州——波士頓的姊妹夢 (中國大陸留學生) 齊曉楓

31 ❖ 國內新流行的兩個順口溜 (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徐克平

編者的話

本期專題是討論文革。幾篇論文從不同的角度對文革的起因、文革暴露的問題及文革的後果進行了探討。大家不妨對照一下最近人民日報評論文革的一系列文章進行閱讀。經過比較，才能鑒別出民主派與改良派之間的差別。

正值排版時，本刊接到中國民聯北京柳平小組的高幹子弟座談會紀要，對當前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權力交接的形勢問題，有全面而精彩的分析，值得仔細研讀。

原擬對人民日報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污蔑中國之春的文章進行反駁，因未準備充分，計劃予以推遲。

下期預告

本刊最近收到大批討論文革的精彩文章，廿一期只能刊登少許，更高水準的論文將於廿二期刊出。像文革這麼大的課題，我們認為以兩期較大篇幅進行專題討論是值得的，而且還要長期討論下去。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引起世界矚目。本刊下期將推出另一專題：「中國在走資嗎？」，對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改革進行研討。

下期還將刊完北京部份高幹子弟座談會紀要，下半部份的主題是：「鄧小平辭世後中國政局之演變」。

● 本期專題 ● 談文革

32 歷史的關鍵性轉折

——文革給中國走向多元社會開啓契機（中國大陸留學生）王驚蟄

47 本刊專訪國內傑出民運戰士黃迪談文革（本刊特邀記者）左拾遺

51 鄧小平為什麼全面否定文革（中國大陸留學生）李奕秦

54 文革——毛澤東帝王思想的產物（中國大陸旅港作家）孟 歌

●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

61 胡耀邦前途難保（北京柳平小組整理）

——北京部份高幹子弟座談鄧小平權力轉移之形勢（第一部份）

● 特 稿 ●

68 K字樓——北京市公安局第七處拘留所內幕（香港）澹 淇

74 被捕「偷渡客」的獄中生活

——記香港關押非法入境者的維多利亞監獄（香港）晨星明

● 思想論壇 ●

78 中國民運的客觀基礎及應有的主觀努力（加拿大）董令狐

79 不要「大民主」，要真民主（大陸新移民）嚴 瑛

80 廿一世紀的中國（台灣）張 望

● 留學生園地 ●

82 中國科學界不科學的鑒定會（中國大陸留加研究生）劉田剛

84 外行領導亂拜洋師傅（中國大陸訪問學者）余 力

● 香港專欄 ●

86 香港人民的福祉 應由香港人民自決（香港）公洪芝

● 文藝園地 ●

87 畫像（小說）（香港大陸新移民）黃 流

94 胡總書記與韓文公（雜文）（中國大陸旅美作家）王亦合

95 政治笑話（國內）秦 恒

96 用遺傳學來解釋·聖人的聯想（雜文）（大陸新移民）雲中童

97 計劃生育與異化（雜文）（香港中學生）白逸鴻

如何使羣丑圖不再出現

本刊編輯部

封群丑圖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份文革最激烈時，由四人幫支持的北京「鬪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繪製的。圖中包括了當時被毛澤東打倒批鬥的黨政軍的主要人物，他們在文革前及文革初占據了當時黨中央的大部份重要職務。這批幫助毛澤東打江山的人，到頭來都被毛澤東整倒，有的還被毛澤東整死。如今，他們都被平反了，活着的幾位都重掌了實權，反把參加整肅他們的四人幫送進了監獄。

我們希望文革時成為階下囚的鄧小平、胡耀邦和當前成為階下囚的四人幫，都重溫一下這張群丑圖。為了使這種場面不再重演，為了使今天在台上耀武揚威的人明天不再變為階下囚，中國只有走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道路。我們希望我國的領導人能從這張群丑圖中明白一條淺顯的道理：掌權人尊重、保護反對派，也就等於尊重、保護了自己；只有建立政治上文明而平等的競爭制度——民主制度，才能防止政治家輪流成為階下囚的悲慘結局。

為便於讀者理解此張群丑圖，我們將圖中的人物（從前至後）及某些事件略作簡介如下，凡人物職稱均為該人倒台時最高職務。

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後補委員。他曾批評大學毛澤東思想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毛澤東一怒之下，斥中宣部為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陸定一在文革中坐牢多年。

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因寫「海瑞罷官

」，為彭德懷翻案，觸怒毛澤東，在文革中被整死。

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曾宣傳「有鬼無害論」，坐牢多年。

鄧拓：北京市委書記，曾著有影射毛澤東的「燕山夜話」，被整得自殺身死。鄧、廖、吳三人曾組成「三家村」，合寫雜文，評論時事，被毛澤東斥為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

夏衍：文化部副部長，宣傳卅年代文藝，差點被整死。

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被毛澤東、江青斥為宣傳「王明路線」、「反對魯迅」，遭殘酷鬥爭。

田漢：全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曾寫鬼戲「謝瑶環」，被整死。

陽翰笙：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田、周、夏四人曾在卅年代被魯迅斥為「四條漢子」。

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

齊燕銘：國務院秘書長，文化部副部長。以上十人為群丑圖先鋒，因為他們都是做輿論工作的，毛澤東曾認為他們：「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陸平：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校長。

嚴慰冰：陸定一的妻子，被逮捕下獄。

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被關押後，下放陝西勞改多年。一九六六年二月份曾制訂「二月提綱」，對抗文革。

劉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副市長，被整死。

鄭天翔：北京市委書記，被批鬥多年。蔣南翔：高等教育部部長，宣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被關押。

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被毛澤東指責為特務逮捕下獄。

羅瑞卿：解放軍總參謀長，被指責為攻擊林彪，遭受批鬥。羅跳樓自殺未遂，腿被摔斷。

蕭向榮：國防部辦公廳主任。

梁必業：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陳鶴橋：昆明軍區司令員。以上三人均被斥為羅瑞卿死黨而遭受整肅。

王光美：劉少奇夫人。

賀龍：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元帥，被活活整死。

劉少奇：國家主席，被整死。

薄一波：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

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林楓：中央高級黨校校長。

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

萬里：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

劉志堅：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呂正操：鐵道部長。

何長工：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陶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被江青指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後被整死。

蕭望東：文化部代部長。

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錢信忠：衛生部長。從薄一波至錢信忠，都被打成劉鄧黑司令部幹將，遭受批鬥和關押。

來信 摘編



中國政治也來點改革好嗎？

編輯先生：

我很有興趣地讀了貴刊最近幾期的「國內快訊」部份。雖然是「小道消息」式的，但正像蘇聯的政治笑話似的，誰又能說中國的小道消息不是人民在被剝奪了「知」的權利的情况下的一種反抗形式呢？「快訊」中關於鄧小平急於交班、胡耀邦趙紫陽改革派正在接權的報導與目前國內官方專論走向是一致的。交權、接班這樣一些封建氣味十足的東西，在中國已是見怪不怪了。善良的人們往往因為統治集團中某些與人民現實利益相平行的一些舉動，而忘記了這個政權的實質上的封建性落後性以及長遠的不穩定性。我希望看到的是，隨着現在

推行的經濟政策，中國的政治也來一點變化，就像國內有人說的：「咱們底下承包了，上頭怎麼不承包？」國務院也來個承包，經過幾年，搞成個什麼樣子，立下「軍令狀」，幹不好自己下來，另選能人。來個競爭，好不好？

大陸旅美學者

劉世才於紐約長島
一九八五年元月份

「小平您好」疑雲得解

編輯先生：

此地也有過關於「小平您好」的報導，可以說是一片頌揚聲。我當時非常懷疑，甚至不相信真正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聲。但因缺乏依據，不好加以評論。讀了貴刊十二月號後，解開了一個大疙瘩。但更使我感到擴大宣傳的重要性。為此，我有個建議，請允許我將貴刊上一些文章譯成法文，在此地報刊上發表。我當然註明文章出處和原作者姓名。如果你們同意，請回信為盼。

祝

編安

鄭金恩於瑞士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

國歌二三事

編輯先生：

拜讀「中國之春」兩則有關中國國歌起源的報導，令我也對這個「小問題」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

雖然這個小問題不屬「民運」的範圍，但畢竟是關係到我們中國近代史的事。我認為大家也不妨研究一下，不要把自己的民族歷史含糊處之。

以下是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姑且報導如下：

約在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隊迫近廣東之際，我們家鄉由青少年自動自發組成了很多自衛兵。這些小兵哥都是我同村的堂兄們，他們用竹枝與桑枝，扛在肩膀上，由年長一些的當教練，口中叫着「左右左」，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日以繼夜地操練。

到日軍攻陷廣州市時，他們之中真有五六個人投軍抗敵去了。勝利復員，可憐只得一個堂兄生還。他百戰不死，當了個小營長，為陳誠部下。

解放後，堂兄被安排在農村養豬。

去年我回國探親，跟這位堂兄談起他們當年投軍報國的事。我問他：「那時候你們操兵唱義勇軍進行曲時，有沒有人對你們灌輸共產黨的思想？」

他搖搖頭說：「沒有。」

我再問：「你們當時是國民黨的軍，為什麼後來義勇軍進行曲會變成共產黨的專利品進而成為國歌呢？」

他只對我含糊一笑。在中國大陸談國民黨是他們的大忌，難怪他不敢講話。

一九四三年。家鄉仍在日軍的蹂躪之下，我沒有辦法上學。為了滿足學習的心願，我常常拖雙木屐板，跑到一個老道學的家裏，看那個老人操琴和作畫。這個人是清末舉人，他雖然生活清苦，但很好心教導我這種失學的孩子

。他能彈能唱，還畫得一手好鉛粉畫。
他唱歌給我聽，他說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國歌。歌詞及譜如下：

5 1 2 1 5 . 3 3 2 4 2 3 2 2 5 1 2 5 . . .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還有另外一歌，歌詞十分沉痛，是這樣的：「香港割，琉球喪，越南朝鮮亡……」

因為事隔四十多年，我那時還是個失學的孩子，所能記憶的，僅此一點點，但我千萬萬確記得當時他寫的是簡譜，而且歌詞是一字不錯。

這是不是中國第一次的國歌，有待我們的近代史學家去證實了。

華僑王 俞敬上

二九八四年十二月

「故國的來信」讀後

編輯諸先生：

中國旅法作家張諄的文章（「中國之春」第十九期九十頁「故國的來信」），聲聲如泣，字字如訴，以一個女子的筆，構畫出我們這個民族中那種自傲而又自卑、凶惡而又虛弱、無知而又愚蠢的陰暗心理和可憎嘴臉。在他們看來，西方都是敵人，中國人出國就是不愛國，中國人只配作人家的奴隸，即使嫁了外國人也終將被拋棄。可也正是這些人，又要喊着「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我不知道這兩種嘴臉怎麼能夠統一。我想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受着別人的欺負，又去欺負更弱的人。挨了

別人的打，倒有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

我們災難深重的民族啊，是到了該清醒一下的時候了。此致

民主敬禮

大陸留學生

王家瑞於費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中國總要有人出來說話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

看到加拿大溫哥華僑商譚純以兩千美金作為基金，獎勵中國之春優秀文章的故事（本刊第十九期扉頁），一股暖流湧上心頭。「華僑是革命之母」，他們即使遠在天涯海角，也以華夏榮辱為懷，憂心國事。盼中華振興，人民康樂，區區之心，感人至切。

中國不是屬於哪個黨的。除了黨以外，還有十億人民在。中國總要有人出來說話！在國內沒有機會。出來了，就要珍惜時機和環境，對中國的事情作一番思考、對比、剖析、批判、集思廣益、切磋提高，為推動祖國的經濟進步實現民主法治，作思想準備，形成輿論壓力。我希望在「中國之春」上看到更多的有分析有見地的好文章，不辜負父老前輩的殷切期望。此致

大陸留學生

吳宏志於華盛頓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二日

中國之春應有更深廣的內容

編輯諸君：

建國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法制的路程，經過了曲折的道路，也留下了大量的問題需要研究整理。曹振元的「從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到中國之春（上）」——談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在理論上應做的反省」（中國之春第十八期）一文，我想作者是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切實工作的。文章以嚴謹踏實的學術眼光，考查了建國以來幾次重大行動的背景、呼聲、意義和局限性等等，工作細緻、評論客觀、脈絡清晰，讀來令人清醒。在談到「中國之春」運動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盡管她在形式上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時代，而在內容上却並沒有達到相應的深度和廣度。我想，這說明擺在「中國之春」面前的道路仍是漫長的。語言激烈了，並不一定道理就充足了，批評尖銳了，不一定就打到要害了。中共和中國之春都要受到歷史的公正評判。只有深思熟慮的、客觀切題的、立論踏實的主張，才會為讀者所信服，被歷史所認可，順請

大陸旅美學者

孟凡輝於加州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一直在尋找時代的語言

中春編輯同志們：

讀了最近幾期中春，發現她的水平正在顯著提升。很多高質量的文章來自大陸內部作者手筆，這豐富了雜誌，也顯示了組織的功力。但我想，除一批識途老馬，一般人恐難分辦其文章的份量。十七期「資本的凱旋」及幾篇總

結民運經驗的文章，看得出強烈的我們這一代人特有的時代背景。我若干年前從大陸出來後，也嚐試過辦雜誌，一直在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如今算是如願以償。從喧囂雜沓的「人民共和國」建國史中，把民運的發展經絡梳理出來，這樣的工作，唯大陸來的作者方可勝任。

寄上一百元，是我和太太捐給你們買影印機用的，滄海一粟，十分慚愧。

事業發軔之端，總是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但只要有心者多了，就會感動上帝的。這上帝，就是在海峽兩岸的對峙和競爭中所誘發的機緣。

中國共產黨正處於理論的精神分裂，此正是我們摧枯拉朽之時矣！

祝

新年好！

大陸新移民 方廣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

國旗應改 但非其時

編輯先生：

首先要恭賀「中國之春」的兩周年誕辰。在海外辦政論雜誌困難無比，中國之春不但渡過了兩年，而且越來越好。無論在編排及內容上都漸漸達到高度水準。希望它長命百歲，對中國的民主、法治貢獻力量。

最近兩期有人提出改變中國國旗的建議，此一建議甚佳，但却非其時。我認為改變中共及國民黨國旗是在國共進入和談時所談的條件之一，由兩黨談判及全國人民決定，假如中共現在改了，國民黨將來可能又提異議，說不定又要改一次。

貴刊中曾出現「洪荒」之名。不知洪荒先生知否台灣有位作家名字也叫「洪荒」？台灣之洪荒也在美國，前些時還讀到他發表在中國時報上的文章。假如筆名也有先後來後到，貴刊之洪荒似應改名，避免重覆。當然天下同名之人甚多，不改也無大關係，只是讀者無法分辨彼此而已。

敬祝

輯安

弟 王魯生敬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文壇「宗師」「隱居」壇外

編輯先生：

洪荒先生在「也從茅盾談起」(中國之春第十八期)一文中，以深沉的筆觸，讓我們看到了堪稱文壇「一代宗師」的茅公的寂寞的後三十年，他以空白換來了安寧。茅公與魯迅，曾同為三十年代「左翼的兩大台柱」。魯迅罵了一輩子國民黨，文章寫的也確實好，所以被共產黨捧到了天上。可是，魯迅要是跟以後的茅公比起來，還真是——恕我說句不中聽的話——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魯迅在最糟的時候，文章還能拿到日本去發表，再傳進中國來，所以我們今天才知道魯迅寫了些什麼。在中共統治下，你試一試！而他同時代同聲望的茅公在後三十年裡都想了些什麼，我們只能去猜了。

「諾貝爾文學獎」一類的世界榮譽什麼時候才會光顧到中國作家頭上？我想還要一段時間，因為在現在的中國，第一流的作家們(如茅公)是不會動筆的，即使寫了，也不會有入

給出版流傳的。現在活躍的不過是二、三流作家。想看到第一流的作品，要等到思想「鬆綁」以後能……。并頌

大陸旅美學者

高錦明於休斯敦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為看中春 費盡心思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

二年前，當我還在台灣的時候，就經由國民黨的宣傳系統中得知了你們這份雜誌，亦可說是有關「貴組織」的許多新聞。我本以為國民黨政府對貴刊如此之「親切」，理應不會禁止貴刊在島內的發行。但靜等了數月之後，也未見貴刊在台灣銷售，我方頓悟貴刊的中立立場並不見得受國民黨的歡迎。

離開台灣，最後在非洲安定了下來。在閒暇之時，我仍四處秘密地探尋你們的這份刊物。歷經千辛萬苦，我終於找到了一本中國之春，那是一九八四年元月份的。我興奮之極。看完後寫這封信給你，讓閣下知道，真有人爲了看你們的雜誌費盡心思，還得背負着一定的政治壓力。任何一份雜誌，若能換得如此讀者，那都是可賀的，對嗎？你們沒有浪費紙，也沒糟蹋文字。看完中春之後，我方認識了字的價值。

我打算長期地訂閱貴刊，請賜下訂閱單。我靜候回音。

一位台灣來的讀者

於非洲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從本期起，本刊開闢「向海峽兩岸建言」專欄，刊登有建設性意見的文章。中國之春是一個有理性的刊物，除對兩岸政府善意批評之外，也有分析和評論，更有建設性的建議。歡迎大家向本專欄投稿。

資訊工業（註一）的興起在人類文明上被譽為第三次重要的科學技術革命。第一次是工業革命，機器代替了傳統的人力；第二次是核能的發現與突破，為人類日益匱乏的能源帶來了曙光（註二）；第三次就是電腦的發明與應用，從五〇年代開始發展的真空管加機械裝置以計算為主，到今日的積體電路加軟體可做廣泛應用的電腦，已經深遠的影響了人類的生活，並且這個發展的趨勢，正方興未艾，許多未來學家都預言，由於電腦的發明，人們在短時間內可以得到的信息比過去多千百倍，將劇烈的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註三）。

三次重要的技術革命都發生在西方世界，自有歷史的原因，本文不在此討論。但是到了七〇年代，東方的黑馬——日本，以令人不能理解的解的速度，在許多工業方面，如汽車、照相機、電視機、影印機、陶瓷、造船等，快馬揚鞭地超過了傳統的工業區——西歐。到了八〇年代，日本再度向世人顯示了她的能力，在資訊工業方面，日本與美國已經是並駕齊驅，歐洲則是瞠乎其後。本文的目的在於從歐洲資訊工業的逐漸落後，來探討中國未來資訊工業的發展。在電腦的生產和使用方面，世界上有三個主要地區——美國、日本與西歐。但是在市場的分配上，則是美國與日本的天下，如圖一顯示西歐五個主要工業國在小型電腦的使用上依

從美日電腦在歐洲市場的優勢

簡談中國資訊工業的發展

（美國）楊雲

類美日的情形。如圖二顯示整個西歐（包括瑞典、瑞士、芬蘭、西班牙等國家），美日合起來佔了百分之六十的市場（註四），而且這種趨勢還要繼續下去。對於這種現象，一向驕傲的歐洲人自然是感到尷尬與不滿的，可是也無可奈何，因為這是自由公平競爭的結果。

西歐電腦工業落後美日的原因甚多，筆者試分析如後。

一、西歐各國國內市場的有限，除了英國的ICL與義大利的OLIVETTI以外，大多數的西歐各國電腦公司的主要市場還是國

內，也就是說法國生產的電腦銷售對象以法國人為主，德國的電腦也以德國人為主，不像美國與日本生產的電腦除了本國需要外，還以國際上其它國家為目標。由於市場的狹小，使西歐電腦公司的擴展受到很大的限制，難以產生國際性的公司。加上歐洲各國語言的隔閡與傳統性的彼此對立競爭，美日挾其雄厚的資金與優良的產品，便有利地佔穩了西歐的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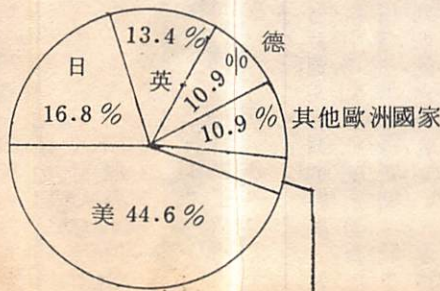
二、西歐游動資金的投資趨向美國，這是一個諷刺的現象，英國著名的投資公司如：Abingworth與3i都將三分之一以上的資金投

供應國	美	日	自製	其他（除美日與本國以外）
法	37%	13%	24%	26%
英	33%	10%	51%	6%
德	45%	14%	27%	14%
荷	51%	17%	8%	24%
義	45%	14%	23%	18%
平均	42%	14%	27%	

微電腦在西歐五工業國內市場分配情形
(圖一)

微電腦在西歐市場分配情形美國佔五分之二

日本接近五分之一



其他（加拿大、瑞典等）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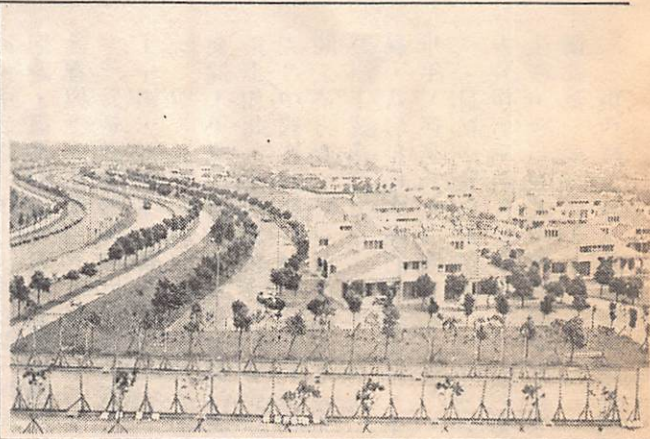
入美國，成立新的公司或購買已有相當成就的公司，反而西歐各國亟需資金的中小企業無法得到應有的支持，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國投資成功的機會大，對歐洲的新公司，投資人沒有足夠的信心。

三、法令的限制，美國對於新興企業的鼓勵相信是全世界最好最完備的。一個小公司只要有相當的人才與一套可行的方案，就有可能得到工商或銀行界的投資，而且在開始的三至五年後，如果證明公司運轉不錯，經過商業部與有關部門的批准，就可以上市股票（OTC），使公司的大門向社會開放。一般人只要有錢，都可以購買，成為公司加伙的新股東，而公司在獲得充份的資金後，又可以再度擴展企業。西歐各國以往對新興公司股票上市審核非常嚴格。法國於一九八三年春天才通過新的鼓勵新興企業股票上市辦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除了技術以外的市場、資金、法令是一個國家工業能否上升的主要因素，像西歐這樣傳統工業鼎盛的地區尚且受到諸般因素的困擾，那麼對於工業尚在起步階段的中國與台灣，資訊工業發展的情形又是如何呢？筆者試分析如下。

台灣

在一九七五年前後，台灣已經看到了資訊工業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路子，而且由於南韓、新加坡、中國大陸人工低廉，使台灣不能再靠人工密集的作業方式在國際貿易上取得優勢，於是開展了所謂「技術密集」與「資金密集」的時代，模仿美國「矽谷」（註五）在新竹試圖綜合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的學術力量開創了



台灣的新竹工業園區，是台灣尖端科學研究所在地。

「工業園區」，對於引進高級技術予以極優厚的貸款；中小資訊公司的成立與推動，政府的補助也是不遺餘力。更重要的是台灣培養七、八萬的留美學生在美國有許多正從事資訊方面的工作，有些人已有了不錯的成就，如果運用得當，是可以做出可觀的成果的。

可是在經過了八、九年後的今日來看，台灣資訊發展的情形並不如當初所預期的樂觀，仿造 IBM 與 APPLE 小型電腦的硬體與軟體，先後遭到兩公司侵佔版權的控訴，使台灣辛苦發展出來的成果受到重大打擊。目前台灣能生產簡單的積體電路與電腦的附件。美國許多大公司如 IBM, ATARI, QUAME, DEC, WANG 等都在台灣設廠，生產週邊設備，台灣又回到比較高級的人工密集形態，對於技術的提昇，

只有小幅度的成長。

資金與法令方面，台灣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技術與市場是兩個頗難克服的關鍵。技術方面，台灣無法成功地從她培養的國外學人引進成套的半導體與電腦設計製造技術。台灣雖然百餘輔導海外學人回國服務，但是可見的未來，這一群在台灣受基礎教育，在美國拿學位工作的學人們似乎還沒有可能放棄美國的物質享受與工作環境回到台灣去工作。

市場是最重要的因素，台灣本身使用電腦的市場很狹，除了國防、學校、銀行以及少數的工商企業，一般人民與中小型企業對電腦還沒有直接的需要，台灣公司生產的電腦以及附件要依賴本地的市場，一定會面臨關門的命運，於是只有外銷。東南亞生活水平比台灣還低，日本、歐洲簡直打不進去，只有美國，美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任何有價值的產品在此地都可能市場，但是要從無到有，與 IBM、DEC 等公司競爭絕無可能，只有走比較方便的路——模仿，模仿並不耻辱，日本就是靠此起家的，然而美國吃足了日本的虧，對仿製品很情緒化的抵制，台灣在資訊發展方面想走日本的老路子看來是困難重重。既不能自製，又不能模仿，台灣的資訊工業走到了十字路口，筆者的看法，台灣不能好高騖遠，只有集中力量發展少數項目，如中高級的積體電路與以美國商業銀行界為市場的軟體開發，建立起市場與信心後，再去發展比較艱難與高級的產品。

中國大陸

自從六〇年代毛澤東十五年趕英超美的大

躍進與七八年華國鋒洋躍進的失敗後，中國的領導人比較不那麼口出狂言了，只希望到了公元兩千年，人民的收入能番兩番，可是縱然這個目標達到了，也僅是追上了西方世界六〇年代的生活水平（許多地方還要不如，譬如交通工業與生活環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六〇年代以後，除了傳統工業的進步外，資訊工業的突飛猛進。在中國陷入瘋狂的十年「內亂」期間，西方各國正潛心發展電腦，獲得了重大突破後，便浩浩蕩蕩地全面發展到如今連賣漢堡的速食站都用小型電腦來服務顧客的局面。

目前中國把香港、廈門、廣州、海南島等地區圈起來發展資本主義，並且希望學習台灣，利用有利條件發展中國的「矽谷」。從前年公佈中國自製的銀河電腦到近兩年來大量購入西方大中小型各種電腦與軟體來看，中國也急於走上資訊工業的大路，但是有幾個比較不利的因素，筆者試分析於下。

一、市場：中國雖有十億人口，但是以目前衣食住行都落後的情形，國內使用電腦的市場恐怕不比台灣寬多少，除了國防、行政與教育研究機關外，民間購買電腦的潛力幾乎是零，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沒有日本與西方世界的中產階級為主要市場的蓬勃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使用電腦並非為了時髦與樂趣，而是需要，快速而準確的資料處理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司的業務。

中國未來廿年內發展資訊工業要以本身市場為對象肯定是不行的，只有轉向國外，於是就面臨了台灣相同的困境。

二、資金：一個生產積體電路的半導體廠的設立，動輒千萬美元，而且還不能保證一定成功，五年後，廠內的設備又要更新，否則無

法和國際上新型的產品競爭，這筆龐大的費用，中國目前無力負擔，只有祈求國外廠商的投資。以台灣過去的經驗，外國廠商設廠大都生產技術層次較低，真正高級的技術根本不會移轉。但是中國比較有利的條件是土地費、造廠費以及人工的新水都低，未來幾年內，外國廠商的投資還是會持續，但很可能會走台灣的老路子。

三、法令：中國的法令複雜多變，外國廠商頗難適應。何況，法令的目的和西方的不同了，西方法令是鼓勵企業的發展，中國法令是爲了吸引外資與對國外的商業流通，對於本國民間企業的鼓勵還侷限在意識形態的框框裡。中國要從目前自由市場買賣蔬菜水果以及上海北京人民自營飲食店、裁縫店的狀態發展成西方社會中活絡的中小工商企業，不是不可可能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對於所謂「資產階級」詮釋與接受的問題。所以談到「法令」，在西方世界是企業界與政府在會議桌上的協議，到了中國，就成了治國的大問題。

四、人才：中國人才不足，有些讀者不禁要問，不見中國發射人造衛星與長程飛彈乎？果真如此，爲什麼還派幾萬留學生到西方取經呢？中國在國防科技方面是先進的，但是在民間工業方面，許多還停留在五〇年代的階段。資訊工業是西方在六〇年代興起，七〇年代發展，八〇年代大盛的新興工業，中國閉關鎖國卅年，何來充足的資訊人才？

目前中國採取的辦法一是大量派人員往西方公司培訓與入校學習；一是和電腦公司合作生產，今年在北京與美國HP公司簽訂合作計劃就是一個好例子。

由西歐資訊工業發展落後美國與日本的現

象，可以查知要成功地發展資訊工業，並非主觀的意志可以決定的。目前世界各國彼此交流日益密切，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蘇聯）若要閉起門來單獨存在，都會造成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的危險。只能以己之長，補人之短，以人之長，補我之短，才能共同繁榮地生存下去。資訊工業也不例外，沒有必要每個國家都生產同型同款的電腦與附件，有的國家在某方面的發展已經穩定了，其他國家最好在其它方面（如電腦應用）競爭。

台灣方面的困難是技術與市場。中國大陸是更廣泛的問題，可見的未來，中國人民對電腦的需要若仍比不上摩托車的話，發展資訊工業便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畢竟，資訊是爲人服務的，目前中國人民能從電腦直接得到什麼，還是一個疑問。

註一：資訊工業的定義是電腦的生產與運用，資料信息的貯存與傳遞。

註二：目前人們對核能反感，因爲不安全。這個技術問題遲早可以解決的。

註三：未來人類的生活將會依賴一部終端機在家中得知外界的消息，如本人的銀行存款、電影院今日放映的電影節目、天氣、交通等等；機器將爲人做更多的事，如打掃、烹飪。

註四：數據參考雜誌（Mini-Micro Computer）一九八四年五月期。

註五：矽谷（Silicon Valley）係七〇年代，史坦福大學的一項成功的計劃，以學術和工業界的結合，造成世界性的電子電腦中心，地點在加州舊金山的南灣區。

我們飯店不打顧客

——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

(北京) 董旭生

這次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幕，共開了八天。胡耀邦、萬里、胡啟立、楊尚昆等都參加了大會。胡啟立在大會上



在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胡啟立(右一)強調作家有創作自由。

做了報告，報告被三十多次掌聲所打斷，大會在一片反左聲中閉幕。大會選以高票選舉劉賓雁等自由派健將為作協理事。一般認為，這次作協大會是黨內開明派的大勝，黨內保守派胡喬木、鄧力群均未敢在會上露面。

我在會議閉幕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了一位參加此次作協代表大會的作家。他向我談了幾句真心話，很有見地。我問他，現在是否特別興奮，因為胡啟立在報告中強調作家有創作自由，作家不能因作品而受到打擊，胡啟立報告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又強調不能戴帽子、打棍子。他說：「當時參加會是覺得很興奮，有點忘乎所以，真有大幹一場的勁兒。可是，回來一想，越想越覺得不對頭。我出過國，知道外國作家的創造自由是怎麼一回事。黨中央強調不再戴帽子，不再打棍子，說這樣就可以帶來文藝創作的黃金時機，其實那有那麼簡單？」

「今後不打棍子不就好了嗎？怎麼覺得不對勁？」我問道。

「你想想，如果一個飯店剛開張，老闆拿着喇叭在外對着行人大叫：『我們飯店不打

顧客！我們飯店不打顧客！請來用飯！』那麼做，有人敢進去吃飯嗎？他的生意會好嗎？」
「你是說，現在黨中央又在大喊不打棍子，就像那個剛開張的飯店老闆，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會把作家嚇走，是嗎？」
「你可以體會嘛！黃金時期還沒開始，就強調不打棍子，你看多像那個飯店老闆。我們幾個作家回來後，腦子清醒了一下，就不那麼樂觀了。」

「你說得很耐人尋味。」
「再有，預言將出現文藝創作的偉大時期，也是很滑稽的。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三十年代我國文藝豐收時期，哪有事先預言的？它是時代造就的。我們黨解放後曾做過多次偉大的預言，如『百花齊放』、『十五年超英趕美』等，結果怎樣？相反，很多好的東西，事先沒有預言，後來形勢發展需要，就做了，結果倒很好，比如當前的門戶開放等。所以，一旦有了偉大的預言，反而給人不良的預感。」

「我很欽佩你的看法，那你看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黨不要管就完了。不要再開什麼作協代表大會，只要宣佈一下，今後作家願寫什麼，就寫什麼。作家取銷工資，完全靠稿費過活。在作協、影協、戲協等單位撤銷黨組織、撤銷文化部、電影局這些閻王殿。給作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這樣一來，保證十年之內產生好作品。」

我思量着，這些話的確很有道理。趙丹同志臨終前說，希望黨不要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兩年農業形勢好轉說明共產黨少管農業，農業就有發展，共產黨不管農業，農業就大發展。我想，只有共產黨徹底不管文藝，文藝界才有真正的希望。

回國講學後記

與訪問觀感

(美國) 陳寒梅

今年四、五月，我應中國核工業部之邀，作了爲期四週的訪問講學。一個在台灘出生，而後來美國留學的海外知識份子，第一次回到祖國的國土，其興奮之情，是難以筆墨形容的。

我於四月廿九日由紐約機場起飛，四月卅日抵北京國際機場。飛機落地之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終於落腳在神州大地的祖國上了，得償宿願；懼的是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已夜晚九點了，不知和接機人員如何碰頭。雖然紐約總領事館說了會有接待人員來接機，但彼此都不認識，如何照面却是傷腦筋。拿了行李，走出海關之際，突然看到一位先生手拿一張紙板，上寫着我的姓名，

我就走上去和他打招呼，並自我介紹。這位接待我的先生姓金，是部裡外事局的。以後我在中國除了訪問親人朋友外，全由老金陪同。

我們出了機場，搭上部裡租的車子直奔頤和園。國際機場在北京東北郊，頤和園在城的西北邊。我們繞過京城北郊，車子開了將近四十分鐘。在車上，老金和我彼此寒暄進一步介紹自己之後，就開始談起這次安排我的行程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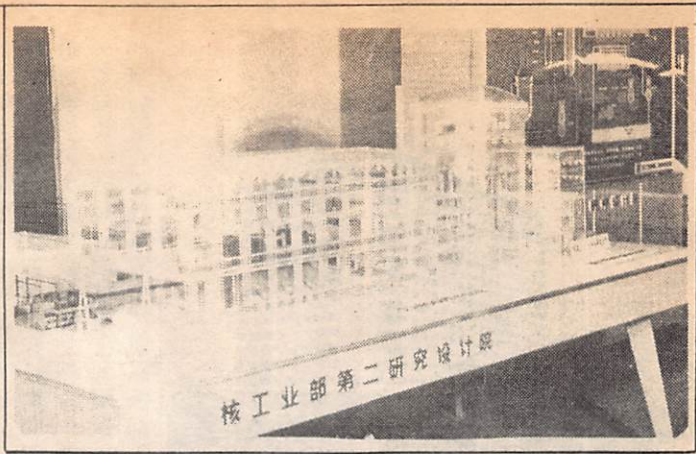
部裡計劃讓我在北京兩週，然後到西安，最後到上海講學，重點是在北京和上海。到西安除了訪問遊覽，主要是參觀部裡所屬的一間電子儀器廠，並在廠裡領導和工程人員交流經驗。老金告訴我，如果我對這個行程安排有意見，可早點反應（國內交通還是很緊張，尤其

航空，不早預定幾乎沒票），以便及時想辦法更改。我說，我有一位姨媽在長沙，不過大部份的表哥、表姐都在北京。至於是否棄西安而去長沙，等我和表哥商量之後再說。

三天後，我和兩位表兄見面時，他們都主張我去西安而不必急去長沙，因西安畢竟是個名勝古都，失此良機，實在是可惜，況且國內同胞是難有這福份的。他們認爲姨媽身體還健朗，不如等我以後回國時，再安排我們見面。既然表兄姐如此說了，我就不如照部裡爲我安排的既定方針辦吧。

北京講學的地點是在北京核電站工程設計





中國歷來注意核工業的發展，這是核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

研究院，核工部的同事簡稱之爲二院（一院在成都）。聽課的可說是老中青都有，老的有近六十的，青的有剛出學校的，百分之九十是四、五十的中年專業同仁，這也反應出文革的後遺症之一：知識份子被誤的一代還在青黃不接中。聽衆主要是當地二院的同事，有少部份來自上海設計院（目前在設計第一座國產核電站）及水電部（一）。

我講課的大綱在半年前即已寄回國內，所以聽課的個人專業也多少和我的講題有關。我的題綱有：

(1) 反應堆物理、中子物理——堆心模擬模型
REACTOR PHYSICS, NEUTRONICS - REACTOR CORE SIMULATION MODEL

(2) 核（蒸汽）動力系統模式分析

NUCLEAR STEAM SUPPLY SYSTEM MODEL ANALYSIS - POINT KINETICS

(3) 熱功率邊際分析——熱傳統力學

THERMAL POWER MARGIN ANALYSIS - THERMAL HYDRAULICS

(4) 儀器控制系統——微電腦系統的設計與整合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MICRO - PROCESSOR SYSTEM DESIGN AND INTEGRATION

(5) 應用數學——最佳漸近法 OPTIMIZATION

除了第五個題目外，以上四個專題是核動力系統設計的四項主要分工。筆者所在職的公可，其中設計工程部份，四個主要部門就是根據前四項工作進行分析設計，每個部門的工程師約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筆者近幾年來的工作崗位是在儀控部，所以這部份在整個的講授中所占的時間比例亦較多，約百分之四十，其中一半則在微電腦程序上。雖然核動力系統的設計有四、五個分工部門，但彼此間又是縱橫「交往」成一整體。譬如，核動力系統模式分析和堆熱功設計邊際分析中有許多系統參數和常數來自堆物理和中子物理的分析與推算。易言之，在設計分工上，第一部門是二、三部的上源（UPPER STREAM）。另一方面儀控部又是物理部與熱功設計部的下源（DOWN STREAM）。儀控部門設計的安全保護系統（SAFETY PROTECTION SYSTEM）或電站監測系統（PLANT MONITORING SYSTEM），不論是類比（ANALOG）或數值（DIGITAL）系統，其中許多參數、常數或定點分析（SETPPOINT ANALYSIS）均來自堆物理和堆熱功的計算。

至於第五個題目——最佳法（OPTIMIZATION

），則是筆者最初在堆物理部門，參與一項研究發展計劃，將一個大的堆心模擬程式（CORE SIMULATION CODE）改進所得成果。這項發展計劃改進模擬程式的目的有二：(1) 離線（OFF-LINE）計算應用，將模擬結果和一項「依據」作比較，用平均平方誤差（MEAN SQUARE ERROR, MSE）作指標，使之極小化（MINIMIZED）。(2) 在綫（ON-LINE）模擬分析，與上同，只是上項「依據」改成在綫指標變量。這項模擬程式改進的中心工作在使平均誤差極小化，策略上是調整一些「可調的」（ADJUSTABLE）中子參數（NEUTRONICS PARAMETERS）和幾何參數，數學方法上則是使用最佳學中的一種方法——NEWTON-RALPHSON METHOD。因爲這個題目比較專，範圍亦較窄，所以講的時間亦最少。

筆者介紹最佳法的目的有二：(1) 在研究中子物理或其他的工程系統分析（SYSTEM IDENTIFICATION）上，最佳法是一個可行的數學方法。(2) 筆者已將此法結合堆心物理發表過一篇論文。介紹此法，可就理論（數學）結合實際（物理）作一實例。講課時，筆者僅花少許時間講述程式、運算（ALGORITHM）導引，大部份時間則花在討論上。末了筆者作了幾點小結：(1) 數學是工具、是方法。工具方法要應用得法。(2) 應用得法的前提是對所應用的系統要有充分了解。換言之，在選擇可調參數時，必須有充份的研究分析去判斷選擇。否則，參數選錯了，前提失敗了，不論數學運算方法多好多，程式寫的多好，最後應用的結果還是會失敗的。

我講課時間中，有三分之一花在討論上，盡量讓聽眾發問。因為我在工程界服務，來聽課的也都是核工程界的同仁。如果他們有問題，定是在實際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是在「生產開爭」中須要解決的，而不是在「思想開爭」中可有可無的。所以我盡量騰時間出來讓他們發問，這是我主辦單位事先默契好的。

許多實際工程上的技術問題不同於一般學術上的科學問題。學術問題討論，大家可在原則上或觀念上做一般性的交換意見。以前筆者在學時，一月一次的研習班每次有不同的研究方案，甚至不同系的研究生也可在一起彼此增廣見識，但很多時候都是各說各話，胡蓋一通，包括指導教授在內，充份流露出「老九」翹屁股的「德行」。討論工程技術問題，固然可以百家爭鳴，但更重要的是朝着一個共同目標，去解決一個設計或技術上的難題。學術討論的目的就在百花齊放；技術討論則不然，鳴放



王府井大街上的北京飯店。

之後還要解題，或者朝目標邁進一步。否則，原地踏步，再鳴再放亦於事無補。也因此，我鼓勵聽眾盡量提交書面意見。原因有三：

(1) 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或不習慣在課堂上口頭發問。

(2) 我可先閱讀預習書面問題，然後第二天作答。

(3)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可以想見的是有許多問題我不能當場作答，甚至不是我的能力或專業所及。但為了國家建設，為了與國內同胞盡一分努力，我願意把所有不能及時回答的問題帶回來逐目答覆。值得欣慰的是講課結束後，確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書面問題，尤其各小組領導將問題整理成序列。其中有些是我預料中的問題，它們反應了中國正邁着廿年前美國在發展核電上所遇到的設計瓶頸。

三

在北京趁講學參觀之便，抽空訪問了親戚和朋友。筆者在大陸親戚，除了少部份在老家湖南外，大部份成家的表哥表姐們都在北京或近郊，這次看到的表兄姐共五人，加上他們的愛人和小孩可熱鬧了，我們約了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見面，然後一起去吃涮羊肉。雖然是我請客，却由一位表哥付錢。因為他說，如果我付的話，至少多百分之七十的價。我出錢，他付帳，可謂皆大歡喜。

我們談了一個下午，由內到外，由台灣、美國到大陸，無所不談。他們問了家母近況，又問我回國觀感，我說這次回歸故土，自然難免觸景生情。講第一堂課時，前十分鐘幾乎說不出話來。能看到自己親人當然更是欣慰。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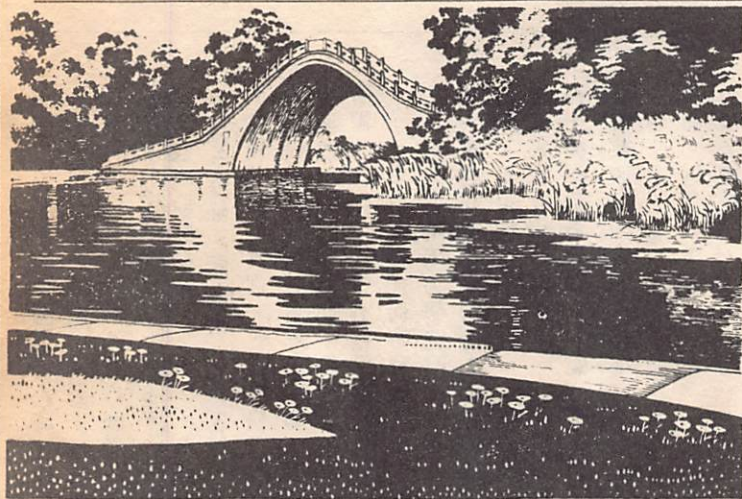
於其他國內種種一切，除名勝古蹟外，沒有一點對我是新鮮事物。他們都對我了國內情況的程度感到驚奇，不但對國內三十年來的動盪大事、政治起伏有所了解，甚至連講話，除了沒有說標準的北京話外，很多國內專用語和習慣語都能朗朗上口，簡直聽不出是個外賓和外僑。我告訴他們，以前我在校園和一批有理想有熱血的同學搞學運，在四人幫倒台前，對國內政治風向是「緊跟」，唯恐自己「掉隊」，雖不是「凡事左三分」，但確是「寧左勿右」。這一切隨着學運過後，四人幫倒台，大量血淋淋的事實外洩，都成了過眼烟雲。我還告訴他們，像我們這種過去搞運動的積極份子，是隨着「鈞運」應運而生，在全美各地雖然不算少，但就整個港、台兩地的留學生來說，確是少數中的少數。這也解釋了為何鈞運高潮一過，當初的積極份子紛紛離開校園後，學運和其刊物就難以繼續了。

我問了在湖南的姨媽和表兄們的情況，也和他們各談了在三十年政治動亂中的遭遇。幾位姨夫雖然幫國民黨做事，解放後都已坦白交代清楚，所以在文革前的幾次運動中並未受到大的整肅。但文革不同，一開始就比歷次運動緊張，除了反復審查以前家庭政治背景外，還多了一道關卡——海外關係。所有的表兄姐，除了大表哥外，都把海外唯一的親人——家母捂着不說，所以問題不大。除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外，尚無大礙。大表哥是我三姨的獨子，也是目前我在世表兄中最年長的。他人較坦直，本着「坦白從寬」政策，說出在台灣還有一個姨媽。這下子，他除了下放外，還多了一頂無名的帽子——有海外關係。四人幫不倒他還不得翻身呢。到今天，工作單

位的考績獎賞還輪不到他，不知是否受政治包袱之累，才五十歲的他看起來已像個小老頭了。命運最慘的要算我舅舅一家。舅舅和時征表哥是姚家的兩代單傳。舅舅繼承了祖遺地產，解放前在湖南算是個地主，但他這個地主不是什麼南霸天、西霸天的。湖南尚未解放時，他已在組織地方群眾準備歡迎軍中的還鄉團了。但土改一開始，不管你是好是壞，只要是地主一律人頭落地。可憐我表哥那時還在襁褓中。照理說，這樣一個嬰兒和他那地主老子除了血緣外，政治、思想、教育、行為都該扯不上關係了吧。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地主兒混蛋」，却成了株連他的世代的荒唐邏輯。在這個反動的傳統下，那兩個「革命」黨在「誅連九族」表現上，更是五十步和百步，一丘之貉。時征表哥受地主父親之累，被列入黑五類，若非四人幫倒台，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實上他現在還未翻身，只是未繼續受以前的政治迫害而已。一天黑帽不摘，他就繼續在國營農場中勞教。筆者在此并非假公濟私，只想說幾句逆耳忠言。寄語中共中央當權派和地方黨官惡霸：「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不要以為大的冤假案平反後，小的錯的案子就可捂着壓着。你們今天搞「四化」，如果政治不開明、不民主，民意不能上達，法治體系不能建立、司法系統不能獨立，再多幾個現代化都沒有用。

四

在北京看了兩家朋友。第一家是老戴夫婦。七九年我甫出校門來康州就業，去耶魯大學看朋友時認識了老戴。他是屬於七九年中國來



美麗的頤和園小景。

美訪問學者中的第一批。一年後，他的太太小倪亦來耶魯訪問研究。他們夫婦是同班同學，五五年畢業於北大生物系，之後就留校任教。如今他們已是生化系的副教授和講師了。老戴原籍上海，小倪是浙江。在京多年，老戴講話已帶點京腔，小倪還是說江南國語。我是一個週日下午講完課後，坐車直趨北大。北大和清華都在京城西北邊，只是沒有頤和園那樣遠。事實上我每天回頤和園都經過西北校園區。北大校園雖然不是很大，却很幽雅，古色古香的。現在北大的校本區是以前燕京大學的舊址，卅年來加添了一些科系大樓，尤

其是七六年之後加了不少學生宿舍。燕大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全國高等院校整編時併入北大的。老戴又帶我去看了校本區旁邊的（合併前北大的）老校區，該區較小。老戴入學時還在老校區，畢業時已搬到新校區了。

和老戴一邊逛一邊談，談彼此家庭家人近況，談在美國搞運動的朋友，談國家大事。其中談到一件我未曾聽過的趣事。老戴的父親是四十年代的留美學生，學醫的，就讀於麥迪生威斯康辛大學，可真是我的老學長了。抗戰勝利後不久，伯父就回國了，任教於那時的中央大學，後改稱南京大學。這些在解放前就已是教授的老前輩，在國內等級特高，泛稱「老」（此老非年老，乃指等級）教授。解放後升成教授的，那怕年高德劭，在等級上還是難以趕上解放前的前輩。不知這是中共的新鮮事物，還是傳統等級觀念的再生。這批老教授，除極少數知名度高的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倒未遭週大動盪。可是文革一來，就不管交心與否，一律下放。戴伯父的身體就是文革中在農村弄壞的。四人幫倒台後，各單位落實了知識份子政策，物質供應方面對資深者優先考慮（當然這些考慮是在黨官高幹之後）。伯父因為等級高，在分配新住屋時，優先分到一所三房一廳的住屋。三房住屋在國外（包括台灣）是稀鬆平常的，可是在國內城市那種住地擁擠、人口稠密的情況下，三房不但是奢侈，非有特殊等級還真要到。伯父伯母年老體衰，不須他們托人打聽（），國家就分配一位幫佣住家照顧。文革後全國薪水凍結十幾年，復職後不但按等級加薪，連昔日所扣發的薪水亦加追補。這下子戴伯父錢多的沒處花了。偌大的房子住三個人有點冷清，而且新房子更顯得家徒四壁。國

家又撥下一千元買家俱。黨對一個過氣的「臭老九」竟如此「關心」，「臭老九」們應該向「黨」大大感德謝恩了吧！老戴說了句良心公道話：「太過份了」。我在想：我是個感情容易激動的人，大凡激情之人，感情豐富而又脆弱的。我們這個老大民族是否也是個非常情緒化的民族呢？看看那個「偉大的、光榮的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真是「晴時多雲偶陣雨」，捉摸不定也。

(待續)

註釋：
(1) 中國水電部的各電力局相當於其他國家的電力公司，是發電站和設備的使用和擁有權單位。至於提供發電設備的是一機部。核工業部又稱二機部，以前是專做反應堆科研的，現在搞核能發電，設計發展屬二機部，製造裝配成套的設備仍屬一機部。所以就發電設備來說，一、二機部是 SUPPLIER，水電部則是 OPERATING OWNER。

參加聽課的水電部同仁屬上海華東電力局，正在對外國公司的投標方案進行審查。他們來聽課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對國外提供的設備，尤其是對控制系統和電腦系統能有進一步了解。

(2) 此處的「依據」乃是指堆心三向空間功率分佈 (THREE-DIMENSIONAL (3-D) POWER DISTRIBUTION IN THE REACTOR CORE)

，其來源有二。

1 根據中子擴散理論來解其三向空間的核散方程 (DIFFUSION EQUATION)。解三堆偏微分方程在理論上不是難事，但解題程序上却非常繁瑣，再加上一些邊界條件，則擴散方程的題解就變成一項規模不

小的工程了。最難的還在於將這堆心功率分佈要能計算的精細、準確。目前美國核工業對堆心功率分佈的最終參考依據是一套鉅大的電腦程式 (PDQ CODE)。這套程式將每個鉍燃料棒 (ROD)，而非燃料束 (BUNDLE OR ASSEMBLY) 當作一個橫截面的幾何點來處理。一個燃料束內含三、四百個棒子，所以解起 PDQ 來，其程式所需要的儲存空間就比一般的核子擴散程式所需的儲存空間多出三、四百倍。

PDQ 這套程式何時發展出來不得而知，不過聽說是電力研究院 (EPRI) 當初花大筆錢合美德兩國之力搞出來的。一般電腦，不說能否跑 (RUN) 這套程式，即使程式本身和其數據庫 (DATA BASE) 能否上機 (LOAD) 都成問題。筆者公司一台正在被取代的老的大型電腦 CDC 7600，跑一輪 PDQ 3-D CASE，就需耗時廿四小時左右。近五年來，3-D CASE 已經沒人跑了，頂多跑幾次 2-D 或者是 1-D。

走筆至此，筆者有無限感慨。對 PDQ，我有一個比喻，它好比是韋式大字典或者牛津大字典。這兩部具有代表性的字典，今天還是不斷地在充實中 (UPDATING REVISION)，但是一般人們並不用它的全套版本，而是用袖珍本，即使是我們專業人員或一般的文書、秘書，也只是用濃縮本。如同 PDQ，今天人們只是分析 2-D 或 1-D，至於 3-D DISTRIBUTION，頂多用它以前的存檔資料作參考。廿多年前發展這套程式，是因為要開發核能電力。由物理走向工程，許多核子反應的幾何空間分佈還抓不準，所以歐美核能界要發展一套剛

性法典或程式 (RIGID CODE) 作依歸。時至今日，先進國家已累積了經驗，許多技術難關成了技術說明 (TECH SPEC)，許多運轉方法成了操作步驟 (PROCEDURE)。在這些說明和步驟背後，有許多是西方國家當初發展科技的經驗結晶，今天都已歸檔束之高閣，不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了。這就是開發國家向先進國家進口工業技術的困境 (DILEMMA) 和難以填平的差距時，有些小組領導人和我深具同感：這些含有技術結晶的說明和步驟，如作為專題討論，就需要我們一起大炒冷飯，走一些別人已經走過的回頭路了。其實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豈止在工業技術上需要炒西方的冷飯，政治思想上又何嘗不然。

2 第二項三向功率分佈的依據，不是理論計算，而是在線儀器度量、離線分析推算、歸檔儲存參考。在離線儀器度量是使用堆心中子探偵器 (ON-CORE DETECTORS)，將堆內不同部位的中子通量和運轉功率記在磁帶上。離線分析推算則是利用磁帶上的數據，以數學方法 (內插、外插極小誤差等等) 推算三向空間的功率分佈。這種分析推算如同 PDQ，也是早期核電站運轉必要諸存歸檔的資料，如今則非必要了。

(3) 此處「打聽」是指到農村中找幫傭。現在農村經濟搞活了，農民富，還有過剩的勞動力流向城市做幫傭，農民既能轉取資本，城市也能滿足需要，可謂各得所需。我在京表哥的朋友們從安徽請了人在家做幫傭，有的照顧老的，有的照顧小的。由此可見，市場經濟調節對中央經濟規劃是有所幫助，甚至可作為反饋的 (FEEDBACK) 參考價值。

海內外民運發展

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汪岷拜訪陳香梅女士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六日，中國民聯副主席汪岷在美國共和黨麻省分部歡迎陳香梅女士的酒會上，拜訪了陳香梅女士，並會晤了美國麻省共和黨參議員領袖 John Parker、美國麻省共和黨眾議員領袖 William Robinson、美國麻省共和黨主席 Andrew Narciso 等美國政界和民衆團體人士。汪岷對陳香梅女士作了單獨採訪。

陳香梅女士表示她看過不少期中國之春雜誌，她關心地問汪岷：最近出到第幾期了？近況如何？汪岷同志向她作了簡要介紹。

在談到陳香梅女士的職稱和活動時，她說，她的現任職務是美國總統府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她風趣地說：「我的工作為政府和總統工作的，總統叫我到那裡活動我就去哪裡。」

接着陳香梅談到最近到海峽兩岸訪問的事。她表示最近幾年，她訪問大陸和台灣比以前頻繁。她表示，最近一次訪問大陸是去年九月，會見了鄧小平。她說每次去大陸都會見鄧小平。她說：「因為我是去辦公事的。」

當汪岷問她有無和鄧小平談及中國的統一

問題時，陳香梅笑着攤開雙手說：「這個問題太敏感了。」

陳女士接着表示了對中國前途和中國人民的祝願。她說：「我希望兩岸人民生活得和平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六日，汪岷（中）拜訪陳香梅女士（右）。陳香梅女士在仔細觀看中國之春雜誌目錄。

、幸福。」陳女士特別着重談到了海外華人的權益和切身問題。她說：「海外華人應該努力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這樣才能更好地為中國人服務。在美國的華人應該團結起來，不應再分這個派、那個派，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她還強調：「最近美國華裔和僑界出現了新氣象，比較關心華人的參選問題，也取得了成績，如加州蒙特利市的陳李婉若，最近的吳仙標，這都是好現象。」她對華人參政的前途表示樂觀，她說：「我希望看到以後更多的人站出來，為中國人的權益而努力奮鬥。」

最後，陳香梅女士接受了汪岷贈送的「中國之春」雜誌，並題名留念。她對「中國之春」的讀者表示了良好的祝願，她說：「我祝福你們。」

北京師大掀起新的學運風潮

從元月十日開始，位於北京海澱區北太平莊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學校校園中貼出很多大字報，抗議校方停發寒暑假的助學金。事件的起因是這樣的：原來，師範院校的學生一律享受政府的助學金，這是延續了很多年的老規矩，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國民黨執政時期及共產黨掌權時間，均是如此。今年元月初，北京師大黨委根據中央最近通過的「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精神，並徵求上級同意後，宣佈了助學金的新政策。新政策規定，學生只有上課期間才享受每月十八元的獎學金，寒暑假期間的獎學金一律停止（原來上課及假期均可領取）。節約下來的錢，用來獎勵優秀學生。這個政策，激怒了廣大學生，因為它使很多學生寒假期間無法回家過年。

第一批學生貼出大字報後，校黨委領導說，憲法中已取消了大字報，揚言要處罰貼大字報的人。這下更激怒了廣大師生，大字報越貼越多，紛紛聲援第一批貼大字報的學生。學生們一開始貼的大字報，多是就事論事，他們不反對對優秀學生進行獎勵，但是不應以犧牲廣大學生的利益為前途。後來，大字報的內容逐漸深化，矛頭直指當前黨的不合理政策。大字報指出黨中央不重視教育界，不懂得教育在實現四化中的作用。學生的大字報尖銳地問道：「這就是你們的經濟改革嗎？」

大字報持續了一周之久，引起了教育部和國務院的嚴重關切。校黨委召集了幾次會議，動員各級黨組織和學生的政治輔導員，去向學生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在黨組織的有力介入下，學生運動才慢慢控制下來。

一般相信，這次學運風潮反映了大學生們對物價上漲、教育界待遇低下等政策的不滿。此次師大學生的大字報事件，獲得了廣大教師的同情和支持。附近的北京電訊工程學院的學生，也紛紛前往師大觀看大字報，支持師大的學生。

國內董旭生小組 在北京散發中國之春簡訊

中國之春簡訊現已出版了三期。簡訊體積小、易攜帶，已大量進入國內。十二月中，一批第一期簡訊轉送到北京董旭生小組。董旭生小組迅速將簡訊散發到有關單位。中國民聯總部已下達文件，號召中國民聯各地分支機構及盟員，通過一切盡可能的辦法將簡訊送進國內。中國民聯總部也誠請同情與支持中國民主運

動的人士，協助我們將中國之春簡訊運至國內有關單位和大陸人民。

中國民聯各分支機構舉行集會 和座談，慶祝民聯成立一周年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兩周年紀念日，十二月卅日是中國民聯成立一周年紀念日。中國民聯各分部、支部和聯絡站紛紛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和一九八五年元月份舉行集會或座談，總結以往的工作，瞻望民運前途。中國民聯北京柳平小組、廣州支部、日本分部、香港分部、歐洲分部、美國芝加哥聯絡站、舊金山支部、荷蘭聯絡站等，都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活動。北京柳平小組十二月份召集幾位高幹子弟，對國內形勢進行詳盡的探討，對民運有重要參考價值，其座談的部份內容，將從本期中中國之春進行連載。荷蘭聯絡站的同志，獲得了當地僑商金先生的支持，在其飯店舉行了座談，並邀請了中國大陸赴荷蘭的留學生參加。座談會後，大家共進晚餐。

日本分部致信中國駐日大使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致信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向其解釋了中國民聯的宗旨，對其限制中國留學生與中國民聯進行接觸表示遺憾。信中要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向中國政府轉達中國民聯的四項要求：(一)准許中國民聯在國內合法存在；(二)准許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註冊發行；(三)釋放在押的民運份子和持不同政見者；(四)停止對同情、支持中國民運的留學生進行迫害。

今後，各地支構將加強向中國政府的寫信活動。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日本政治團體「大行社」出動宣傳車，在東京街頭聲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北京待業青年 組成小組，響應中國民聯

北京部份待業（實為失業）青年組成小組，響應中國民聯，並通過出國人員與中國民聯取得聯繫。他們托人帶出資料，反映廣大待業青年的困境。他們通過聯絡人員向中國民聯表示，他們獲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的消息後，十分激動，一直想與中國之春聯繫，如今才獲得機會。他們已在國內組合起來，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做了力所能及的宣傳工作。

現在，據估計，全國待業青年約有三千多萬。他們的工作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目前在

經濟改革、有些虧本企業面臨關閉的情況下，他們的求職前途更是沒有希望。政府叫他們自謀出路，然而，他們無後門可走，合伙做小生意又籌不到資金，真可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們與中國民聯聯繫，希望能加入中國民聯的行列，并希望中國民聯有所作為，和他們一道，結束專制制度。

香港分部出版中國民主運動年曆

中國民聯香港分部中國之春書屋，在一九八四年底，出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份中國民主運動年曆，標明當代中國民運的重要日期，并做了說明。

被該份年曆列為重要日子的計有（摘要）：

三月廿九日：魏京生被捕，一九七九年。

四月五日：天安門運動爆發，一九七六年。

四月廿日：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派代表北上聲援被捕民運戰士，一九八二年。

八月七日：中國民聯派出代表首次與海峽兩岸官方公開接觸，一九八四年。

九月十五日：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成立，一九八〇年。

十月九日：湖南師院爆發大學生選舉風潮，一九八〇年。

十一月十七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起，一九八二年。

十二月十日：北大廿二名學生草擬出版法

各地人士如有興趣索取此份年曆，請寫信與香港中國之春書屋聯繫。

中國民聯代表與康州僑社座談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三日，中國民聯總部派出王炳章、李奕蕙、黃仕中和劉剛四人赴美國康州溫澤爾鎮與當地中立華僑團體——華社的多名人士舉行座談。座談會由李世玲女士主持。座談會題目為：「中國傳統文化、民族性與現代化」。

康州是美國核子工業基地，當地華僑多為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對祖國的現代化甚為關切。

王炳章致函美國會司法委員會

要求查明張信疑案

中國外出工程師張信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突然被發現死於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內。之後，美國法醫對其屍體進行了解剖，但驗屍報告始終未予公佈，屍體尚在美方手中。對於張信之死，外界頗多猜測，甚至有張信被紐約領事館人員毒打而死，然後被吊起的傳言。

元月十一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致函美國國會司法委員會和人權小組，要求美國國會查明張信一案，要求公佈張信的驗屍報告，并要求美方在張信死因未查明之前，暫時不要將屍體交還中國方面。

中國民聯將繼續為查明張信死因、為維護中國人的人權而做出努力。

中國之春波士頓留學生座談會

中國民聯副主席汪岷，最近在波士頓地區

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春節座談會，與會者在會上很輕鬆地漫談交流了在美國的學習心得和生活經驗，增進了不少在美留學的知識。同時，大家對目前國內改革、技術引進和留學政策等談了很多看法，現歸納如下：

對於經濟技術的引進工作方面，大家都肯定了改革派的努力，特別是最近鄧小平有關「引進外資者獎」的指示，還有去年下半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組織「引進招待小組」，說明了改革派不願頑固固派的反對，繼續堅持改革的政策引進外資，以刺激國民經濟。

以前只有各省有引進小組，現在權力再一步下放到地方，各縣、地區及重點企業都開始成立引進小組，又因以前招待工作太差，現都專門成立「招待小組」，有兩點引起注意的是：一、容許在軍隊成立「引進招待小組」，說明開明派企圖把改革推進軍隊勢力範圍；二、容許外國人在科技部門擔任主任職務，以吸引外資能放膽投資等等措施。

對於在留學政策方面的問題，大家圍繞新年期間，中國慰問團黃詠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留學生大會上的發言作了重點的討論。

大家對最近在國內新頒佈的十一點政策感到興趣，認為這裏面有照顧到公、自費留學生權益的趨勢走向。大家覺得最近台灣海峽兩岸競爭海外人才，防止「人材外流」，相繼公佈一些對留學生權益有實質性好處的政策，這將有利于海峽兩岸的改革派的開明趨向，以及有利于中國留學生本身的學習和生活。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中國之春的這類座談會應該在大陸留學生中多開，中國政府也應該多開這種坦率直言的座談會，而不是只聽取那些報喜不報憂的留學工作人員的匯報。

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致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館：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出現在中國和世界政治舞台上，迄今已經整整兩年了。兩年來，這個由中國留學生發起的、旨在改造國家和社會的民主運動，得到了國內外各界民衆越來越廣泛地支持。去年年底，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在美國紐約召開，並成立了正式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現在，中國民聯的分支機構已遍佈國內許多城市和世界各大洲，成為中國當代活動力最強、影響面最大的一支民主運動骨幹力量。

中國之春從誕生之日起，就得到了許多中國留日學生和在日華僑的熱烈響應，同時也受到了日本各階層有識之士的同情與支持，使得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原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能衝破重重困難，在開展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進程中不斷成長、壯大並為這一正義事業做出貢獻。

兩年來的實踐充份證明，中國之春所提出的徹底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一貫主張是正確的，中國之春堅持採取和平方式達到這一目標的做法也是深得人心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正在邁向的前程是無比壯麗而光明的。

然而，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於我們的態度却是令人失望的。你們不僅對中國之春進行誹謗和中傷，而且在留學生中散佈她是「反革命組織」，千方百計阻撓，限制留學生與其接觸，甚至指派專人監視、控制留學生的行動，打探中國民聯日本分部的內部情況等等，居心和手段不為不毒。

鄧小平主任曾經表示過：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准許台北當局駐港機構的繼續存在，而且還許可他們罵共產黨。然而，對於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留學生却又為何神經過敏，怕得要命？我們稍提點「離經叛道」的改革建議就會被責為大逆，剛講點利國利民的心理話也會被視為不道，甚至被戴上「反革命」的嚇人罪名，這還是在外國的土地上啊，倘若是在共產黨的手掌心裡「罵共產黨」，還怎麼得了！因此，以你們今日對待中國之春的態度而言，鄧主任對香港的一切承諾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該令世人心中心中劃個大大的問號了。

中國之春已經走過了兩年的奮鬥道路，事實證明她是嚇不倒也壓不垮的，她光明磊落的嚴正立場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民聯日本分部也是深深扎根在中國留學生和廣大中日民衆之中的，並且時刻與國內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這個鐵的客觀現實是不會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一切辱罵、攻擊中國之春的人只能暴露自己的虛弱和理虧，一切否認、排斥中國之春的人只能說明自己的不智與愚昧。

在此，我們要求大使館向中共中央、中國政府轉達我們的下述意見：

- 一、准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中國國內合法存在；
 - 二、准許「中國之春」雜誌在中國國內註冊發行；
 - 三、釋放國內在押的民運份子和持不同政見者；
 - 四、尊重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人權，停止對同情、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留學生進行迫害的行為。
-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日本分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一、大批軍隊高級將領退休

最近，中央軍委宣佈，四十餘名軍以上高級軍事將領退休，回家養老。此事，人們早有預料，中國之春雜誌也早有報導。早在一九八三年的第三期中國之春雜誌上，我們小組就在「軍隊改革的一些內幕」一文中，指出軍隊改革的重點之一是「超齡的師級幹部一般要轉業，分配工作，調離本部隊所在地區。軍級以上幹部的退位則根據情況予以適當照顧，統籌安排。退下來的軍以上幹部，原則上離開首都『養起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份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後，軍隊改革一直在往前走。這次，又一批高級軍官退休，乃是部隊年青化的繼續發展。

二、軍隊幹部年青化的真正目的

軍隊幹部年青化是值得肯定的方向，從長遠來看，它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然而，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鄧小平和胡耀邦這次推行的

鄧小平突起「退意」

(北京)柳平

部隊幹部年青化，近期目的是想掃除軍隊對改革的阻力，并增強胡耀邦在軍隊的影響力。無人否認，軍隊中不少老軍人對毛澤東懷有深厚而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他們對當前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改革政策，有較大的抵觸情緒。鄧小平認為，如果繼續讓這批老軍人掌握軍隊的實權，在鄧小平閉眼之後，他們又可能聯合起來，將胡耀邦除掉。鄧小平曾在私下對某些軍隊幹部說：「你們不要看不起胡耀邦，不要以為比胡耀邦的資歷深。你們要看到他的長處，要支持他，他這幾年幹得不錯嘛！」說這些話，本身就應證了很多老軍人對胡耀邦有反感。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教育他們吧，都太老了，腦筋不易轉過彎來。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的軍權奪下來，把他們統統清理出部隊。

老的去，年青的就可以上來。鄧小平認為，新被提拔的年青軍官，由於是在鄧小平、胡耀邦掌握時期提上來的，自然會傾向、支持提拔他們的人。這些人理應支持胡耀邦，成為胡耀邦的軍事基礎。因此，鄧小平的軍隊幹部年青化政策，實際上是為胡耀邦接管軍權做組織準備。去年，鄧小平在視察東海艦隊時，就

曾對幾位年青軍官講：「你們是在新形勢、新政策下提升起來的，要支持新經濟政策、保衛新經濟政策。」意即讓他們支持胡耀邦。

三、退休將領的牢騷

這次，鄧小平一下子解除了四十多名高級軍事將領的軍權，在軍界中引起了不少的震動。一位總後的某部副部長，還沒有來得及把他的一名親戚弄到深圳，就被通知卸了職。他大發雷霆道：「他媽的，老子才七十來歲，就把我趕走了。我走了，他們（指托他辦事的親戚）怎麼辦？一退休，就變臭了，沒人理了。爲什麼鄧小平不退休？我還比他小十來歲，他倒好，把子女都弄到外國過過癮，連個難兒子（指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也弄到香港兜兜風！」這位老紅軍的牢騷不是沒有道理，在我們國家，「有權就有一切」、「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的影響太深。幹部，尤其是軍隊幹部，一退休，就失了權。失了權，就什麼也沒有了。聽說在美國，當官的退了休，或離了職，還可以去做大公司的董事長，去做大學教授，仍

然很受人尊敬。實在沒什麼職務可幹了，還可以寫回憶錄，既出名、又有錢。這就是說，社會提供人的選擇機會很多，當官只是普通的一條路而已。在我國，要想出人頭地，要想過好日子，只有想方設法去當官。一丟了官，就失了一切。這就是為什麼戀權的原因之一。

像那位副部長的牢騷，在各軍區大院中多得是。消息傳到老鄧那裡，他覺得問題有點嚴重，就找了楊尚昆、王平、洪學智等人來商量。

四、鄧小平突起「退意」

鄧小平找他信得過的人商量時，曾表示不過，由於退休軍人牢騷太多，爲了緩和和大家的情緒，他可以考慮完全退休。鄧很明白，大家的很多怨言都是冲着他的來的。他不退，誰也不服。鄧會對和他住在一起的大兒子鄧樸方說過，他年紀太大了，身心很疲勞，他真有意退下來。他認爲，退不退都差不多，什麼都不當了，只做個普通的黨員，仍然可以控制全局，只要他在世，大權就在他的手裡，與其掛那麼多官銜，讓別人攻擊，成爲別人戀權的藉口，不如什麼都不做算了。鄧在公共場合是個鐵腕人物的形象，可是，據鄧樸方講，鄧在他面前，很有人情味，有時也猶豫、也拿不定主意。

據透露，楊尚昆、洪學智等人不同意鄧小平這麼快就退居幕後，他們怕出亂子。但據軍區大院有人說，楊、洪等人不叫鄧小平退，是有私心，因爲他們年紀也不小了。鄧小平一退，他們自己怎麼辦？是否也要跟着退？

看來，形勢已使鄧小平欲罷不能。今年，要召開黨的全國特別代表大會，從現在起，鄧小平的去向問題，必會受到各方矚目。

特異功能「救」葉帥

(北京)柳平

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爭論，在北京持續了很久，現在平息了下來。結論是：可能有這麼回事，但機理不明。所謂特異功能，指某些人能望穿鐵板、耳能「聽字」之類。

最近，據中央高幹保健小組透露，人體特異功能有了新用場，對疾病可能有特殊的治療作用。葉劍英元帥用了特異功能治療之後，病情明顯好轉，已能和前往探視他的王震、楊成武等同志談話。據云，北京某劇院演員手可產熱，置於他人皮膚旁，可使其局部發生熱感。這位演員被請去給葉帥治療心肺疾患，據稱效果不錯。還有一位「奇人」，手可產生類似X光的射綫，也被請去參加搶救。

葉帥病情好轉後，對特異功能很感興趣，專門叫醫護人員給他講解特異功能，並說要好好研究它的原理。

葉帥患的是嚴重的動脈硬化、心臟病、慢性氣管炎、肺氣腫和腎功能衰弱。這種病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最嚴重的是，此病一到冬天就加重。據透露，前些日子葉帥又曾陷入病危狀態，經搶救後脫險。

人到了那麼大的年紀，就好像一盞要滅的燈，幌幌忽忽的，不知什麼時候突然滅掉。



葉帥家屬擔心，前些日子葉帥病情稍有好轉，可能是迴光反照，不見得是特異功能的效

果。

醫務人員說，葉帥身體主要部件已經「稀里花啦」，經不起半點風吹草動。他們擔心葉帥不一定熬得過今冬。

解放軍面臨的新問題

(國 內) 楚青原

解放軍的威信大降

六十年代，當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掀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及「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高潮時期，解放軍在人民中的威信可說是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從解放軍中湧現出來的邱少雲、黃繼光、董存瑞、雷鋒、王杰等人物亦成了廣大青少年崇拜的英雄。毛澤東爲了將青年訓練成爲永不生鏽的革命螺絲釘，更親筆作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從此雷鋒也就成了人們普遍效法的榜樣。那麼人民要向雷鋒學習什麼呢？向雷鋒學習「助人爲樂，尊老愛幼，勤學毛著，熱愛集體」等，總之雷鋒集一切好的行爲于一身，真堪稱幾億人民之師表。想當年，人們在政治學習時最常用的材料，除了「毛主席語錄」和中央文件外，則要算是「雷鋒日記」了。而當時的人們也確能「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到處都推舉「雷

鋒式」的人物，而解放軍中尤多。由于雷鋒是解放軍的典型代表，因此若說雷鋒是人民學習的榜樣，那麼每個解放軍也同是人民效法的榜樣了，而解放軍在「工、農、兵」三大階級中的地位也就最高了，當然解放軍的地位之所以高，也是因他們爲中共立了汗馬之功的。

由于解放軍有這樣高的威信，因此當轉業軍人被安排工作的時候則倍受地方單位幹群的歡迎，甚至大家都爭着接納轉業的軍人。

文革爆發後，各地造反派林立，有些人在「鬥私批修」中學會了自私，這種現象自然也影響到解放軍。從此解放軍中雷鋒式的人物不多了，甚至有人認爲雷鋒是傻子，最後竟在人民群眾中流行「雷鋒死了」的說法。這時人民當然不會再把解放軍當作自己學習的榜樣了。

在「三支兩軍」之際，也就是解放軍涉入文革最深之時；特別在「支左」方面，當解放軍支持一個造反派的時候，自難免要壓制另一造反派。本來來自人民的解放軍應爲着人民的

利益而保衛祖國的，應受到人民的歡迎的，但現在竟由于支一派，打一派，所謂「軍民一家」的良好關係遭到了破壞。

由于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解放軍是挾中央指示而令諸派，這自然助長了解放軍的特權意識。當兩派鬥來鬥去，人人感到不能自保的時候，唯有解放軍能緊握手中槍，指揮着一切。從此軍中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包庇私案，開後門等各種不正之風盛行起來。軍中的這種風氣自然會招來許多專以請客送禮，拍馬屁來拉關係的人。這些人一旦和某個軍幹拉上關係，要辦一切常人辦不到的事也就不成問題了，如調職、升學、回城、參軍、購買奇缺的物品，甚至包庇案件，對一般人來說是相當棘手的事，然而若有一個軍幹能幫你打上一通電話，或寫上一封信，那麼一切都有希望辦成。相反地，當時各級行政幹部多被打成「黑幫」和「走資派」，甚至「叛徒」，權利名利當然盡被剝奪；而知識分子則被定爲「臭老九」；地、富、反、壞、右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唯有解放軍政治最清白，權利最有保障，因此後來有人稱解放軍是個「獨立王國」。

轉業軍幹作風霸道。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單位幹群每聽到上級將派轉業軍幹來時，人們均表示歡迎，甚至有爭搶的現象。原因是他們認爲轉業軍人要麼是跟從毛澤東長征過的老紅軍，要麼是某某將軍或元帥的部下等等，總之轉業軍幹都是立過汗馬之功的老革命，在政治上是紅的，歷史是清白的，在事業上必是忠于黨和毛主席的，因此上級委任他們要職是理所當然的，而地方單位幹群對他們的歡迎和尊敬也是應該的。然而，這些轉業軍幹在政治上紅則紅矣，在事業上忠則忠矣，但在行

政管理上卻不一定內行，在工作作風上也不免有將軍霸道的現象出現。因此，在七十年代，轉業軍幹就不再受地方單位幹群的歡迎和接納。但是上級若分派下來，幹群也只有硬着頭皮接受。

由于轉業軍幹大多是年老、無專業知識的軍人，因此，他們在領導工作中表現得外行、武斷、官僚、霸道等，結果到處出現瞎指揮的不良風氣。甚至到了八十年代，這種不良現象更相對嚴重。然而這一切都使解放軍的威信大大下降了。

轉業軍幹成了「足球」

近幾年來，鄧小平看到一些老化無知的幹部，其中多是轉業軍幹，大大阻礙了經濟改革的進行和各項新政策的貫徹執行，因此他積極提出領導幹部要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要求外行讓內行，老年讓青年。而下面的幹部群眾和知識分子早就看不慣一些老幹部的官僚作風，又經鄧小平這麼一指示，誰還會歡迎接納那些老化無知的轉業軍幹呢？因此，近年來社會上就轉業軍幹流傳這樣的說法：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像籃球——大家搶；後來（七十年代）像排球——大家推來推去，現在則像足球——大家都往外跑。

解放軍出現徵兵難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每逢解放軍征兵，都有廣大城鄉青年因慕「一人參軍，全家光榮」而踴躍報名，但每次錄取的數量只為徵兵者的百分之三或四，可見當時入伍之難難于今日大陸青年進大學了。當時之所以有那麼多青年報名應徵，就城市青年來說，他們既無考學的機會，又無分配工作的可能，若不隨軍，也就只有「下鄉鍍金」一條路了，二者擇其一，下鄉畢竟還不如參軍；就農村青年來說，農民生活向來貧苦，除了種地外更無任何出路，因此參軍也就是他們唯一可爭取的出路了。總之，在那以「政治掛帥」和經濟落伍的年代，人們認為是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兵高啊。

然而，當進入八十年代之際，解放軍徵兵時，竟在部分農村出現徵兵不足的現象。鄧小平復出後，一方面積極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鼓勵人們重視知識；一方面又鼓勵人們「向錢看」，因此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改變。青年們不再單為追求政治上的地位而報名參軍，反而變得較以前更為現實。由于經濟改革在城鄉的推行，以及一系列開放政策的落實，廣大青年們對自己的前途有了較大的選擇餘地。例如他們可以從事各種可行的中小企業、商業等來賺錢；他們亦可以努力學習爭取考入大學或出國留學；甚至可以通過自學來獲取大學文憑等。其次，由於人民經濟的好轉，生活得到了改善，解放軍每月六元人民幣的金帖的待遇已相對低下，盡管後來巧立名目加到十多元，但與萬元戶比起來，其誘惑力自不可同日而語。由于對知識的重新肯定，青年們自然看到那些不學無術的轉業軍人將要被冷落或淘汰，因此對昔日解放軍的那種特種權利不再抱有幻想和憧憬。人之存在價值的大小，本來就取決于社會對其需要的程度。而現在的中國社會，顯然是對「富」人和知識分子的需要較大，盡管有些人不願面對這個現實。總之，是價值觀念的改變決定了人們的取捨趨向。

現在，還有幾個年青人願參軍
做雷鋒這樣的「傻子」？



自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大陸首次出現解放軍徵兵不足的現象，這不得不算是嚴重問題，因此引起了中共的關注。中共為了克服青年不願當兵的這種傾向，遂在去年時頒發了新兵役法，進行新兵役法教育，規定所有適齡的青年公民都有義務報名應徵，不管是在學或在職的等等。

不過筆者認為，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將繼續轉變，而廣大青年將會更加注重賺錢或萬元戶或其它事業而輕視當兵，因此共產黨領導為了防微杜漸，必須在鼓勵萬元戶和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的同時，相應地提高解放軍的待遇。為了提高解放軍的威信，首先要提高解放軍的素質，特別是在科學文化方面的素質，肯定解放軍的適當地位，改進解放軍的作風等。

國內城市改革弦外曲

(中國大陸留學生) 呂東荳

工資大增與通貨膨脹

在中國推行的經濟改革中，廣大的職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直接利益，除了領取獎金外，就是工資的提升了。近兩年內，大部份職工們的工資幾乎每年都能得提高。據一位剛出國來美探親的朋友說，他的工資到去年底為止已增加到原來的二倍（由六十多元增至一百二十餘元），他們家中先後添置了電視機和國產洗衣機。隨着工資的提升，物價也在上漲，尤其是吃的東西在一直漲價。通貨膨脹是在所難免的。國內已傳達說，到今年年底，工資還要再漲一倍，即城市改革前七十元左右的工資，要漲到二百左右。他說，他也儲備了些糖和油等，以防將來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

濫發代購券

在近期的城市改革中，全國各單位領導及職員都千方百計、獨出心裁地設法把本單位搞好，因此在一些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收效，如一些城市爲了招集遊動資金來開發經濟，便

嘗試發行了股票等等。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如近來國內一些城市濫發代購券即爲一例。

發代購券本是由發獎金演變而來的。起初單位發獎金就是發現款，但後來則由代購券代之。代購券的缺點首先是它本身對購買物品和日期的限制。假如一個人本來計劃買一些糧食，而他卻領到一張購買棉布的代購券，這時他會感到困擾，因爲他實在不喜歡棉布，而他又沒有選購其他物品的餘地，也不能當作現金儲存起來，因代購券過期作廢。其次是走後門現象。由於在各種各樣的代購券中必有少量的短缺物品的稀有代購券，而這些稀有代購券又是現時人們都希望得到的，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有些單位負責發代購券的人或領導則把稀有代購券留給自己或發給自己有私人關係的人，而群眾發現這一新後門後，自然也會有一些靠請客送禮和拍馬屁來拉關係的人出現。因此代購券越盛行，而這一新的後門也就越大。最後則是代購券給一些單位提供了派購倉庫中積壓經年爛貨的機會。由於持券人失去選購物品主權的同時，正是發行代購券單位擁有銷售商品主權的時候，因此一些銷售部門便可根據自己的經營情況，來分配代購物品，而不是根據群眾的真正需要來分配。這樣商品銷售部門則可

把一些不合格或過時的商品強行派購給持券者，或者把一些搶手貨控制住，以此來控制市場。總之，代購券是政府藉犧牲群眾方便來轉嫁市場危急的一種形式，因此群眾對代購券很不滿意。

外幣走紅

近年來由於中國對外國資金的需要量增大，因此政府在各市場上對持外幣者提供了許多種優惠待遇。例如，一般人買不到的熱門貨或進口的稀有貨，持有美元或日幣或港幣的人就可大大方方地走進僑務商店（這種商店在各大大城市中都有，無外幣者進都不許進）廉價選購物品。因此國內傳開了兩個順口溜：衙門口，往南開，有理沒權莫進來；僑務店，朝洋開，沒有外幣莫進來。再如持外幣者買機票、車票或船票等，也可以優先。可見持外幣者在國內已經成了一個特權階級。趨於特權是人性的一種強烈慾望，當人們看到其它特權不易得到時，但對爭取外幣方面，在當前開放的形勢下，則較有隙可乘，因此以各種方式獲取外幣的風氣盛行。例如，國內一些大城市中，人們可以比官方對換率大一倍的對換率在黑市上用人民幣換取外幣，而一些外資，主要是有經驗的華僑，由於旅館對持外幣者的收費不僅不優待，而且特高，所以他們倒很樂意擁有一些人民幣，以便以人民幣付較低的收費。可謂雙方皆大歡喜。再如，一些服務員對外資收費時，則必須外幣才可以，人民幣簡直成了廢紙。因爲這樣服務員不僅可以私下擁有外幣，而且可以抬高收費。這種現象在計程車司機和旅館中尤多。因此許多歸國華僑也感到沒有外幣難辦事的困擾。

一九八五年元月份



北京青年的 「三熱」

(中國大陸留學生)呂東莖

近幾年來，隨着大陸經濟的改革，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更重要的是隨着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固有的價值觀念，並且開始接受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嚐試一些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and 內容。我剛從北京探親回來，有必要談談北京青年的「三熱」——音樂熱、跳舞熱、表演熱。

音樂熱

四年前，大部分北京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心欣賞音樂主要是靠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的音樂，因為當時有錄音機或收錄音機的還不太普遍，更談不上「大音響」了。再說既使有錄音機，也找不到大陸以外的歌唱錄音帶，因為那時大陸仍相當嚴格地禁止外面歌唱音樂磁帶進入大陸，既使有人設法搞到，也祇能在家閉上門偷偷地收聽。記得在我臨出國時，一位朋友曾把我叫到他家，並悄悄地告訴我托朋友從香港帶來一卷鄧麗君的錄音唱帶，特意請我去欣賞。

然而，今日的北京青年與昔日大不相同了。據說現在北京市民平均每五戶已有一台錄音機或收錄音機，不少市民還有「大音響」。有了收錄音機和大音響後，當然需要更豐富多彩的音樂內容來充實了，於是鄧麗君等港台名歌星的歌曲也就在北京流行開了。據說許多青年爲了彌補錄音帶的不足，還特別約定在復興門和西單等處互相交換錄音帶。北京青年對音樂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

表演熱

北京青年最近流行的另一種娛樂方式就

是在各種文藝聯歡晚會上登台表演。早在文革初起，在「破四舊，立四新」、「大唱樣板戲」、「打倒帝修反」、「埋葬封資修」及「憶苦思甜」等政治宣傳的聲勢下，文藝聯歡會在全國各地就曾盛行一時。不過那時表演的內容實在太單調枯燥無味，政治氣氛極濃，舞台上充滿了火藥味。這樣的聯歡會當然不會令今日北京青年們滿意，更何況其內容與當今經濟改革政策相衝突。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青年們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新的要求，而新時代也爲青年們帶來了新的內容，那麼要將這新內容表現出來，舉辦文藝聯歡晚會上來登台表演則再直接了當不過了。因此，北京的許多單位及學校青年們經常舉行各種類型的文藝聯歡會，並且親自登台表演。表演節目大多是流行的歌曲、歌劇、舞蹈等，其內容也極豐富多彩，與文革期間文聯會上的表演內容是迥然不同，而對表演的熱情較文革中却有過之而不及。

跳舞熱

舞會——在大陸多年被認爲典型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漫長的歲月中消聲匿跡後，近幾年在大陸以各種方式又頻頻出現了。最初，青年們由於不敢公開跳舞，大多是十幾人一群，找隱蔽的地方學跳交際舞，在當時這種行爲若被單位領導知道後會受到嚴厲批評的，甚至許多家長也責其行爲下流。最近，情況大變了。一些大城市的工商等企業單位，藉各種節日活動之際，以各種名義舉辦了舞會，甚至有的舞會的規模竟然超過了五十年代周恩來、陳毅等舞迷所舉辦的舞會規模。而一些較開放的沿海城市，如上海、福州和廈門等更開建了公開舞場，這種公開

舞場據說在北京還沒有，不過未公開的舞場已有很多，而在不久的來日也會有公開的舞場出現。

在這種單位舉辦的舞會方面，一向被稱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當然也不會落後太遠。但這一來，却更加激發了北京青年跳舞的熱情。許多青年們除在單位舉辦的舞會上跳舞外，還常常到自已私設的舞場跳，而且跳得也大膽了，起初跳的是交際舞，但現在也跳迪斯克和狐步舞了。

其實，這種所謂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雖未得到中共領導人的提倡，但却有他們的默默認可。不僅認可，更有他們的帶頭，正是「幹部幹部，先幹一「步」」——「領導領導，領在前「頭」」。例如，今年元月初，北京有關單位在華都飯店舉辦大型的「春之光」舞會的時候，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北京市副市長陳昊蘇等竟都光顧，擠入翩翩起舞的青年人群，一圈一圈地跳了起來。身在其情其景中，想他們心中那種樂滋滋的興奮必能抵抗其精神上的「污染」吧！舞後，大家還稱讚彭沖是「不減當年」（因彭沖曾是五十年代的跳舞老手），稱讚陳昊蘇是「後起之秀」（因陳是跳舞新手）。可見共產黨領導人物在接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方面亦非平凡之輩了。

許多北京的單位，甚至中國領導人為了招聚更多更好的跳舞青年，為了學習更新穎精美的舞蹈，特意邀請醫學院和外語學院的學生去參加舞會，因為這兩類學院擁有女學生，跳舞最缺的就是女青年。特別外語學院的學生，有許多外國的教授和留學生，他們更是跳舞的宗師。為此，各舉辦單位和與舞會領導人還派專車接送學生們。這樣一來，兩院學生也便成了他們的搶手貨了。



嚇人的一比八

（中國大陸留學生）黎玉瓊



剛出國的自費生，不得不先去餐館，接受一下「打工」的洗禮，我也未能例外。去餐館沒幾天，結識了一位打工同伴。我告訴了他一個國內消息，把他氣得半死。說來消息不大：北京、上海等地的外幣黑市上，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值已漲到一比八。北京飯店、上海錦江飯店外，有人揣大把的人民幣，專門去搭訕外國遊客和回國觀光華僑，以八元人民幣的價錢，去換一元美鈔，人家不換，還迫在後面求人換，那種樣子，實在可憐。官方的兌換率為一美元兌二塊八毛人民幣，與黑市相差近三倍！

我的打工伙伴一聽，氣得半天說不上話來。他告訴我，他每月固定給國內親戚匯美元，兌換率是官方的一比二點八。他工作辛苦，掙錢不多，可是，還要接濟國內的窮親戚。原來他挺滿意，十元美金在美國只夠吃頓飯，但換成二十八元人民幣，可以供國內一個人生活一個月。一聽到黑市比價為一比八，他吃驚地說：「我要早知道，就不在紐約直接匯錢了，我會托人帶回去，十元美金換八十塊中國錢，頂一個中級幹部的工資！以後我不在這裡匯了，不再直接寄了。」他甚至懷疑他匯到國內的美

元，是否被官方某些人貪污了，因為他解釋不了官方與黑市的差別為什麼那麼大。

其實，官方貪污是不敢的，但是中國領導人千方百計吸收外資却是實實在在的。為了方便僑胞向國內寄外匯，北京政府宣佈紐約的四家銀行可以直接辦理向國內的匯款手續。這四家是中國銀行、大通銀行、滙豐銀行和恒生銀行。

國內通貨膨脹日趨嚴重，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已成眾所周知的事實。五年前，一美金兌一塊二角五人民幣，五年內，官方比價翻了三翻。至於黑市，上漲就更嚴重了。

國內不允許拿人民幣兌換美元，可是，很多高檔貨又必須用外匯購買。外匯券商店售貨員只認外幣，不認人民幣。於是，為了買好貨，只有上黑市兌換外幣。還有一些家長，想資助子女自費出國，國家不准換那麼多的外匯，他們只有去找黑市。

僑胞們，當你聽到一比八的黑市兌換率之後，再去中國銀行向國內寄美金時，你心中有何感觸呢？

嗚呼！什麼時候我們國家的錢比美元更受人尊敬呢？（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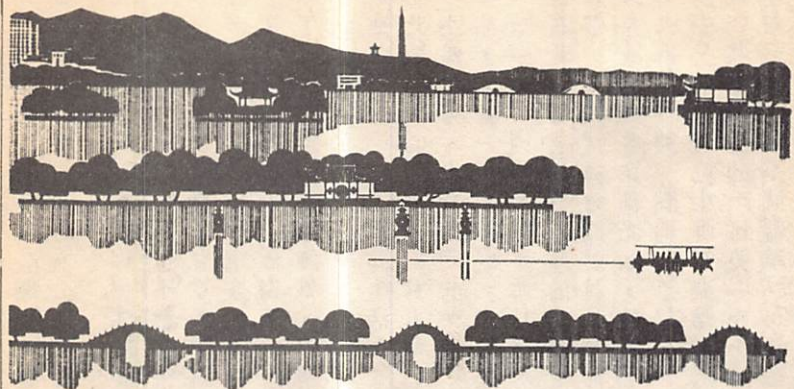
杭州—波士頓

的

姊妹夢

(中國大陸留學生)

齊曉楓



最近，隨着大陸的經濟改革風，各大城市紛紛竭力向外發展，紛紛要求美國的城市和他們合作，結成姊妹城市，以取得外交上和經濟上的利益。

這種做法撇開外交利益不談，如果是對中國人民生活上有好處，本來也不是壞事，可是有些政府部門官僚習氣太重，積重難返，結果是勞民傷財，落得個水月一場空。杭州市就是一個例子。

杭州市政府一直謀求和美國波士頓市結成姊妹城，出動了不少人力物力，花了不少錢。首先是請了波士頓市長懷特及其隨從一行十一人，路遠迢迢跑到杭州去「訪問」，事先也不作全面深入調查研究，到底杭、波兩市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雙方的利益均衡如何？也不調查波市最近的經濟狀況，政府人員的架構和動向，這個市長還有多少任期？結果波士頓這十人十一天在杭州，住高級旅館、坐高級轎車，遊山玩水，據估計共花了杭州五萬元的訪問費，還不算杭州出動的迎送的人力物力。誰知這個懷特市長回來不久就下任了。

杭州市長鍾伯熙却一直矇在鼓裡，以為我請了你，你也請我來美國跑跑，於是成日價地電報書信寄到波士頓市政府，還具體提出「回訪」的要求，也要美國出錢，提供回一個人十一天的旅行費。波士頓却給他一個不理不睬，把個鍾市長急得直跳腳。一方面外交面上上掛不住，另一方面花了錢又無法向北京交待，第三（也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自己和隨從們也出不了國了。

中國的外交情報實在太差勁了，其實波士頓人是心知肚明的。

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波士頓和杭州根本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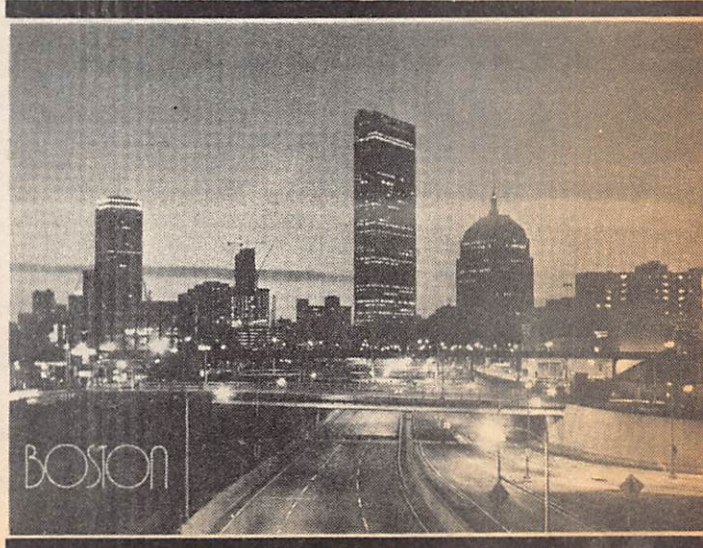
不是一對好的姊妹城搭配，杭州只是個遊覽地區，不是大工業城市，產品無資格和波士頓對流。

一位商業界巨子說：杭州不是個特區城市，出口稅比特區高出一倍，誰願意幹這種買賣？

一位不願透露名字的官員說：波士頓市政府的錢都來源於房屋稅和抄車牌費，最近波市通過新法，房屋稅銳減，市府正在叫窮叫苦連天，誰敢批准大筆費用去請一班沒有希望的「訪客」？要問，你們去追懷特好了。

懷特呢，他早當退休市長，享其晚年福去了。且讓在杭州的鍾市長自嘆倒霉去吧。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可憐的倒是杭州人民，花了血汗錢，又被當政者們耍了一場。姊妹市最後成了姊妹夢。

這實在是值得中國的改革派們注意的事，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國內新流行的兩個順口溜

（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徐克平

最近，有人回國探親回來，和我聊了些國內的新形勢。已出國二年的我，對很多消息感到新奇。尤其幾個順口溜，使我印象深刻。現寫出來，以饜讀者。

第一個順口溜是反映群眾對中共中央高層領導的評價的：

小平小平說啥都靈，耀邦耀邦手伸四方，紫陽紫陽專搞改良，劍英劍英風燭殘燈，陳雲陳雲有精無神，先念先念說啥不算。

這個順口溜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的現狀和處境刻畫入微。它指出了鄧小平的專權、霸道，說明了胡耀邦四處求援、接班大有障礙。「紫陽專搞改良」一語，刻劃了趙紫陽一心搞經濟的技術官僚特質。李先念有職無權，只是個掛名的國家主席，這在國內人人皆知，「先念先念說啥不算」描述了這一狀況。這段順口溜，最精彩的莫過於「陳雲有精無神」一語。陳雲現已成爲保守派的首領，現在改革大勢下，已無能爲力，難以阻擋歷史的發展。

第二個順口溜反映了當前農村和城鎮經濟改革的某些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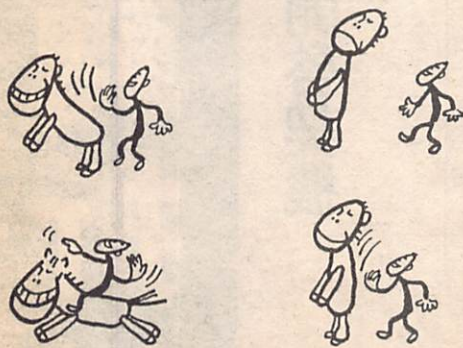
富了投機倒把的，紅了弄虛作假的，升了溜鬚拍馬的，苦了安份守法的。

當然，這可能不是農村改革的全貌，但既然這段順口溜在華北、東北一帶廣爲傳頌，也必定反映了某些真實的情況。如「弄虛作假」問題，連官方的人民日報都時有報導和批評。現在，黨的領導人大肆宣傳「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張旗鼓地樹立萬元戶的樣板。這種非自然地推動形勢發展的結果，必然要產生副作用。各地向上虛報「萬元戶」的事件屢見不鮮。有些戶年收入只有五、六千元，基層領導也湊數向上報喜，「四捨五入」到萬元戶之列。爲啥出現這種假報現象？道理很簡單，因爲上級有人欣賞這一套，萬元戶出得越多，基層幹部就愈紅、得到上級重視、獲得升官的機會就愈大。至於溜鬚拍馬者易於高升的定律，恐怕國內來的留學生們都有直接感受，我不願贅言了。我倒要評論一下「苦了安份守法的」這一句。以前曾有一個順口溜爲「搞四化」，全文是：「農民自由化，工人獎金化，幹部特殊化，知識份子貧困化。」這「知識份子貧困化」與「苦了安份守法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知識份子，包括歸國的一些留學生和學者，大都有清高之風。他們在新經濟改革的浪潮中，既不願拋棄原有職業去經商，又難以通過較體面的辦法去搞錢。在「工資長比不上物價長」的形勢下，生活的確不如工人和某些富起來的農民。怪不得北京知識界流傳着一句笑話：

「什麼都在長，就是鄧小平的個兒不長！」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給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看來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而應該拿出具體的措施了。

在共產黨對意識形態領域嚴加控制、人民不能真言的今天，天才的中國人民創造了兩種高超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心聲：一是漫畫，二是順口溜。但願有心人將它們收集起來，將來也可算是一種歷史的見證。



一拍即合 刘庆涛

歷史的關鍵性轉折

——文化大革命給中國走向多元化社會開啓契機

王驚蟄

作者簡介：王驚蟄是王炳章的筆名。王炳章，男，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一九八二年學業結束後，投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請珍惜研究「文革」的黃金時機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目前正在展開全面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運動。不管其動機如何，否定「文革」運動的發起，再次引發了人們對「文革」的回憶、思考、研究與評論。

歷經十年的「文革」，不但是中國歷史，而且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遠遠超出了它的名稱所界定的文化範疇，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軍事等各個領域，觸及到每個人的靈魂，真可謂洋洋大觀、包羅萬象。在短短的幾年「文革」中，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所鑄成的各個層面、中華民族民族性的一切特點、中國社會中長期被強力掩蓋的結構底層的秘密以及世界各國對古老中國影響的痕跡，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展現在世間、特別是隨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的面前。

這種大暴露太寶貴了，因為它節省了千千萬萬歷史學家為揭開歷史表象、挖掘歷史真諦所做的努力，也掃除了派別觀點的爭論罩在歷史研

究上的迷霧，它把事物的本來面目還原并呈現給了我們，讓我們看得痛快淋漓，然後又讓我們自己去思考、去研究、去結論。

在充當歷史的教員這一點上，我還找不出任何一個歷史現象能與「文革」相匹配。

然而，對我們當時還未成熟的這一代來說，「文革」對社會的大暴露太過份了，也太快了。一位紅衛兵文學的開創者曾對我講，「文革」把我們這一代應該在大一些年紀和幾十年中逐步看到的東西，只用了幾年、幾月，甚至幾天就展示給了我們，使我們眼花潦亂。就像七、八歲的頑童看到父母又添了一個弟弟而不知道他的來歷和涵義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對「文革」的理解，一時可能是十分幼稚的。此外，「文革」短時間內強令我們吞下那麼多的東西，的確一時難以消化，要經過多次的反芻、細嚼才能吸收其營養成份。

只有捲入「文革」的漩渦，又能抽身出「文革」激流的人，才能深刻體會到「文革」的內涵。

對於「文革」的研究和評論，我個人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要以科學的態度研究「文革」，避免簡單「否定」和「肯定」的結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目前發動的全面否定「文革」的運動，並不是研究「文革」，而只是為其政權服務所做的一種宣傳。不用說對「文革」這樣一個氣象萬千的複雜事物，就是對某個單純的社會現象，也很難用簡單的「否定」或「肯定」加以定論。把「文革」籠統說成應該「否定」或應該「肯定」，就好像把顏色只分為「黑色」和「白色」，把氣候只分為「天冷」和「天熱」一樣，是一種單元思維的反映。單純「否定」或「肯定」的結論，不但符合實際情況，而且不能真正汲取歷史的教訓。

第二，對「文革」的總結和評論，有一個最佳時機的問題。民刊「野草」的編輯肖平認為：「文革」就像「掛在天幕上的一幅巨畫，就難以看出它的全貌。只有當歷史的車輪把我們駛往遠處，才能仰視其真相，理解其歷史的內涵。」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都親身經歷過「文革」，都曾是整個「文革」歷史巨畫中的一份子。我必須承認，當我十幾年前進在「文革」的歷史舞台上表演的時候，我連自己所扮角色的作用都不十分清楚，更不用說整個歷史劇的意義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退下了「文革」舞台，遠離了「文革」畫卷，今天回首，才看出它的輪廓。然而，看清整個「文革」的歷史畫卷，並不是離它越遠越好。太近，只看樹木，不見森林。過遠，則整個森林也會變成一個斑點，歷史事件就會變得模糊。研究「文革」的最佳時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在世的時候，就是從現在到未來三、四十年的時間。我們對「文革」有着親身的感受——這是後人所不具備的最寶貴的東西；經過十年來的回顧與思考，我們也已離開「文革」一段距離。利用我們餘生的時間，從各個角度研究和總結「文革」，特別是為後人留下第一手的感性資料，是我們這一代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我相信，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將持續幾百年、幾千年。在後人「文革學」的研究中，最寶貴的資料將有二種：一種是「文革」中各種官方文件、各種民辦小報、大字報選輯和其它出版物；另一種就是「文革」結束後，一代人覺醒並走向理性所寫的文藝作品、回憶錄和評論。

第三，研究「文革」，要像研究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一樣，既要把它從歷史的連續層中遊離出來並加以解剖，從各個角度洞察它的不同層面，也要把它還原到世界範疇之中和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去，從時空的宏觀上闡述它的作用。

下面，我僅就想到的幾個問題，談談個人的一孔之見，希望這些淺見只是提出問題，并非解決問題。

從世界範疇及中國歷史進程 看「文革」的起因

我認為，「文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發動階段，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發表到「五·一六」通知的下達。這一階段是毛澤東起主導作用。

第二階段是毛澤東和人民群眾相互利用的階段，從「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發表到一九六七年軍隊開始「三支兩軍」、介入地方「文革」。在這一階段中，「文革」的發動者和參與者相互利用。總的說來，起主導作用的是人民群眾，特別是在第二階段的中後期。

第三階段是鎮壓及反鎮壓階段，從軍隊「支左」開始，到工宣隊、農宣隊的派出，再一直延續到「清理階級隊伍」、「整黨」、「鬪批修」和「一打三反」等運動。這一系列官方措施都是鎮壓蓬勃興起的群眾運動，以圖恢復秩序。其間充滿着鎮壓及反鎮壓的鬪爭。整個一代在這場鬪爭中逐步覺醒。我先對「文革」進行一個大致的分段，為的是後面討論的方便。

研究「文革」，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它的起因。解開這一疑團，首先要思考下述兩個問題：第一，「文革」為什麼不發生在五十年代？今天在中國搞「文革」，還能否發動起來？第二，「文革」為什麼出現在六十年代的中國，而不出現在其它國家？這兩個問題迫使我们從世界的範疇及歷史的進程中尋求「文革」的起因。

從世界範圍看，整個六十年代是左傾思潮和理想主義泛濫的年代。那時，沙特和卡謬的思想理論風靡全球，古巴革命的成功實踐激勵着落後的民族和資本主義大國中反抗現實的青年。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毛澤東領導的反修鬪爭如火如荼。整個世界局勢的畫面，是人類在技術大革命面前呈現的不安和共產主義運動由於經濟政策失敗，而開始反省時，落後民族表露出的惶恐。

六十年代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自由言論運動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交相呼應。隨後興起的反戰情緒和嬉皮運動竟釀出大肆燒毀美國國旗的激烈場面。在沙特和卡謬的故鄉法國，青年人舉着三

M（三M為馬克思、毛澤東和馬丁·路德金三人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標語牌，向舊秩序宣戰。從南越到泰國，從日本到南朝鮮，處處都有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

六十年代確是左傾思潮和理想主義旗幟飄揚的年代，而七十年代走向反省，到了八十年代，則保守主義——要求尊重傳統價值和緩進式改革——普遍抬頭。英國保守黨的連任、加拿大進步保守黨的重振雄風以及里根總統的再次當選，都說明了這種潮流。就連中國領導人當前的從新尊孔和愛國主義教育，以及經濟上的改革，都可視為這種潮流中的一個浪花。最近，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年青人中，約三分之二支持共和黨總統里根的保守主義，這也可視為保守主義興起的一個注腳。

再讓我們回到那瘋狂的六十年代。那時的中國，也沒有脫離世界範圍的左傾思潮及理想主義激情的漩渦。

從我記事起，所接受的便是革命英雄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教育。前者的典型，是參觀革命博物館、請老紅軍講述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事跡和組織閱讀長篇小說「紅岩」。後者的活動，則包括聲援古巴革命的遊行，支持馬丁·路德金黑人人權運動的示威及抗議美國出兵越南等。這些活動與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活動——學習「九評」和到蘇聯使館示威——交織在一起，把我們這一代投入到世界總的左傾潮流之中。革命英雄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激情，夾雜着新中國成立及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所引發的自豪感，使我們渾身是勁，恨不得一下子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抱負。

可是，中國當時的現實却不能使年青人施展抱負。這個現實，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把中國的專制制度推到了頂峯。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和伸延到城市街道、農村小隊、學校班級的官僚控制，壓得人們、特別是年青人喘不過氣來。生產資料上的集權，把人們在經濟領域謀求發展的可能全部杜絕。在意識形態上，官方的教條統帥了一切。在文化傳統上，把「公」的價值絕對化，將團體主義觀念推到極端，完全抹殺了個體的價值。一句話，現實與理想形成巨大矛盾。那時，青少年中流行着一種感慨：「真是生不逢時，要是像我們的父兄一樣，生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有多好！年青一代對現實的參與感，被毛澤東們提升起來，又被專制制度的現實無情地拒絕。被壓抑的理想和個性，一定會尋找機會頑強地表現出來。

上面的分析，僅代表了當時一部份青年人的狀況。不可忽視的是，

「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的文革，是六十年代世界左傾思潮中的一個巨浪。



社會上還有另一部份力量，他們年齡較大，經過反右鬥爭等運動之後，思想較為成熟。十七年的官僚專制統治，已使他們覺醒。這部份人，也在尋找時機，嘗試打碎官僚專制的枷鎖。

如果我們將前一部份人稱為不自覺的反抗官僚壓迫的力量，後一部份人則可認為是自覺者，他們都需要一個契機。在當時，自下而上的發

起自覺和不自覺的反官僚專制的群眾運動是非常困難的。可是，幸運的是，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一個魄力無比的巨人，幫助他們把高壓鍋的蓋子掀開了。

那時，毛澤東需要人民的支持和參與。他在一系列政策失誤之後，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劉少奇等人的嚴重挑戰。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超理想主義者，他堅持，只有他的路線才是最革命的。在取得林彪軍隊的支持之後，他要實踐自己的理想。這個理想不僅僅是打倒劉少奇和他的追隨者——那樣做是容易的，因為他握有軍權，但那樣做，不會成爲世界共運的領袖。毛澤東的理想是超越馬恩列斯，他把着眼點放在世界的歷史進程上。在個人權慾和「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理想驅使下，毛澤東要把人民驅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驗場。這場實驗，不但將把劉少奇們掃出歷史舞台，也將「蕩滌一切舊世界的污泥濁水」，給整個人類歷史「開創新的紀元」。在這場實驗中，毛澤東認爲他也必將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

要發洩的人民，走向專制頂峰的社會，自大狂和超理想并想利用一下人民的極權領袖，三條綫在同一座標系中交匯在一起，歷史的扳機觸發了。這幾項「文革」發起的條件，只在六十年的中國才完全具備。我回憶了當時北京「文革」的發起情況，認爲在「文革」第二階段初期，即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發表後群眾大規模發動時，衝破僵硬局面的多爲下意識即不自覺反對官僚壓迫的青年人。局面打開後，年紀較大而自覺反對官僚專制的知識份子開始發揮作用，他們由推波助瀾發展到幕後和台前的指揮。在這一過程中，一部份原先下意識反對官僚壓迫的青年人也逐步上升爲自覺的戰士。

就像汪岷同志在「『李一哲』給後來人的幾點啟示」一文的結尾中指出的那樣，毛澤東發動文革，「就像『水滸傳』裡的洪太尉，揭開了那塊貼着『社會主義大民主』標籤的大石碑，放出來的那一百零八道金光，就永遠不會回到那暗無天日的地洞中去。至於這些好漢們要想些什麼，要幹些什麼，那就再由不得毛澤東的徒弟徒孫們了。」

毛澤東一旦點了火，火勢即不由己控。「文革」的烈火整整燃燒了十年，至今餘熱熾人。總的看來，「文革」是六十年代世界範圍的理想主義和左傾思潮中的最高巨浪，也是中國數千年來官僚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峯而由過高內壓造成的總的崩潰。

「文革」暴露的幾個問題

可以說，在「文革」的大火災中，當代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受益者。

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陶鑄、彭真、楊尚昆等老一輩打江山的共產黨人，在文革中坐牢的坐牢、整死的整死。原「八大」中央委員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遭到整肅。他們當然是受害者。

曾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四人幫，現在成了人人唾罵的階下囚。他們雖然在「文革」中不可一世，嚐盡了整人的甜頭，但到頭來，反被人整。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反被「文革」徹底毀滅。

「文革」的點火者毛澤東，其威望和聲譽更是被這場烈火焚燒殆盡。他也是被自己搞成功的革命所埋葬的一個歷史悲劇人物。

當然，「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全國的老百姓。中年知識份子創造成果的十年浪費了，當了紅衛兵、紅小兵的青少年荒廢了十年的學業。這筆債，他們向誰去討？

要講受益者，可能只屬於我們的子孫後代了。在「文革」將舊的專制大廈摧毀後，當新的民主大廈建立時，我們的子孫或許會認識到，「文革」是中國民主大廈動工典禮上摧毀舊建築的關鍵一炮。

「文革」中暴露的問題太多了，套句「文革」的語言，真是以「大海爲墨，藍天做紙」，也書寫不完。這裡，我僅談一下目前感觸較深的幾點。

(一) 一個民族的災難應由整個民族來負責和承受

「文革」，是苦難的中華民族經歷的無數災難中的一個，有人認爲是最大的。它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意義在於，我們親自目睹了它、體驗了它。它也教育、鍛鍊了我們這一代人。「文革」的災難是誰造成的？這是值得我們這一代人深深思考的問題。是外國列強的侵略？是巨大的天災？當然統統不是。有人說，「文革」的災難的製造者是毛澤東，鄧小平則說是四人幫，還有人說應把他們加在一起，統稱「五人幫」。更有人把罪責歸於紅衛兵，「反共」人士則說，「罪魁禍首是共匪、即共產黨。一部份民運人士則說是中國的專制制度製造了「文革」等等。從這些答案的提出者的角度分析，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是誰捧出了「五人幫」？是誰製造了「共產黨」？是誰締造、維護并容忍了專制的制度？中國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土壤在哪里？觸及到這些，我們不得不痛心地說，我們的整個民族有問題！正是中華民族本身，創造了世界上最穩定的官僚專制體系，創造了毛澤東這樣的悲劇領袖。最後，也創造了「文革」的災難。這場災難絕不能用外族和列強的武裝入侵來解釋，它是中華民族的自我傑作。到頭來，災難也要由整個民族來承擔，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自作自受」，也是歷史對中華民族的懲罰！

我們這麼說，絕不是在為毛澤東、四人幫開脫罪責，我們是在民族性的深度上反省自己。不錯，「四人幫」會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耻辱架上，但請記住，這個耻辱架并不能插在美國，不能插在歐洲，不能插在日本，而只能插在我們自己的祖國！修建耻辱架的，也將是我們中華民族自身。就像我們今天分享着祖先哺育出祖冲之、張衡、李時珍的榮耀一樣，我們的子孫也將永遠承受我們這一代人製造出「四人幫」的羞辱。他們都是我們民族的產物。

當然，誰也不能推掉領袖人物在民族的大災難面前所應承擔的責任。領導者的作用在於，當人民中蘊藏着改變現實的激情時，應冷靜地把握



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幫，如今被釘在耻辱架上。

這種激情引導到正確的方向，而不應該加以誤導、甚至利用這種激情滿足個人的慾望。毛澤東沒有做到這一點，伊朗的霍梅尼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伊朗目前正在走着中國「文革」的老路，伊朗的人民在若干年後，會得出同我們一樣的結論。

在中國之春運動剛剛發起、我在各大學巡迴演說時，某些近年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握着我的手、流着熱淚對我說：「王博士，我們在大陸受盡了苦，你可要救救我們啊！」每當聽到這種話，我都無限傷感。我深深地感到，正是這樣需要救星的民族，過去捧出了毛澤東，今天又燒香於鄧小平。對這些人，我的回答只能是：「世界上沒有哪個人能夠救你，你必須起來進行自救！」

有時，我們去找大陸旅美同胞，求他們幫忙。可往往得到的回答是：「你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是完全支持的，但我不能幫助你們，要是共產黨知道了，將來會整我和我的家屬的。」我們聽後，憂喜參半。喜的是，還有那麼多人同情和支持我們；憂的是，面對着這個被共產黨整怕的民族，我們不知該如何解除他們的怯意。我的腦海中常浮現出這樣的話：一個知道自己的奴隸地位而懵懵懂懂過着奴隸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奴隸；一個知道自己的奴隸地位，而又津津樂道這種奴隸生活的人，算是奴才；如果一個奴隸知道了自己的奴隸地位而又勇於反抗，那是英雄。在這三種人的標準面前，我們的民族又屬哪種呢？我常常想，真正問題出在哪裡？是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認識到大陸是專制制度呢，還是認識到專制制度的壓迫而又願意做專制制度的順民呢？如果答案是後一種的話，我們也必須面對這種冷酷的現實。但我還是希望說出一句話：我們的民族是應該充分反省的時候了，我們的民族是面臨抉擇的時候了。

(二) 社會的崩潰性正反饋調節和建設性負反饋調節

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左傾風暴席卷了全球，但它在各國所遭受的命運及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中國的「文革」使國家和民族大傷元氣。可是，六十年代美法等國的民族左傾浪潮，卻沒有給社會帶來什麼破壞，它反而幫助社會進行了有益的調節。

這裡，涉及到了社會制度的問題。

首先看一下不同制度的社會對群眾運動的處理方式。像中國的專制社會，統治者對群眾運動一般都是採取鎮壓的態度，鎮壓不了，再設法

對領導人招安，招安的目的仍在消滅。這樣便開始了惡性循環：群眾運動被鎮壓，專制者懼怕群眾而強化專制，社會更加腐敗，民衆的要求不但未有達到，其合法權力反而被進一步剝奪；群眾運動中的能量和營養未被權力結構所汲取，而是被反彈回到群眾之中進行擴散和增長，導致較前一次更大的群眾運動。如此往復，能量終於蓄積而引起火山爆發。整個社會也就在火山爆發中崩潰了。中國歷代農民大起義、國共內戰（實際也是農民起義）以及「文革」等，都是這種社會大崩潰的例子。專制社會用總崩潰的方式打碎了舊有的秩序，也以此消耗了由專制制度異化出來而又危及到專制制度自身的因素。此後，如果社會重建專制制度的秩序，則又將開始另一個周期的矛盾蓄積——崩潰——重建的惡性循環。

我們不妨將這種社會調節稱為崩潰性正反饋調節。

因個人經歷的關係，我比較了解反饋在機體調節中的意義。反饋的定義是靶效應反過來影響引起這種效應的原因。起增強作用的為正反饋，起減弱作用的為負反饋。比如，影響新陳代謝的重要激素——甲狀腺素的調節是典型的負反饋調節。腦下垂體產生一種「促素」，促進甲狀腺素的分泌。甲狀腺素分泌增多時，它經血液抵達腦下垂體，抑制「促素」，於是，甲狀腺素的分泌又恢復到原來水平。另一方面，機體內也有很多正反饋調節，血液的凝固即為一例。為了解解崩潰性正反饋調節，我們試舉下例：當某一靜脈血管堵塞時，局部組織由於血液回流受阻而腫脹。腫脹進一步壓迫其它鄰近靜脈血管，使腫脹加劇，以此形成惡性循環。如惡性循環不解除，過份腫脹終將障礙動脈血液供應，導致組織和堵塞血管的壞死和崩潰。這樣，機體用崩潰的方法去除了壞死的組織，也隨之除去了致病原——堵塞的血管。之後，新生組織長出，進行修復。

專制制度中的正反饋機理則是：群眾對專制制度不滿而產生群眾運動——專制者畏懼群眾而強化專制——群眾愈加不滿。最後，大規模反抗興起，社會崩潰。當我們從宏觀上研究中國的周期性農民大起義和群眾暴動時，則會發現它與在微觀上觀察到的機體局部組織壞死、崩解有異曲同工之妙。

反觀民主社會的調節方式則截然不同。在六十年代美國發生理想主義和左傾思潮驅使的群眾運動時，美國政府盡量採取避免正面衝突的措施，以防將矛盾激化。或者，雖然一開始某些保守人士進行壓制，但當

壓制的結果反使群眾運動高漲時，保守人士便汲取教訓、逐步妥協，答應群眾的合理要求，使矛盾化解。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自由言論運動便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保守的校方初期壓制學生在校園自由拍賣各種出版物的要求，反而激起學生和教授的大規模奮起。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和校方改變策略，答應了群眾的合理要求。群眾的要求達到了，群眾運動也就自動結束了。大概美國政府汲取了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經驗和教訓，在處理嬉皮反戰運動時，則採取了更開明的作法。當幾百萬群眾聚集紐約、舉行抗議集會時，政府並未如臨大敵，予以像中國對付「四·五」天安門運動那樣的鎮壓。政府反而給抗議群眾提供必要的服務，如交通、醫療和食品供應等。這樣，群眾一方面宣洩義憤、提出要求，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相應調整某些政策，群眾運動也就在達成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後，烟消雲散了。如果當時美國政府對幾百萬群眾予以武裝鎮壓，必將引發更大的動亂，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很明顯，民主社會的調節與專制社會截然不同。它的調節機理是：群眾對制度或政府政策不滿而產生群眾運動——執政者最終採納群眾合理要求（儘管有時是不愉快的）——該次群眾運動解體。通過這種調節，群眾運動的營養被民主社會吸收利用後，群眾運動自行萎縮、熔化於整個社會之中。

我們把民主政體的上述社會調節稱為建設性負反饋調節。這種調節是隨時性的，是一種周期性很短的良性循環。反之，中國專制社會崩潰性正反饋調節的周期性很長，短則達數十年，長則達數百年。

共產黨國家最喜歡報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發生的群眾運動，以此做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腐朽的證據。然而，共產黨國家的極權主義者并不理解民主國家每次群眾運動的發生、發展及消亡的真實涵意，他們更不能體會「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汲取群眾運動的營養而化解群眾運動的高明之處。

當然，我不否認，在專制社會中的某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獨裁者也會迫於人民的壓力而對某些并非觸犯到專制制度實質的要求實行讓步政策，社會正反饋調節的曲線并非始終是直線上升的。然而，翻閱一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們，往往把暫時的讓步做為自保的緩兵之策和權宜之計。當人民的要求觸及到制度問題和統治者本身的利益時，獨裁者就會向人民反攻倒算，在反攻倒算中，連原來的讓步政策也收回了。如果執政者在群眾運動的不斷推動下，能夠持續性地讓步

和改良，社會的調節就有可能轉為負反饋的良性循環，最後以和平的方式使專制制度轉變為民主政體。轉變為建設性負反饋調節是由多種因素的結合促成的，這點將在後面進一步探討。

(三)「破」和「立」的問題

「文革」對舊傳統、舊秩序的摧毀是空前的。十幾年後的今天回顧起來，很多民運人士承認，當時在混亂的局面中，就有欲「立」而乏力的感覺，這種感覺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文革」的第二階段中後期至第三階段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醒，自覺地反對專制制度的隊伍越來越大。在當時，的確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利用。然而，在大「破」之後，由於民運人士遲遲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原有的秩序，或者，就算拿出來某些新的構想，也不能取信於人。結果，使一部份舊秩序的逐漸恢復贏得了時間。社會的發展規律就是這樣，舊的秩序打碎了，需要新的來取代，沒有新的東西，或新的東西「立」不起來，舊的秩序就會恢復，因為人是不可能長久地在混亂狀態中生活的。這也像奔騰的洪水沖破江岸而泛濫出去之後，江水要尋求新的河道一樣，如果新河道建不起來，待洪水宣洩完畢，後繼的江水必定要重歸舊道。

「立」的不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建國後十七年的專制制度封鎖了中國人民與外界新知識、新事物的接觸。我們這一代當時所了解的一些國外信息，都是經過官方過濾和扭曲的。此外，長期專制教育，也僵化了人們的思想。現在回想起來，在「文革」的第二、三階段中，很多人直覺地認識到工、農、商、政各界有嚴重的不合理之處，但又不知道應該怎麼改。甚至連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工廠、匈牙利發展個體經濟的經驗都不知道。至於完整的市場經濟理論和民主國家的運作實踐，一般人了解的就更為膚淺了。當然，那時也有少數思想認識較為深刻、理論造詣較深的先進分子，但和整個一代人比較起來，人數畢竟是太少了。就是這少數人，思想方法當時也沒有完全脫出馬列主義的窠臼，有的人乾脆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那裡尋找答案。

總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新的理論體系沒有成熟，就連民主國家中現成的民主、自由理論體系也沒有及時介紹到「文革」遺留的荒原中

去。

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民運人士也沒有系統地提出「立」什麼，該怎麼「立」，有些不系統的提法，民主派也沒有抓住機會去實踐。

可喜的是，上述情況在後來逐步改善。有民主意識的人，已在利用一切時機在「文革」遺留下來的荒原上耕耘播種，與正在恢復的舊秩序爭奪地盤。

「文革」給中國走向多元社會開創契機

理論上，任何一次專制制度的正反饋調節所造成的社會崩潰，都是改變制度、使社會走向多元化的機會。可惜，由於過去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歷史上的幾次社會大崩潰都未成為新的多元社會的起點。然而，這次「文革」開創了一個極好的契機。

文革遺留下來的文化荒原上，已長出新的幼苗。



有人要問，既經由農民大起義（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也不例外）所導致的社會崩潰，都是繼以新的專制社會的建立，其結果僅僅是改朝換代，那麼，有什麼理由推斷這次「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崩潰，有可能使中國走向多元的社會呢？

我們從幾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在討論幾個細則之前，讓我們首先溫習一下「文革」的發動方式和「文革」的深度和廣度。過去歷代的農民大起義、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都是自下而上逐步發動起來的。它們最終都造成過舊社會的瓦解和崩潰。「文革」的發動則極為特殊，它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結合。因而，「文革」觸發後，上有「毛林四」的推動，下有群眾的自發參與，形勢發展異常凶猛。在「文革」的風暴中，中國社會沒有一個死角，每寸地都統統捲入了政治漩渦。過去的每次農民起義和革命，中國都有許多農村和城鎮未加參與，以至起義勝利後，很多人在若干年後才知道改了年號。對照之下，「文革」興起的速度、運動的規模、運動的深度和廣度，確是史無前例的，是其它任何一次農民革命所不能比擬的。因此，「文革」造成的社會崩潰，是真正的總崩潰，是歷史上最徹底的總崩潰。中國共產黨自己用「百廢待舉」來形容「文革」後的局面，是十分中肯的。

（一）歷史上第一次原有意識形態的總崩潰

中國在歷史的進程中，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一直有一個「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大一統」意識形態的特點是：自成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自認為是解決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完備學說；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即認為其他學說都是不合理的；被統治階級所御用；被人民普遍認同，甚至接受，因而具有「正統」的地位。

自秦之後和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的二千多年中，統治中國的「大一統」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至「文革」時期，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取代了儒家學說的「大一統」地位。中國歷史上，也產生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學說，但從未取得過官民一致認同的正統地位。「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存在，是形成中國超穩定專制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大起義，都沒有造成過意識形態的危機，

它只是掃蕩了貪官污吏和地主莊園經濟。每次社會動蕩後，舊有的專制秩序很快就在儒家正統觀念下恢復起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時期，自由、民主的思潮，「德」先生和「賽」先生，曾給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帶來了小小的騷動。但是，在這場騷動尚未根本動搖儒家地位的時候，馬列主義的入侵很快就將騷動平息了下去。「大一統」意識形態脫去了儒家的罩衣，披上了馬列主義的外套。然而，它的內涵——以消滅個體價值為前提的團體主義（儒家稱為「仁」）；共產黨稱為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精神），卻沒有改變。所以，共產黨革命時和建立政權後，曾受儒家學說哺育的黨的領導與人民群眾，都比較容易地、普遍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新的「大一統」意識形態。

包括共產黨奪權在內的、任何一次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革命和動亂，都沒有打碎過「大一統」意識形態對社會、對人民的桎梏。但是，「文革」使人民破除了對「大一統」意識形態的迷信，使人民對官方意志產生了徹底的懷疑。可以說，「文革」是第一次造成中國原有意識形態總崩潰的歷史事件。

「文革」造成中國原有意識形態總崩潰的意義還在於，這種崩潰的力量來自內部，並非來自外部思想的入侵。中國歷史上，幾次外部思想文化的「入侵」，包括佛教的傳入、基督教的引進和西方民主思潮的介紹等，都只給中國思想界和意識形態領域造成了小小的擾亂，從未導致過意識形態的崩潰。到頭來，外來思想都溶化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馬列主義的入侵——正如剛才所述——取代了儒家學說的地位，但並未改變「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內涵。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後，理所當然地成了官方指定的正統意識形態。多數人也無保留地接受了它，因為它神話般地指導了「偉大的革命」取得勝利。

一場「文革」，把這種迷信般的信仰徹底打碎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信」危機。我們要十分強調的是，這種粉碎的原因並非來自外力的打擊，而是原有意識形態被推向絕對的荒謬程度之後，發生了自我爆炸。這種自我爆炸引起的毀滅，是不可修復的。道理很簡單：一貫以馬克思主義忠實信徒自居的毛澤東、林彪、四人幫、鄧小平等共產黨人，經過「文革」的沖刷，其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暴露無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被鼓吹為戰無不勝，結果三十多年的指導實踐，却使中國落後了一個時代。現在的年青一代，你再把某種「主義」喊得多麼震天價響，恐怕也難以在一個「主義」下統一起來了。



文革中，紅小兵們在「幹一輩子革命，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的標語牌下，操練紅纓槍，時刻準備消滅「階級敵人」。

中國一向是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幹什麼事都要找出理論根據。專制的維護者們，爲了強化官僚專制政治，自古以來都是恪守一整套的官式「大一統」意識形態。這樣，「大一統」意識形態與「大一統」官僚專制制度相依爲命、互相促進。打破這種惡性的互促關係的，就是「文革」。

縱觀民主國家，官方并無一個固定的「主義」和意識形態，更不壟斷一種意識形態。執政者只注重現實的政策，不必尋找理論依據。相應

的，民間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在民主國家，意識形態是多元的。

「文革」造成的中國原有意識形態的崩潰，會隨之出現四種結果：第一，馬列主義再恢復到原有的正尊之位；第二，儒家學說被再次排爲正統；第三，某人創造出一套新的官方正統理論；第四，不會再出現一個「大一統」的統轄全民的意識形態，意即社會意識形態趨於多元化。

現在看來，第四種走向的可能性最大。古老的中國在歷史的進程中，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獲得了意識形態走向多元的最好機會。「文革」的這一作用，是怎麼估計也不過份的。

(二) 傳統文化的間斷及新觀念的產生

「文革」使中國的學校科班教育停頓了數年之久，使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停頓的時間則更長。幾乎一代人的適齡教育耽誤了。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可是，它另一方面的作用却是打斷了延續了千百年的文化傳統，任何一次戰爭都未能做到這一點。就像園藝家有時要痛下決心砍斷原來的樹幹才能嫁接出更甜美的果子一樣，「文革」將柏楊先生描述的醬缸——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面——打碎後，給其它文化的橫向移植提供了一片「文化」荒原。今天，美國作家托夫勒的作品「第三次浪潮」風靡全國，就像一匹西洋烈馬馳騁在中國的「文化」荒原上。外來文化在「文革」遺留下來的這塊文化荒原上生根、成長，汲取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營養，必定促進文化的多元傾向。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深刻地剖析了儒家傳統文化的精髓——「仁」。仁是二人或多人的縮寫。孔子解釋「仁」是「愛人」、「克己復禮爲仁」。漢代大儒董仲舒則說：「仁之法在愛，不在愛我。」到了宋朝，儒家程伊川進一步解釋：「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這表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強調團體主義而否定個體價值，與美國強調個體主義的文化形成鮮明對照。中國有句話：「二人爲公，一人爲私。」二人就是「仁」，「仁」代表公，「天下爲公」、「大公無私」一直是中國人標榜的美德。在美國，尊重他人的隱私，是基本的道德觀念。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則沒有尊重別人隱私的觀念。就連一日三餐，也鮮明地反映出兩種文化的區別。西方人用飯一人一份，互不妨礙，體現了以個體爲單位。中國人用餐時，幾碟大菜放於桌中，大家分享，互相關照，體現了團體精神。

個體主義文化走向極端，易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冷酷無情。團體主義強調過份而抹殺個體價值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變得虛偽和敷衍，因為保護自身是生物體的天性。「文革」前後，毛澤東等人把個體在社會中的價值完全剷除，同時把以「公」字為體現的團體主義強調到不實際的程度。從「破私立公」、「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發展到「文革」中「奪頭腦中私字的權」、「狠鬥私字一閃念」等荒謬的提法，其用意無非是把人民教育成「把一生交給黨安排」、「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黨的需要就是最高志願」的馴服工具，即「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這種教育，違背了人做為生物必須首先發展個體才能延續種族的本性。人，不可能沒有「私」而存在。按照共產黨自身的哲學——辯證法來解釋，也是講不通的，因為沒有了「私」，也就沒有了矛盾的對立面——「公」。用否定個體價值為前提的團體主義進行教育的結果，人們只能用口頭上的「公」、表面上的「公」，來掩蓋他們生存所必須的、然而又不能公開肯定的「私」。這樣，就必然產生虛偽。「文革」還使中國人民看清了一個平常不可能看清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四人幫等一方面叫人民「滅私」，另一方面自己又大謀私利。這一切，都使否定個體價值為前提的團體主義的傳統觀念在新一代中徹底動搖。「肯定自我」、「尊重個體」的呼聲開始升起。劉曉慶的「我的路」，可謂是這種呼聲中的一個強音。這標誌着，新一代已掙脫傳統中國文化的束縛，開始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營養。

「文革」還使我們改變了其它很多傳統觀念。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意識中，「權威」的尊嚴及其凌駕地位是受到特別強調的，它是維持舊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過去，人民群眾對「權威」的迷信，有時簡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文革」中，毛澤東號召人民打倒「資產階級權威」而實際上想樹立他自己的絕對權威，結果，當那些平時道貌岸然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官僚權威們的醜陋面被「文革」的風暴掀開後，人們并未發現「資產階級權威」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權威」有什麼不同。一切「權威」被掃蕩了。人們意識到，「權威」也是人，「絕對權威」——毛澤東這個「神」，也是人。人，都是平等的。「絕對權威」觀念的破除，是意識形態走向多元的重要前提之一。

「文革」另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是喚起了人們對「人的尊嚴」的關注，人權觀念開始在中國人民當中扎根。應當承認，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中，人權觀念從未被鮮明地提出過。共產黨執政後，則是把人道主義

、人權觀念斥責為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公開號召人民做「革命的螺絲釘」，將人和工具等同起來。在毛澤東的頭腦中，更沒有「人的價值」的起碼觀念，他將政治異己統統罵為連畜生都不如的「王八」和「牛鬼蛇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是毛澤東喜愛的名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使億萬無辜的幹部和群眾受到人格的污辱，使人的尊嚴喪失殆盡。昨天選在大整別人、痛罵別人為畜生的「英雄」，今日却可能成為連畜生都不如的「烏龜王八」。特別是某些以前神氣活現的共產黨的新權貴們，在「文革」開始後，受盡了人身凌辱。像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開國元勳，其下場連普通人家的一條愛犬都不如。只有在沙漠中才知道水的寶貴，只有在飽嘗人的尊嚴受盡踐踏的苦難之後，才知道人權的重要，才會領悟人的價值。「文革」後，人權意識在中國人民中間開始滋長。如戴愛英的「人啊人」、黃永玉的「大雁人字圖」及白樺的「苦戀」等，是這種意識在文藝作品中的反映。而任曉明的「中國人權同盟」的成立和中國之春「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宗旨的提出，則說明青年民主派已自覺地將人權意識與民主觀念聯繫起來。限於歷史條件，從「五·四」運動到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人權概念并未引起先進知識份子的注意。如今，「尊重人權」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廣泛要求，這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不能不認為具有重要的意義。還要強調指出，這次人權意識在中國的扎根生長，并非主要源於外國文化的橫向移植，而主要是中華民族在受夠了自我污辱之後深入反省的結果。

「文革」後，與人權意識同時滋長的，還有「法治」的觀念。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強調「仁政」和「禮治」，其核心是重道德約束、輕「法治」管理的「人治」觀念。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中國人歷來不重視立法、執法，不懂得以「法治」觀念管理企業、管理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相反，中國老百姓從來都是盼清官、盼青天、盼好皇帝、盼大救星。從歷史上看，「人治」的結果，至多不過出現「清官政治」和「好人政治」的暫時興盛局面。之後，往往是人亡政息。遇到貪官、昏官執政時，由於缺乏制衡他們的法律制度與「法治」程序，政治腐敗也就成為必然了。「文革」使人們產生對「法治」的嚮往乃由於以下原因。第一，「文革」使主張「人治」的毛澤東「大救星」的形象徹底毀滅；第二，毛澤東號召砸爛「公、檢、法」，使本來就不健全的司法制度全部遭到破壞。「文革」時，人們無法可依、無法可循。社會完全陷入「人治」狀

態，靠「落實黨的政策」，而不是靠法律維持局面。其結果，各單位領導的「政策水平」決定了該單位不少人的命運。人們嗜夠了「人治」的苦頭；第三，「文革」中，毛澤東、四人幫帶頭踐踏法律，使得千千萬萬人，包括很多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沒有絲毫司法程序的情況下，就被逮捕、關押、審判以至迫害致死。痛苦的經歷，使人們意識到健全法制和依法辦事的必要；「文革」揭發了大量「執法違法」的觸目驚心的事實，使人們看清了「人治」下「法不律黨官」、「刑不上大夫」的真相。人們認清了，「人治」并非無「法」，而是掌權者就是「法」，掌權者可以隨意更改「法」，隨意解釋「法」。這種管理的方法一定會導致社會的混亂。經過「文革」，青年民主派終於認識到了「法治」的重要，認識到了「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法治」應包括：健全的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立法與司法的獨立等。

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在「文革」中的間斷及隨後衆多新觀念的出現，有助於中國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多元化趨向。

(三) 一元化的中央集權經濟的危機

「文革」導致中國工農業的總崩潰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結局，各家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我的粗略見解是：

第一，生產資料的高度國有化泯滅了人類的生產的責任感。由黨官僚控制的全盤的生產資料國有化，是「消滅私有、抹殺個體」的觀念在經濟上的集中反映，從根本上違背了「先有個體的存在和發展，才有種族及社會的延續和進步」的原則，因此，是違反人性的。至今我們還記得「文革」中那種「大河沒水小河乾」、「只有鍋裡有，碗裡才會有」的消滅個體經濟的可笑宣傳。

第二，產業產值分配的國有化和集體化，剝奪了生產者支配勞動所得的權力，扼殺了人類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以主觀意志爲基礎的中央集權的經濟計劃，完全違背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無人否認「計劃」的意願是良好的。但是，由於計劃的設計者所獲得的信息往往是有局限和不可靠的，計劃設計者所面臨的市場又在隨時發生變化，因此，訂出的計劃常常與實際脫節。以主觀意願制訂計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行政命令去強行貫徹這一計劃。

第四，中國的國有化企業缺乏科學的管理方法，最根本的，是沒有

把企業生產與生產者本身的利益結合起來的一套制度。

第五，「文革」中的「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批判反動的唯生產力論」、「抓革命、促生產」等政治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泛政治論」，最後把國有化企業遺留下的一點生產權力也給扼殺了。

第六，將中國傳統的勤儉和節約的美德推到極端和絕對化的程度，再加上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批判，完全扼殺了人的物質慾望，將社會消費率降到最低水平。

以上最關鍵的因素當屬生產資料和產值分配全盤國有化。這種一元化的經濟制度，扼殺了人性、取消了競爭，再佐以「政治」的衝擊，最終導致了國民經濟的總崩潰。

「文革」中中國經濟的總崩潰，不是由於外侵，也不是由於天災，純粹是由於社會制度，尤其是一元化經濟制度的自身不合理性。這種不合理性選體現在由「文革」所暴露出來的很多直觀的矛盾現象上：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號召人民努力生產、奉獻國家，他們自己却荒淫無度；高級領導人命令下屬企業事業單位一定按計劃辦事，他們自己却使用特權，大搞計劃外的建設、計劃外的進口，以利用享受；老百姓省吃儉用，而各個企業業的大量物質浪費却很少有人問津……應該說，人們感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不合理性，一開始并非基於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

違反人性的「人民公社」政策，使農村陷於崩潰。



濟」的理性認識，而是由於「文革」所揭露出來的、以前鮮為人知的事實教育了人們。

由於經濟狀況涉及人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故經濟崩潰給人們帶來的震撼特別巨大。當尼克松總統的訪華給中國閉關的大門撬開一絲裂縫時，六十年代的世界經濟發展驚呆了中國人民，也嚇壞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尤其是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經濟起飛，說明了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國家。在鮮明的對比之下，中國大陸開始自上而下地反省經濟體制的問題。「文革」導致的經濟總崩潰成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

(四) 共產黨一元化統治的動搖

「文革」的另一個結果是動搖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統治。從建國到「文革」，毛澤東把中國傳統的一元化專制制度推到頂峯，他公開宣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力推行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一元化領導」。

應該承認，「文革」前，儘管共產黨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全國大多數人民還是和共產黨同心同德的。「文革」初期，即使人們對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大都心懷不滿，但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深信不移。這種相信，就是對「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認同。「文革」把人們的這一認同感粉碎了。在諸多的因素中，「毛主席司令部」本身所暴露的問題，給人們的教育最大。「王爾威」、「楊余傳」、「陳伯達集團的垮台逐漸使人們產生疑問，而林彪集團的爆出終於驚醒了全國人民。人民發現，毛澤東讓他們所信賴并誓死捍衛的，竟然連毛澤東本人都不相信。

毛澤東發動「文革」，以清除政治異己、加強以他為首的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為目的，却以人民認清了整個共產黨的專制面貌、以人民喪失了對整個黨的信任和認同而告終。

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疏離，動搖了共產黨的一元化統治結構，這是「文革」的一個重要收穫。今天的年青人，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樣「積極要求入黨」了，共產黨的平均黨齡已明顯增大。據中國共產黨黨報的報導，二十五歲以下的黨員，一九五〇年曾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廿六點六，一九八三年竟降至百分之三點三四。這是共產黨老化的象徵。更

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一九八〇年某些地方的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有的自薦候選人申明祖宗三代都不是共產黨員，竟然獲得了熱烈的支持。

對共產黨認同的喪失，是人民進一步反省的起點。在冷靜地沉思之後，青年民主派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一元化的統治，是中國數千年來一元化政治架構的延續和發展。權力集中為一體，便失去制衡，掌權者可能犯的錯誤就不能隨時糾正。結果，社會往往以大崩潰的正反饋調節方式停止獨裁者錯誤的累積，而獨裁者也往往在社會大崩潰中被逐出歷史舞台。反省的深入，使人們對多元化政治架構產生嚮往。

「文革」的歷史大翻車，也教育了一部份較為明智的共產黨領導人，使其認識到權力過份集中的缺陷。今天，黨的某些領導已在主張「黨政」分家和內行領導內行。雖然這還不是政治架構多元化的概念，而且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黨政分家」還大多停留在宣傳上，但上述主張無疑已較毛澤東的政策向前跨進了一步。

中國社會當前的多元化趨向

在歷史的長河決堤之初，河水會在一定的時間內尋求新的出路。「文革」使中國社會的「一元化金字塔」崩解之後，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社會的發展，當前已有多元化的趨向。

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多元化的趨向最為明顯。官方再找出一個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來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簡直是不可能的了。就拿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來說，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王若水、周揚等用「異化論」向胡喬木的正統派公開挑戰。官方雖然一再宣傳要堅持馬列主義，但他們自己要堅持什麼樣的馬列主義，恐怕二十幾名政治局委員每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至於青年民主派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見解，更與官方正統派大相逕庭。例如，一九八三年夏，官方在桂林召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上海復旦大學三名博士研究生和五位碩士研究生共同擬定了一份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對抗的「十條提綱」，提交到會上，一下子把會議「炸」亂了。中央就此「提綱」特地指示高校領導，要注意大學生中的持不同政見者。更為可喜的是，目前的中國大學生中，迷信馬列主義的人已寥寥無幾。相比之下，研究存在主義、實證主義、新實在論、邏輯經驗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西方學說和方法論的却大有人在。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的研究成果相當出色。在新的形勢下，青年民主派

更是響亮地提出要發展多元理論並推動理論的多元，這與改良派們拿不出任何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另外，我們看到，基督教文化及西方生活方式目前正迅猛地在中國傳播。在馬列主義信仰破滅的同時，很多青年人（包括不少留學生）皈依了基督教。西方飲食、舞會、西式服裝等，越來越流行。男女的社會地位及兩性之間的關係，也逐步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

總之，雖然很多人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邁向多元的前景不表樂觀，但不少人承認，文化、思想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化走向，已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

經濟領域的多元趨向亦已端倪初現，它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所有制方面：「文革」中幾乎把全部的生產資料都收歸了國有。粉碎四人幫後，農村首先出現個體經營的小生意。隨後，城市中的個體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的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目前，公私合營或集體聯營的各種「公司」更是日趨增多。個體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雖然規模較小（國家限制雇員人數），但已顯示出較國家所有制大得多的生命力，與國有企業形成了競爭。此外，外資的引進，進一步打破了國營企業壟斷一切的局面。

第二，產值分配方面：個體與集體所有制小企業的產值分配，已自



現在，城鎮已出現個體經濟，這是個體戶——女修鞋匠。——本刊記者攝於國內

然擺脫了國家的控制。國有企業的產值分配也已趨於多樣化。企業的職工除領取工資外，還可從獎金、到外單位兼職、購買本單位股票等取得一些收入。農民的所得，基本上已由自己支配。

第三，市場方面：「文革」後的經濟開放局面，將原先封閉的中國置於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環境之中。一方面，中國產品大量外銷至其它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又為他國提供了市場。市場的多元化，促使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

第四，經濟體制方面：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嗜了指令性計劃經濟的苦頭之後，為適應門戶開放政策造成的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聯成一體的形勢，中國大陸已決心將經濟體制改革成指導性計劃經濟，以擴大市場機制的的作用。

儘管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仍以國家所有制的企業佔絕對主導地位，遠遠不能與西方國家真正的多元經濟結構相媲美，但比起「文革」前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來，不能不說已向多元方面跨出了一步。一般相信，中國在政治領域走向多元是較為困難的，目前還停留在群眾呼籲和要求的階段。然而，有幾種現象值得注意。

第一個現象是北京政府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并提出「一國兩制」的口號。如果不是「文革」造成了中國大陸經濟的崩潰和三信危機，北京政府是不會容忍「一國兩制」的，因為，這一口號本身意味着承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一國兩制」口號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其它既成政治力量統治中國部份領土的暫時容忍。如果台灣和香港的政治力量能夠把握住這一時機、因勢利導，就有可能將中國大陸向政治多元化的道路上推進一步。

另一個現象是官商結合的新經濟利益集團的萌芽。這一現象的特點是：很多幹部子弟組成非官方的公司，打算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如貿易、吸收外資、投資設廠等。幹部子弟與官方有特殊關係，他們可以從官方得到很多方便以利其公司的發展，一些「越社會主義制度之軌」的行動也可獲得官方的默許。由於共產黨內政治鬭爭的殘酷性教育了一部份共產黨幹部，他們鼓勵子女從事非政治活動。有人估計，這些官商結合的新公司將會獲得較快的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將形成新的經濟利益集團。雖然這種集團並不同於西方民主社會中壓力團體的作用，但其一旦形成，將可能削弱共產黨中央對各個領域的一元化控制。從長程來看，官商結合的新經濟利益集團的出現，或許有助於中國政治權力的

分散和多元趨向。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興起。青年民主派不但認同多元、宣傳多元，而且主觀上推動多元、行動上實踐多元。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這一壓力團體的成立，則是青年民主派試圖在政治上打破共產黨一元化政治權力架構的努力。一般認為，結束中國傳統的一元化政治架構是非常艱巨的工作，但是，兩年的運作實踐使我們感到，完成這項工作不是不可能的。中國實現政治多元化只是遲早的事。

現在，現代化與多元化已成爲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值得一提的是，多元化概念的宣傳，已被中國官方認可。獲得胡耀邦、趙紫陽支持的國內改革派健將溫元凱，在其多次的報告和談話中，就曾公開主張中國的多元化走向。

中國當前兩種走向的決戰

「文革」造成中國歷史長河的決堤，將有兩種結局：或是河歸舊道、中國社會重建一元化秩序；或是河水分流、中國走向多元化社會。這是兩種走向的決戰，兩種命運的決戰。在這場決戰中，陣營已經擺開：一方是中國共產黨某些領導人爲代表的恢復傳統秩序的力量，另一方是「文革」教育出的一代，他們決心將中國導向多元。

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出於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利益及他們個人既得利益的需要，正在竭力恢復「文革」粉碎的原有社會秩序，自覺或不自覺地想把中國重新納入一元化軌道。這種努力表現在各個領域。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提出了「四個堅持」，並將其明文寫入憲法。「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鄧小平鎮壓了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直至最近，北京政府仍不尊重憲法，不允許群眾自由結社。對待不同政見的青年民主派，「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仍採取殘酷鎮壓的手段。人們普遍感到，當前的形勢特點是「經濟放鬆、政治收緊」。

經濟上是放鬆了，但這是否意味經濟會自動走上真正多元化的局面呢？就目前形勢看，我們不得不抱懷疑的態度。從中共中央最近通過的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看，中國共產黨某些領導人仍迷信「計劃經濟」，仍堅持國家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教條。仔細研究一下中共中央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便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

鄧小平向張海迪學習，與毛澤東的向雷鋒學習有什麼兩樣？



決心想把中國城市經濟改造成匈牙利模式，即允許存在有限的個體或集體經濟，做爲對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的補充。匈牙利模式顯然不是人們所希望的多元化經濟體制，只是一大烏籠經濟」或帶有小自由的一元化經濟體制。因此，雖然當前經濟領域內確有自發地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但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似已築好堤壩，只能允許這種趨勢發展到尚未突破一元化經濟結構的程度。

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亦竭力想恢復到「文革」前那樣的程度。他們一方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張旗鼓地開展所謂「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學習張海迪運動等，另一方面又悄悄地進行尊孔活動，以圖恢復孔子學說的地位。對於思想上離經叛道而又不聽「勸告」的青年，則毫不手軟地進行鎮壓……

遙望神州，我們似乎看到一個衰弱的巨人——共產黨，正在手執巨擘，忙碌着修復已被「文革」沖垮的歷史河堤。爲了減輕河水的壓力，防止今後再次決口，他們在加寬河道，但他們似乎無意改變河流的方向。

在這裡，我們願誠意地奉勸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歷史又給我們中華民族提供了步向多元社會的機會。凡我炎黃子孫，不管是執政者，還是非執政者，都要看清這個機會，珍惜這個機會，把握住這個機會。在權力架構上的人，更有責任因勢利導，將中國社會導向多元，將中國社



將中國導向多元社會的主導力量在於人民。這是一九七九年人民大學學生要求歸還校舍的遊行。

會持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崩潰性正反饋調節，轉變為建設性負反饋調節。那就是：執政者中的開明派在民主運動持續推動下，逐步迫使頑固派讓步，不斷放鬆對意識形態、文化、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控制，吸收民主運動的合理營養，允許、資助私人和集體企業的發展，在政治上允許持不同政見的雜誌、刊物在國內出版、發行，直到允許壓力團體合法存在和允許自由競選基層人民代表，再進展到允許反對黨的成立。之後，共產黨做為一個合法的政黨，與其它政治勢力在平等的基礎上，用選票，而不是用槍桿競爭政權。將來不管誰執掌政權，執政者都要不斷從新的群眾運動中汲取營養，改進自己的政策，以造福於人民，增加與政治對手和平競爭的能力。至此，建設性負反饋調節的系統即完全建立。當前，正是將中國的社會調節向建設性負反饋方向引導的大好時機，我們願意

再次提請執政者中的開明派注意這一點。在歷史的巨大轉折中，人民允許並且可以忍受某些小的反復。然而，容忍總是有限度的。如果執政者在人民群眾的持續推動和要求面前，不是不斷前進，而是多次反復，最後向人民反攻倒算，對異己力量全面鎮壓，那麼，中國就會重蹈崩潰性正反饋調節的覆轍。如果發生下一次崩潰性正反饋調節，恐怕共產黨自身難免被歷史的洪流完全沖垮，那對整個中華民族、對共產黨本身，都將是一場悲劇。站在歷史大河邊上重修一元化河道的某些共產黨領導們，你們是否意識到，當舊堤修好之時，也就是重新決堤之日呢？而你們是否又意識到，你們就有可能被再次破堤而出的洪水淹沒呢？爲了自身的長久存在，你們爲什麼不分洪治水、將社會導向多元呢？

我們勸告了共產黨的執政者們，但我們必須指出，將中國社會導向多元化的主導力量在於人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一元化專制制度下生活了數千年，現在是再次面臨抉擇的時候了。「文革」使整個中華民族飽嘗了苦難，經過反省的中華民族，也理應將產生「文革」的一元化社會制度徹底結束。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學習日本民族兼容并蓄東西方文化、使日本社會走向多元的經驗。我們這一代人的存在時間是短暫的，歷史容不得我們再猶豫、再等待。

或許有人要問，如何將中國社會推向多元？我們的看法是，答案應由全體人民來尋找。在這裡，我願坦率說出我的理解：凡是削弱「四個堅持」的，都要努力去救；凡是脫離「四個堅持」的力量，都要積極支持。唯有此，才能抵抗某些共產黨領導人利用權力將中國重新納入一元化的社會。

「文革」給中國走向多元創造了契機，這或許是「文革」對其製造空前災難的一種補償。在歷史面臨可能轉折的時刻，中華民族應該做些什麼？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真思索的問題。我願提醒大家，中國當前僅僅是存在轉入多元社會的可能，但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尚有待我們這些在世人的積極推動。如果中國在我們這一代完成了歷史的轉折，這一轉折必將改變整個個人的歷史。但是，如果我們坐失良機，如果整個中華民族重新迎回了超穩定的一元化社會，那麼，我們也要接受這個無情的結局，我們的子孫後代也必將再次遭受一場「文革」式的浩劫。常言道「置於死地而後生」，如果「文革」置中華民族於死地之後，換來的不是「後生」，而是「後死」，那麼，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命運就太悲慘了。你，中華民族的一員，能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完）

訪 傑出民運戰士 黃迪

談「文革」

本刊特約記者
·左拾遺·

前言

八月中旬，我回國探親。這次回國探親，不同平常，我接受了一個特別任務：代表「中國之春」雜誌專訪國內的傑出民運戰士黃迪同志。

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在廈門一個旅館中見到了黃迪同志。

黃迪同志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他戴一副普通深度的近視眼鏡，穿着從香港進口的淺黃色短袖衫和深棕色短褲。他說話深沉有力，從不輕易回答沒有想好的問題。

我把秘密帶進的最近一期「中國之春」交給他後，他大致看了看內容，便開始了我們的交談。為了避免出海關不必要的麻煩，我們沒有將談話錄音，只是將要點記在筆記本上，而且記得很零亂。到達海外後，我抽空整理了一下筆記。由於資料不夠完整，可能有曲解黃迪同志之處，因此，事先聲明，凡有出入之處均由本人負責。

下面是部份訪問記錄：

左：黃迪同志，「中國之春」編輯部托我向您問好。

黃：謝謝您和「中國之春」的同志們！陳先生托人帶來的樂和轉載「野草」文章的第十三期中國之春雜誌早已收到了。謝謝你們對我健康情況的關懷。現在我的身體還不錯，待病發作時我才服這些藥的。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中國之春」轉載了我們「野草」的文章，向廣大讀者介紹了我們的觀點。

左：你們在國內不僅工作上很艱難，同時生活上也很艱苦，因此，海外的一些同志們都非常關切你們。自我們在「中國之春」上介紹「野草」并轉載一些有關文章以來，有很多讀者來信和捐款，對「野草」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支持。

黃：的確，你們對「野草」的介紹和對我們的文章的轉載，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應該說，海外強力的次級輻射使我們深深地感受着工作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謝謝你們！這是您們對國內民主運動的最大支持。專制力量對民主力量的冰封，需要火焰的高溫才能解凍，而你們在海外的工作就是一團熾熱的烈焰，它必然會點燃國內民主運動的熊熊烈火。同時我們也會在冰封的環境下堅持像螢火蟲那樣的冷火、理智的冷火。

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對我們的捐款和支持，我們心領了。但我們現在的環境還不是最爲惡劣，請你們把捐款轉送給更困難和更需要的戰友。我們會繼續堅持戰鬥，也會以稿件支持「中國之春」，來報答海外同志的支持。



文革中，黑五類被批鬥。

左：在國內這麼困難的環境裡，您們能夠堅持民主運動的事業，這無疑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同時也是「野草」頑強生命力的表現。你們這種民運戰士大無畏的精神和毅力，早已深為我們所敬佩，同時也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們從幾位朋友處得知，早在著名民運戰士王希哲之前，您就有了相當成熟的民主運動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那麼您這種早期的民主運動的思想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呢？

黃：這要從我的家庭和社會背景談起。我出生在一個人「黑五類」家庭裡。在一人獲「罪」禍及全家的封建專制社會裡，在「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的幽靈下，我自幼就受盡了鄙視和凌辱，使我幼小的心靈蒙受了莫大的創傷。生活欺騙了我，也教訓了我。我變得沉默寡言，但我的大腦卻時刻都在思考着周圍的一切。

「文革」前的一九六二年，我以優異

的成績高中畢業，老師鼓勵我報考北京大學。於是我雄心勃勃地投入了高考。雖然我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但因我出身於「黑五類」家庭，只被分配到一所不出名的三流大學中去。當時我曾為此感到不公平，但後來一想，在這一個人血統論橫行的社會裡，已算是莫大的幸運了。

我決心把握這個人生機會，到自然科學天地去尋幽探秘。我深知自己沒有資格過問政治，並堅信知識就是力量，認為人類只有在知識和才能上競爭，人類社會才能向前發展。那時，困難時期剛過，政府大力提倡大學生到農場勞動改造思想。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是浪費人才和時間而已。因此我在勞動改造時的表現是消極的。但那些在學問上低能的學生卻也有聰明的一面，他們在勞動時偽裝積極來博取政工人員的青睞，用空頭的政治來投機取巧。我對知識和真理本有很強的接受能力，但我却不能接受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如此現實的做人哲學。我不想過問政治，政治却偏偏來過問我。在各種大小會議上，我總是被稱為「只專不紅」的靶子，連教授都不敢親近我。我終於認識到，一個人的命運和發展是受社會客觀條件制約的，沒有國家民族的前途，也就沒有個人的前途，政治救國比科學救國更為迫切。於是我到圖書館借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其它社會科學的書籍，開始潛心研讀。同時對報刊上文學、歷史和哲學上的爭論和政治批判文章也進行了廣泛的涉獵。這為我以後投身民主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積累了理論資本。

左：這次回國，我感到國內又在搞運動。這就是全面否定「文革」、清除「三種人」的運動。十一屆六中全會已對「文革」做了結論，通過了「若干問題的歷史決議」，現在不知為什麼又要大搞。

黃：你要知道，共產黨是吃「運動飯」的。共產黨搞運動，都圍繞着一個「權」字，就是要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鄧小平等人現在發動全面否定「文革」的運動，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完全換上他們這一派的人。至於六中全會對「文革」的結論，那只是官方的結論。從人民的角度還沒有認真總結「文革」，更談不上什麼最後的結論。

左：那您對「文革」是怎麼看呢？可否簡單地談談您的觀點。

黃：可以，但很不系統。以後有時間再專著文章談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大了，一時真不知從何談起。

左：是啊，要談的問題太多了。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風襲了神州大地每一個角落，席捲了全國各領域、各階層的人民，甚至許多死人也被沖翻了身。您就從當時對文革的參與開始談吧。

黃：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的爆發，可說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它以巨大的能量和獨特的風格使全世界震驚和迷惘。革命的洪流沖擊到每一個角落，把特權金字塔摧毀，把蟄伏的龍蛇趕出洞。有意識的人和無意識的人、好動的人和好靜的人、明火執仗的人和齷齪的人、捨身取義的人和明哲保身的人，統統被捲進了漩渦。這一革命要每一個人必須

運動和表演，不管是赤裸的，還是戴着面具的，總之誰都得上台表演一番。古今中外一切鬪爭藝術都被運用了，還創造了很多新鮮奇特的鬪爭手段。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文革」經歷了第一次漲潮和低潮。文革發起時，我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我參加了一段時間的群眾組織，但很快就離開了大學的小天地，投身到社會廣闊的天地中去。我用大串連的機會，走了大半個中國，接觸了外省著名的造反派組織和頭頭，對全國的革命形勢作了比較全面的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軍隊和反「文革」派對以反對官僚專制為目的的革命造反派的鎮壓，出現了「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風」，革命群眾運動出現了由高潮到低潮的第一循環。經過了這個階段，各種政治力量的面目都比較明顯了，於是開始分化與重新組合。真正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造反派，為了迎接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來，需要總結第一階段的經驗和教訓。而最大的教訓就是沒有革命理論作指導，大家只是盲目地投身運動。某些革命造反派的優秀人物和知識份子已經看到「文革」的兩重性。即一方面毛林江集團以利用群眾、運動群眾為手段進行黨內權力鬪爭；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則為反對官僚專制、爭取自身從專制下解放而進行反利用，即利用「文革」的機會衝擊現存不合理的制度。中國共產黨各派進行權力角逐的「文革」，同人民群眾打着紅旗反紅旗、利用形勢爭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文革」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面。

正當「文革」處在第一階段的時候，真正的革命群眾運動還處於低級階段。群眾因為沒有科學革命理論的指導，所以對這次「文革」的起因、性質、任務和特點，以及革命的動力和對象仍很不清楚。

左：我認為世界上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它的內在動力和客觀條件，正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像「文革」這樣的事件，我們若以歷史的觀點來看，也不應該是那麼簡單和偶然的，就如僅有一點火源，若無大量的乾柴，仍不可能形成熊熊烈火一樣。那麼您對「文革」前的歷史背景和「文革」爆發的根本原因有何見解？

黃：這要從中國共產黨本身和「文革」前十七年的社會特點談起。中國共產黨無論就其構構而言，還是按其所作所為而言，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三千萬黨員中，工人黨員不到二百萬，其主體是農民。它是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大雜燴。唯其如此，中國共產黨天然地帶着濃厚的封建性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從一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社會中脫胎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實行封建式的一黨專政。「解放」後史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官僚權力集中制的極化與毛澤東像皇帝一樣掌握最後裁判權沒什麼實質的區別。黨和社會就像金字塔，黨內沒有民主，人民更無民主，只有官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則封建皇權專政。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方面突出地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搞烏托邦式的三面紅旗，導致社會生產力嚴重破壞。

「文革」前的十七年可分為兩階段。

一九六七年初廣州市街頭的大字報。



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國共產黨所走的路綫是較為現實的。一九五七年以後，由於毛澤東深深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其思想遂演變成了政治上的法西斯和經濟上的烏托邦。加上共產黨的三大規律——權力極化、個人崇拜、嗜左的半導體結構——在中國共產黨產生無法抗拒的效應，終於使中國共產黨從它的頂峯跌下來，從此沿着下坡路滑向死亡。這種矛盾造成中國共產黨內部分裂和權力鬪爭公開化。到「文革」爆發前夕，中國共產黨已明顯地分裂為三個司令部——毛林江集團、劉鄧集團

、周恩來集團。毛澤東的權力極化和個人迷信，其思想的唯心論形態，及由此造成的生產力破壞和社會的動亂，使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基礎完全動搖了，政治宣傳陷入了死胡同，不能自圓其說，無法解釋各種事實。理論危機使民心對中國共產黨的離心力不斷加強，無數新生的叛逆者出現了，這就使當時全民性的「文革」運動有了一觸即發的可能性。

下面分析一下「文革」爆發的根本原因。「解放」後較為適應生產力水平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實際是資本主義成份佔主要的經濟地位）結構，在短期內就被中國共產黨扼殺了。中國共產黨嗜左的半導體結構——官僚層把生產關係不斷地急速地向「左」方向推進，窒息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十七年後的中國共產黨，已演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官僚特權階級政黨，與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封建專制政治使人民的權力降到零；空想社會主義使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化。歷史讓中國共產黨作了充份表演，從反面也教育了人民。人民要求變革專制體制的願望空前高漲。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主客觀條件。但由於主客觀條件仍未完全成熟，加上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嚴密控制，由底層觸發一場革命運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這次「文革」就由上層的權力決戰誘發出來，並穿着派性鬪爭的外衣。「文革」是毛林江集團與劉鄧集團矛盾尖銳化引發的，直接的導火綫是毛澤東的發動。

左：黃迪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我很贊成您的



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見解。近來，官方宣傳機構一直在大喊要徹底否定「文革」。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黃：「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奇特、最具兩面性、最紛紜複雜的歷史事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利用群眾與群眾反利用、黨內矛盾與黨外鬪爭、文鬧與內戰、陰謀與陽謀，所有這些矛盾的各個方面，就像亂麻一樣交織在一起。如果沒有在這次歷史事件中摸爬打滾，親身體會它的千變萬化，感受其神經刺激和血脈搏動，又從而跳出千萬頭緒事變的束縛，站到理論的高度和歷史的前鋒，縱橫遠矚，要企圖對這次大革命給予正確的解釋和說明，乃是不可可能的。

不過我認為，要想從歷史的角度來評價「文革」這一事件，必須首先認清「文革」兩個不同的重心和兩條不同的軌迹：一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鬪爭和路線鬪

爭，在這一意義上的「文革」應該全盤否定。任何造反派的路綫、搞派性都是機會主義的錯誤，只能是削弱真正的革命力量。二是代表人民利益和願望的革命運動，在這一意義上的「文革」是天然合理的。

左：黃迪同志，我很同意您的見解。中國共產黨由於其政治目的，在評論「文革」一事上，必然會帶有很大的主觀片面性和實用性。要想評論「文革」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只有真正站在歷史的角度上和世界的範圍內認識「文革」、分析「文革」，才能對「文革」作出較客觀的歷史性評價。

因時間關係，今天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希望我訪問北京回來後再來拜訪您。

黃：我剛才談的，大都涉及文革的起因問題，大多是我一九六七年時就已形成的觀點。至於「文革」的後果及意義，我想等您回來再交流。如果沒機會見面，我將設法寫成文字，通過陳兄轉給你們。最後，請轉告中國之春的朋友們，民主運動不是暴徒僥倖的賭博，它需要理智和韌性的戰術，望大家堅持。再次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完）

××× ××× ×××

筆者後記：我在參觀北方一些城市後，由於海外公司急電催我返回，未能再與黃迪同志見面，只寫了一短信告別。深為遺憾的是，黃迪同志還有很多精辟的論述未能聽到。盡管如此，我還是把這次談話整理出來，以饗讀者。我盼望着黃迪同志全面論述「文革」的文章早日問世。

鄧小平派

為何全面否定文革？

(中國大陸留學生) 李奕秦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公佈了剛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一個重要文件，即「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的宗旨即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決議」對文革的總結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可見中共中央已對文革作出了全盤否定，已對歷史作了交待。

然而，在事逾三年後的今天，這個冷飯又被炒起來了。近幾個月來，「人民日報」和「紅旗」陸續刊載了一些否定文革的文章，並在文中指出：徹底否定文革，必須否定文革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否定文革的形式——「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必須否定大批判；必須否定造反派脾氣，根除派性；必須否定「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清除軍中派性及「左」毒。可見這次對文革的否定更加具體，更加深入了。據最近從大陸來的人士透露，這次否定文革已在國內釀成規模頗大的運動，許多人心中都惶惶不定。特別是對兩派群眾和「三支兩軍」的否定，很多人認為鄧小平這樣做未免打擊面太大，樹敵太多了。

從「決議」對文革的評價可見，起初中共中央并不希望對文革評得太清楚和太細，因為他們深知要理清這麼複雜和特殊的一個歷史事件，實非輕而易舉，甚恐剪不斷、理還亂。他們只希望全體黨員、幹部和人民從此能忘記糾纏不清的文革，一致向前看，專心搞四化。那麼中共中央為什麼又在最近重炒冷飯，并且炒

得這麼細，這麼具體呢？

形勢需要

經濟改革受干擾。文革已去，中共中央也已對它作出了一個整體的評價，但它對後來社會深遠的影響却如藕斷絲連。特別是盤踞在黨政軍各級領導機構裡的「四人幫」的殘餘勢力，即與「四人幫」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在文革中起家的左派勢力。由於他們仍頑固地堅守極左的毛澤東思想，因此，對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推行的方針政策在思想認識上多持否定態度，例如，他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和開放政策不符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走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在行動上他們則尋機加以抵制當前改革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例如，由於他們的阻礙，黨中央在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上一直不能夠順利地進行；他們打擊人民群眾在經濟改革中的積極性，直接破壞或攔阻改革工作的進行。去年九月份，位於北京西四的「壽山莊」茶館被迫關閉停業，繼而在全國各地的數千家私營企業主的執照被吊銷等等，就是充分的證明。因此，中共中央在八月十四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否定文革，清「左」務實的文章。

在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有些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幹部嚴重帶有文革中養成的不良習氣。九月廿二日的「人民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指出：「有極少數人至今還時不時地發一點『造反派脾氣』，一有什麼事不合心意，便頂牛使壞，鬧將起來，甚至採用『大民主』等十分錯誤的手段；製造事端，威脅、要挾領導。他們過去篤信『矛頭向上，大方向正確』，現

在依然抱着這個早已背時的「信條」不放。」

在意識形態領域，有些理論界和文藝界的人對理論問題、文藝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關係一直是混淆不清，動不動就把理論和文藝上的問題往政治問題上扯，然後抓住辮子，扣上帽子，掄起在文革中曾使用過的「大批判」棍子，痛打狠打，窮追不放，直到對方「低頭認罪」。白樺因寫「苦戀」被批的體無完膚，王若水和周揚因指出了社會主義中國中存在的「異化」現象則遭削職拔官。此類例子，比比皆是。因此，九月廿一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徹底否定『大批判』」的文章，文章舉出了「大批判」的四大不良形式，指出在有些人中依然存在的遺毒，最後反詰道：「如果別的工作都不允許犯錯，唯獨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能完全擺脫『大批判』流毒的威脅，人們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放開手脚探索新境界或研究新問題嗎？」

整黨受阻。中共中央爲了使全體黨員幹部在思想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策和形勢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在政治上保持與中央一致，在組織上保持純潔，因而展開了整頓作風、加強紀律和純潔組織的整黨工作。由於整黨工作中會觸及到許多文革中的問題，特別是「純潔組織」中所強調的清除三類人，一即「三種人」——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搶份子、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在原則上要開除黨籍的人；再即「頑固抗拒三中全會路線的人」；最後即經濟和刑事犯。特別屬於文革受益派的前兩類人，爲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便拉幫結派，私下串連，上下勾結，互相包庇，並且有人拿「派別」作擋箭牌，一時間整黨工作不能進行。

又因整黨工作的重點是在軍中，所以在軍中受到的阻力也最大。由於六中全會上的「決議」沒有對「三支兩軍」作出完全否定的評價，因此，在整黨工作人員和軍中黨員幹部中對「三支兩軍」和派性問題發生很大糾紛，致使整黨工作一度停滯。因此，八月廿二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篇「根除派性，保護人才」

的文章。文中剖析派性的危害是：以派論是非，以派論德才，以派論升降定去留，以派分親疏。最後強調：「否定文革，必須否定『三支兩軍』，消除軍中派性及『左』毒。」

在進行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方面，由於港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對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瘋狂運動普遍存有恐懼心理，以致對中國共產黨的和平統一祖國有不信任和抵制現象，因此使鄧小平感到很大困擾。

從開始提出要收回香港到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中國政府每向前邁進一步，都遇到來自香港人民的阻力。盡管鄧小平曾多次向香港人民表態說什麼中國政府會堅守信用啦，文革已被全盤否定啦等等，但這究竟能挽回多少香港人民在信心上的危急呢？是香港同胞不愛祖國、不願回歸，還是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以致在國內外華人民心中失去了令人信任的形象？相信鄧小平早已心中有數。

通過許多個回合的談判和周旋，香港回歸的大事終於告成。下一步則是和平攻克台灣。由於台灣同胞和香港同胞對中國共產黨所掀起的歷次政治運動有同樣的恐懼心理，再加上與共產黨對峙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可見要收歸台灣比收回香港不知要難上多少倍。試想假如不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發動了反右運動和文革運動，而只是經濟上落後的話，相信台灣同胞和

文革中，解放軍的「支左」大遊行。



海外僑胞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必會對國民黨的「三不」政策施加巨大壓力，以致使和平統一祖國變得大爲容易。然而，歷史是無情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的所作所爲已銘刻在人民心中，而又是如此深刻，難以磨滅。鄧小平深知這個既成的事實，但他不能放棄對祖國的統一。他千方百計設法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改變中國大陸的面貌，從經濟改革、門戶開放，到「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對文革的再次徹底否定，都是爲這一目的所做出的努力。

奪權報復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在發動任何運動或製造任何大事件之前，都要先在社

會上造成輿論，然後在運動中或事件中整垮一些人，最終的目的是奪權，因為共產黨信奉的教條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曾記否，文革爆發之際，正是黨內奪權鬥爭最激烈之時。結果是劉鄧集團成了階下囚，毛澤東則成了「英明」又「偉大」的最高統帥。後來，毛澤東獨攬了黨政軍大權，進一步對更大一批黨和國家幹部、知識份子實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大專政，重則將其迫害致死、身敗名裂、株及三代；輕則將其關之囚之、羞之辱之，使其名利雙空。而當時在毛澤東面前受寵的一批人，一面對毛捧之奉之，企圖雙收名利；一面在毛面前推波助瀾，為虎作倀。結果是另一批人在文革中一落千丈、受害無窮。

當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派重新登上政壇後，首先他們推下了華國鋒，整下了一批與「四人幫」有密切關係的黨翼。然而仍有一份文革受益派人物占據着上層領導要職，何況這批人由於路線上的不盡相同而對他們進行對文革受害派構成直接的威脅。更何況文革受害派難以忘記文革中渡過的非人的日子，難以忘記鄧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難以忘記難友劉少奇的慘局，這一切餘恨的纏繞自然助長着報復心理。為了防止文革受益派的反撲，為了防止「四人幫」殘餘勢力的東山再起，為了對文革受益派施以報復，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派不得不向文革受益派進行徹底地、全面地奪權。要達到這個目的，徹底否定文革，當然就是奪權開始之前最好的輿論了。

據內部人士透露，鄧小平在這次奪權鬥爭中的第一步，就是從政治局清掉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和韋國清，第二步再從政治局中清掉方毅、余秋里和倪志福等。最後藉否定文革



一九六六年文革時，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

的輿論，以整黨的方式，全面地清除「三種人」及左派勢力，或迫其讓權或開除黨籍，皆不留情。

恢復舊軌

十年文革不僅沖垮了中國千年的封建傳統思想，同時也沖垮了黨在傳統上的一元化領導機構和舊的社會秩序，並且為社會走向多元化創造了契機。近幾年來的改革就顯示了多元化在其契機上的萌芽和延伸，儘管目前中國制度的本質仍是一黨專制。例如，中共對自由經濟的提倡、對經濟特區的建立和對十四港口的開放，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資本主義；對專家、「內行」擔任領導的提倡打破了黨領導一切的框框；思想意識型態的相對放寬，馬列毛思想已不再是人們獨尊的「宗教」思想；言論上的相對自由，使人們揭露了一些黨官僚的黑暗面

，因此黨至高無上的形象已在人民心中消失；一國兩制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算一個突破吧。所有這些形勢對目前的中國社會都起着良好的促進作用，這是社會的進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然而，黨內以陳雲、彭真為首的保守派，對近幾年激進派的改革並不完全贊成。他們本都是文革前的黨官僚特權階級，「文革」時都成了沒落的貴族，並且受到了相當的迫害。他們起初對鄧小平復職的支持，除了因共同的遭遇所產生的一致打倒「四人幫」的願望外，同時也有一種急於恢復「文革」前的特權利益的強烈欲望。可是目前的改革形勢的發展將會嚴重地損害他們的現有利益，同時大部份黨員幹部的既得利益也將面臨威脅，因此，他們認為要想穩保既得利益，最好回到「文革」前或五七年之前中共所走的舊軌道上去。如果鄧小平對這強大的保守勢力妥協讓步的話，或者鄧小平本人也有這種傾向的話，那麼在回到舊軌道之前，利用對「文革」的否定來肯定「文革」以前的「正確」軌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必須否定產生文革的溫床

——集權專制制度

鄧小平派要徹底否定文革，就必須對歷史負責，拋開政治偏見，站在歷史的角度，用歷史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認識文革，徹底地否定毛澤東，徹底否定產生文革的溫床——集權專制制度，勇敢地糾正建造專制制度的黨，然後，建立多元化的民主體制。這樣在中國才能避免類似文革事件的重演，而否定文革才不失它應有的歷史價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於美國■

文化大革命

(中國大陸旅港作家) 孟 歌

——毛澤東帝王思想的產物

毛澤東——

二十世紀的創業帝王

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須研究毛澤東其人。

毛澤東是一名道地的創業帝王，他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歷史，完全是一個創業帝王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風馬牛不相及。根據什麼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

第一、毛澤東並沒有認真學過馬克思主義，他沒受過高等教育，只受過中等教育——長沙師範學校畢業。當時譯成中文的馬列主義著作極少，只有在北京大學等少數高等學府流傳，在中等學校，根本看不到。據他自己講，當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出納員時，看過「共產黨宣言」，那是李大釗介紹給他看的，此外他再沒讀過其它馬、恩的大部頭經典著作，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大部頭著作，尚未譯成中文，那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都是在外國讀

書時，通過外文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毛澤東不通任何外文，因此即使他想學，也沒有機會。

第二、即使後來有書讀，但只在國內讀書，也未必就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產生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那裡有參與資本主義大生產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要理解馬克思主義，首先必須了解資本主義大生產、了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然而中國當時仍然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既沒有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也沒有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要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到外國去留學，正是出於這個目的，周恩來等大批中共人士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其中包括鄧小平。但是毛澤東在建國之前，卻從沒出過國門。他如何能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

第三、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其它經典，它有一整套學說，其中包括三個方面：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裡無論那一方面，都是以歐洲的科學文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哲

學方面，至少是吸收黑格爾的辯證法及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政治經濟學至少吸收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至於科學社會主義，其基礎乃是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等先驅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要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這三個方面，必須對馬克思之前歐洲文化及學術思想為有相當水準。然而毛澤東並沒有讀過幾本西方的書，對於西方文化及學術思想的認識，從何談起？既然如此，怎麼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深知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準極其低下，因此他從來不敢像其他人那樣在著作中引證馬克思主義的原著，有時引一句半句，只是為了裝璜門面。為此他嫉妒別人，並且為自己解嘲說，有的人只懂得西方，「言必稱希臘」，却忘了自己的祖先。在毛澤東的五卷著作之中，的確是真正國粹的味道，絕少西方氣息，所以可以說五卷之中，沒有那一篇與馬克思主義有什麼關係。或許有人說「矛盾論」、「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論文，但是這種簡單的哲學道理，在中國古典哲學中早已被講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實現了他的帝王夢，但他還想做世界共運的領袖。

一清二楚，毛澤東正是從中國古典哲學中拾來，集中在一起拼成的。這一點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右派份子」揭穿了。

請問，這樣一個人，怎能被評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學識方面連半瓶醋都不夠，怎能被評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呢？

那麼，根據什麼說毛澤東是道地的創業帝王呢？

第一、毛澤東讀西方書不多，讀中國書却

甚多，尤其是中國歷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帝王統治術一類，不僅讀得多，並且讀得深、讀得細、讀得很熟，用的時候可以信手引來。在他的著作中，到處可以看到他援引中國典籍。而中國的歷史，是漫長的專制社會的歷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完全是帝王將相推行封建統治的記錄。讀這些東西，對於一個世界觀尚未完成的青年來說，是必然受到影響的。毛澤東正是通過學這些東西，完成了自我教育，形成了他的世界觀，正是這些東西為他打下了思想基礎，因此他終身離不開這些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在他的書房裡只看綫裝書，而看不到洋裝書的緣故。

第二、做為一個搞政治運動的專制主義者，儘管他搞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但是一旦人逢其時，他的專制主義思想就一定會表現出來。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之前，雖然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已經相當顯赫，但是他只是「毛委員」，還不是「毛主席」，他的帝王思想還沒有表現的機會。但是在遵義會議上取得了軍權之後，他感到他已經上升到創業帝王的位置了。於是他的帝王思想迅速發展起來，以至於幾年之後他便作詞言志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首詞暴露得淋漓盡致，何等深刻！他不僅要成為創業帝王，而且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的思想超越了歷代創業帝王，未登極而開始呼萬歲了。

第三、他奪取政權的方法，也完全是傳統的一套：在全國各地發動農民起義，由小到大，大而聯合，從鄉村向城市進攻，從地方向中央進攻，向京城進攻，最後奪取全國的政權。

那些在外國學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李立三等，主張以蘇聯的方式進行，先在大城市發動工人武裝起義，然後向鄉村發展，失敗了，因為中國不是俄國。毛澤東批判了他們，主張發動農民，依靠農民，而不是依靠工人。他知道這似乎不大符合馬克思主義，於是他聲稱仍然以工人階級思想為指導，實行「鄉村包圍城市」。什麼「以工人階級思想為指導」，事實就是以他的創業帝王的理想為指導；什麼「鄉村包圍城市」，事實上就是農民起義，和歷代以農民起義，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第四、他的這一套真實思想，在他過世前兩年，他居然在外交場合公開坦白出來。當基辛格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時，曾經直率地問他：「你是否認為你屬於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帝王之列？」他毫不含混地說：「是的，我是這樣認為。」可見他是創業帝王，這也是他為自己做的結論。

或許有人問：既然是創業帝王，為什麼一生打着共產主義的招牌呢？

毛澤東固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但畢竟是一名政治家，而且是生於二十世紀的中國罕見的政治家，他了解中國的歷史，更了解中國的國情，他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怎樣落後，終究不是清朝以前的中國了，要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用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那一套不行了，「背天行道、推背圖」一類玩藝兒，到了二十世紀，已經到了失效期了。若要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去為奪權而鬥爭，必須樹起新的旗號，創出新的理論，給民眾新的希望。當時的中國，已經是辛亥革命之後，封建王朝已被推翻，執政的是國民黨政府，要推翻這個政府的統治，最

好的旗號莫過於社會主義，最好的理論莫過於馬列主義，最好的希望莫過於共產主義社會。這是當年全世界最時髦的東西，況且還有蘇聯做範例。思想敏銳、韜略超人的毛澤東，認清了他所處的時代，選中了共產主義做爲他打天下、坐天下的招牌，正說明他是一個政治天才。歷史證明，他的選擇完全正確，就是利用這塊招牌，打下了天下，坐了天下，成功地推行了帝王統治。

一黨天下——一人天下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帝王創業畢竟是不相水火的兩件事，從理論上講，前者是爲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給人民民主和自由，這是奪權時代中共大力宣傳的；後者是爲了實現一家天下、一人天下，繼而推行文治武功，擴張勢力，開拓帝業。這是藏在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創業藍圖。因此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自毛澤東掌握領導權之日起，就潛伏着矛盾。這個矛盾，在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國家之後，必然暴露出來。毛澤東做爲一個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對於歷史的轉折，早有準備，那就是堅決取締民主、自由，實行獨裁、專制。爲此建國之後從兩方面着手，一是輿論上宣傳，民主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只是手段；自由並非無限，而是有限。二是政治上排斥一切民主黨派，實行一黨天下，再也不提三年前他所倡議的「聯合政府」，而是成立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這就是毛澤東按照他的帝業藍圖邁出的第一步。

這一步即刻在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中引起反應，雖然當時已無人敢公開反對。但是對這

種反應，毛澤東也看在眼里，記在心裡，並且很快採取措施——掀起「思想改造運動」。甚麼叫「思想改造運動」？就是強迫知識份子承認自己在思想上是屬於「三大敵人」一邊的。民主黨派莫不由知識份子組成，順理成章，民主黨派在思想上也都是屬「三大敵人」一邊的。迫於政治壓力，知識份子只有就範。這樣，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是理所當然了，這就是毛澤東帝王文治的勝利。這一勝利，既鞏固了中共的一黨專政，更爲毛澤東實現一人天下奠定了基礎。

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在黨內大搞集權活動，集三個「主席」於一身，樹立個人的絕對權威，大搞個人崇拜，大小集會，「萬歲」之聲不絕於耳。

在這點上，斯大林在蘇共黨內的獨裁，對他極爲有利。當時他正在提倡「一邊倒」，一切以蘇聯爲準。黨風自然也必須以蘇聯爲準，對他的崇拜，也應以蘇共對斯大林的崇拜爲準。如果說他對斯大林有種種不滿，這一點却是他最滿意的。

但是，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成員，不同於蘇共。蘇共高層的成員，是斯大林一手選拔的，在思想上是清一色。中共高層的成員，要複雜得多，有留法的，有留蘇的，還有留德的，他們不是毛澤東選拔的，而是個人奮鬥取得的，他們和毛澤東在思想上並不一致。

毛澤東善於洞察秋毫。一九五四年，他個人的權威整肅了高崗和饒漱石。無論整肅的借口是甚麼，殺雞儆猴是其目的之一，這是不言而喻的。

儘管如此，當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時，同年在中共的「

八大」上，鄧小平也公開提出了在中共黨內反對個人崇拜的意見。毛澤東知道，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一種思潮，因爲這次大會的氣氛，就是要求黨內民主。這是建國之後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毛澤東帝王思想開始暴露以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已經絕對牢固，個人的權威，已駕一切之上。因此要求民主的思潮，對他毫無作用，他照樣當選爲主席，大會之後，很快壓服了民主思潮，推行個人崇拜更甚一層，當蘇聯以及絕大多數兄弟黨不再掛斯大林像，他却下令，照舊把斯大林的像和馬恩列排在一起。由此可見，中共的「八大」，以反獨裁開始，却以獨裁者勝利告終。但是「八大」之後毛澤東所感到的並非絕對勝利的喜悅，而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他看到他能夠壓服政治局，扭轉乾坤，推行他的帝業藍圖；憂者，他看到反對

一九五六年「八大」，劉少奇做政治報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



派的勢力不容低估，並非全無群起反抗的可能。這就是「八大」之後為什麼他以主席的權力無限期拖延「九大」的原因。

做爲創業帝王，毛澤東的武功是進攻，文治同樣是進攻。「八大」之後，他密切注視黨內的動向，尋求、乃至製造進攻的機會。「八大」會議上，對當時國內形勢有一個估計，認爲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此後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搞建設需要科學、技術、文化，而科技、文化都掌握在知識份子手裡，因之需要動員知識份子，爲此而制定了知識份子政策，號召知識份子向科學進軍。政策是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宣佈的，受到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

搞建設，這和毛澤東的帝業藍圖不符，毛澤東從來沒考慮過建設，他想的是武功、文治。文治爲了武功，武功保證文治。甚麼叫武功？武功就是戰爭。毛澤東一直考慮戰爭，後來他反覆稱：要準備打仗，打完仗再建設。關於戰爭，他已經想得入了迷。因此他根本不同意搞建設。至於動員知識份子，提高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就更是他的大忌，他所想的不是提高知識份子的地位，而是如何整肅和降低他們的地位。

但是，出於策略，在上述兩個問題上他都妥協了。他明白，這都是技術問題，只要他掌握了最高權力，講一句話就可以否決掉。後來他的態度是，社會主義建設他不抓，至於知識份子問題，他認爲這是黨內反對派想利用知識份子的力量反對他，因此他看得非常嚴重。他明白，「思想改造運動」只是把老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整肅了一下，使他們當時不敢和共產黨爭權，但是並沒把他們搞垮、搞臭，七、八

年過去，新的一代成長起來，比老一代更有銳氣，兩代知識份子對於他推行帝業藍圖，無異是一個嚴重障礙，必須及早除之，以防後患。這就是「反右運動」的真正的政治背景，這也是由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政治形勢急轉直下的根本原因。

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利用這次機會，空前殘酷地鎮壓了知識份子，一頂右派帽子，澈底將知識份子治服。鎮壓不是目的，目的是爲了實現他的總戰略開路，因此鎮壓是無限期的，「右派帽子」是無限期的。

知識份子被澈底打倒了，搞臭了。民主黨派全部被取締了。至此實現了真正的黨天下。不過通過「反右運動」，人們也看清了毛澤東的帝王的真面目，——他踐踏了憲法，就像踐踏一張廢紙一樣，而且從此再也沒人提到過一九五四年頒佈的憲法。由此可見，他不僅對「八大」的決議不滿，而且對憲法同樣不滿。這件事說明，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



毛澤東壓鎮了知識份子，強迫他們勞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再也不是共和國，已經變成了帝國。對此毛澤東坦率地承認，並不忌諱。當外交學會會長、非共黨人士張溪若說「反右鬥爭」猶如焚書坑儒時，他大言不慚地回答：「有人說我像秦始皇。不對，我比秦始皇還秦始皇！」這不啻向全國、全黨宣佈，他已實現了一人天下。

帝王夢的破滅

必須指出，反「右」不是目的，目的是打倒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打倒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也不是目的，這只不過是文治，而文治是爲了武功，說穿了就是爲戰爭做準備。一切創業帝王都有戰爭欲，毛澤東也不例外，而且更爲強烈，這就和一切贏錢的賭徒都喜歡賭博是一個道理。毛澤東老早就想打仗，只是由於斯大林反對，不敢放肆。韓戰開始，斯大林就反對中國介入，斯大林怕戰爭，如果打新的戰爭，斯大林會更加反對，因此他的戰爭慾，也只好收斂一點。但這時斯大林已經過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他已坐上老大的交椅，國內已經實現一人天下，因此他的戰爭慾大大發作，他要準備打仗了，而且情緒十分急迫。

一九五七年十月，莫斯科舉行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毛澤東親自率中共代表團參加。這是毛澤東平生第二次出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和斯大林會談，可見他對這次會議的重視。這樣的會議，本來派周恩來出席就足夠了，爲什麼要親自參加呢？因爲此去懷有特殊的目的。

大會發言時，毛澤東親自登台講話，他以挑戰的語氣向八十一個兄弟黨的代表喊出了這

樣一段話：

「……有人說我們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要打仗，依我們的意見，豁出世界一半人口，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

台下當即嘩然。吃過二次大戰苦頭的歐洲的代表們，即席質問：人口都沒了，還要社會主義做什麼？人們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他不是開玩笑，而是把他考慮已久的方案公開了。因此儘管遭到各國代表的反對，他並不想放棄他的戰爭計劃，他仍然同赫魯曉夫就此舉行會談，但是降低了條件，不再要蘇聯出人，只要求蘇聯供應武器。赫魯曉夫拒絕了他，並且贈他一個綽號——大公雞（俄語：好鬥的人）。此後這個綽號在「真理報」上出現過無數次。

莫斯科一行，完全失敗。

關於毛澤東的戰爭慾，關於他企圖發動新的戰爭，許多海外朋友不大理解，甚至表示異議。這不奇怪，因為胎死腹中，對外並未釀成大禍。但是關於他的戰爭慾以及發動新戰爭的企圖，是不難證實的，這是因為：

第一、他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主張以戰爭推行革命，他只相信槍桿子，他逢人便講，不僅在國內講，而且到國外也講；不僅對共產黨人講，對非共黨人士也講。已故印度總理尼赫魯，是最早聽他談論戰爭的外國元首之一。他教尼赫魯不要怕現代戰爭，他說關雲長的大刀也同樣殺死許多人，中國人同樣生存下來了。他和印尼已故總統蘇加諾談論戰爭，大講武裝革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第二、建國伊始，就援助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並且以種種方式給以種種支持，甚至在三年困難時期，也還要全民勒緊腰帶，保證對這類武裝力量的供應。

第三、當毛澤東在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上的發言從莫斯科傳出之後，美國方面立即佈防，由南太平洋的關島至日本的佐世保一條線上，部署了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等各種殺傷力極大的武器，以防毛澤東揮軍殺出太平洋。這些武器，直至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和毛澤東會談之後，才敢拆除運走。

毛澤東的戰爭計劃雖未得逞，但是這段歷史不容抹煞。

爲什麼一九五七年十月大放戰爭厥詞？

因爲這時是國內外「一派大好形勢」，他自己獲得了絕對權力，因此他認爲這是宣佈他的戰爭構想的大好時機。但是他沒估計到，遭遇這般強烈的反對、抵制、乃至嘲笑。儘管如此，對他的既定方針，毫無影響。——這一天他已經等了多年，他的戰爭慾已達於狂熱，令他失去理智。「兄弟黨」不支持，他決心自力更生，發奮圖強。這就是一九五八年末「三面紅旗」出籠的真正背景。

名爲「三面紅旗」，實際內容只有兩項：一是成立人民公社，一是全面煉鋼。成立人民公社的目的根本不是爲了什麼提高農業產量，而是爲了把一年所產的糧食統統收歸國有，以備戰爭之需，全民煉鋼的目的，自是不言而喻，——人民戰爭，需要無數的鋼鐵。爲了做到這兩件事，毛澤東專發一條語錄，貼遍全國城鄉。內容是：「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麼都好辦了。」備戰心急，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這兩件事都失敗了，一個失去理智的人學唐吉哥德，做任何事都必然失敗！這兩件事的失敗，非同小可！全民煉鋼，全國動員，浪費了無可估量的人力，耗盡了財力、物力，

尤其是吃光了糧食；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遭到全國農民的反對，五八年成立，五九年便是荒年，而且一連三年，嚴重欠收，全民陷入飢餓之中，餓殍遍野，死人無數。這一切對於一個創業帝王來說，都是小事，姑且不論；但是他的戰爭計劃失敗了，他的帝業夢破滅了，這是大事；他表現了帝王的專橫、霸道，暴露了他的思想並非戰無不勝，實乃幼稚、無知、可笑，從此威信掃地，這是大事！憑他的政治嗅覺，他已料到，黨內反對派，必然有人乘機行動。

他的預料不錯，果然站出一個彭德懷來。彭在山東巡視一番之後，痛斥山東省委；隨之又鬧到中央，公開譴責人民公社，矛頭直指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的構想

一場「路線鬥爭」終於爆發了！這是黨內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於黨內反對派的動向，自「八大」以來，毛澤東一直密切注視，極爲敏感。彭德懷的問題，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不但是正常的，應該是允許的，而且是值得稱讚的，因爲他的目的是維護中共的利益；特別是當人們懼於毛澤東的陰險、毒辣而不敢站出來講話的時刻，他勇敢地站出來慷慨陳詞，就更值得稱讚。然而他萬萬沒想到，這時的毛澤東，早已不是往昔的共產黨主席，而是一位除了權力之外一切概不承認的暴君了！

作爲封建暴君，毛澤東所考慮的，不是他自己犯了何等嚴重的錯誤，而是如何整肅彭德懷，並收到懲一儆百之效。這就是毛澤東設計

廬山會議的出發點。

但是毛澤東也估計錯了。他以為他早已是龍威不可冒犯的聖君，政治局的委員們不過是唯諾効忠的臣子，誰個敢站在彭德懷一邊反對他？他沒料到在廬山會議上，居然有人不站在他一邊，而反對他對彭德懷的整肅，其中包括周、劉、鄧，在表決時，令他成爲少數！這就是爲什麼幾年之後，當彭德懷被徹底打倒時，他曾良心發現似地對彭說過：「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但是在會議當時，他却充分運用了主席的權力，堅持對彭的懲處，而在懲處彭的同時，他感到彭案已經是小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如何懲治政治局的多數人，他們居然公開反對他，他感到人心思變，他的帝王寶座動搖，他感到必須發動黎民百姓，搞一次規模空前的運動，再造乾坤。——這就是毛澤東以大腦皮層破土而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萌芽。

再造乾坤談何容易，這不同於打倒一個階級，也不同於搞垮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這是和黨內掌握實權的大多數較量。這個大多數，既然政治局如此，中央委員會亦然如此，基層組織必定如此。那一個政治委員手下沒有一幫人馬？如果整肅上層一個，基層就會有一幫人反對！如果整肅上層的大多數，肯定會引起全黨大多數人反對。這一點，毛澤東非常清楚。再則，他的帝王思想既然已經暴露出來，引起上層的反對，也必然引起基層的反對，這一點他也十分明白。因此，要整肅上層，也要同時整肅基層。這無異是整肅全黨，這該是怎樣一場較量啊！

但是，無論如何艱巨，也必須搞，也要孤注一擲！這是關乎他一生成敗的大事。不過，他畢竟是一位歷史上罕見的政治家，鬥爭漩渦

中的強人、老手，面對這一場空前規模的鬥爭，他是不会輕舉妄動的，必須經過反覆思考、充分的準備。——這就是爲什麼在廬山會議之後他突然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而讓位劉少奇的真正原因。當時公開宣佈的理由是，他要集中時間去更多的研究馬列主義，不願意用許多時間去接見外賓。歷史證明，此舉目的有二，一是爭取時間，去準備這場鬥爭；二是產生一個新主席——製造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請君入甕。

這一場準備，整整耗費了七年！

在這七年之內，毛澤東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把軍權抓過來，牢牢握在手裡。

國防部長原來由彭德懷擔任，免去彭，任命林彪。林在廬山會議上，反彭最堅定。林上



六十年代，全國掀起造神運動。

任伊始，馬上宣佈，要把解放軍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大力推行「學習主席著作運動」。「毛主席語錄」這本文化大革命中的「紅寶書」，就是解放軍新發明，文革之前早已在全軍流行。林彪是第一個率先在部隊中，大樹特樹「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宣傳無限忠於毛主席。毛澤東十分滿意，下令「全國都要學解放軍」。

第二、全國開展造神運動，把自己由人變成神。

造神運動，並非自文革開始，也不是四人幫的傑作。早在林彪宣佈要把解放軍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之後不久，人民日報就提出「全國都要辦成毛澤東大學校」。於是全國各行各業大力開展學習主席著作運動，號召「天天讀，雷打不動」。自中央至省、市、縣，召開「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份子代表大會」，選出了無數的積極份子。雷鋒是出名的一個，於是毛澤東號召並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接着是憶苦思甜，不忘昔日苦，牢記今日甜。能有今日甜，必須感謝恩人毛主席，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最後的號召是，要把毛澤東思想當做生命、當做靈魂，千秋萬代傳下去。這時「毛主席的形象」早已遠離中央政治局，脫去了人格，變成了神格。

第三、嚴厲鎮壓知識份子。

對知識份子，自「反右運動」以後，壓根兒就沒放鬆，一直在不斷地施加壓力。已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都遭到最殘酷的迫害，自不必說。即使沒戴「帽子」的人，也感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們同樣被送到鄉村、工廠去長期勞動，雖然與「戴帽右派」有別，但同樣叫做勞動改造，這種改造人人有份，

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並且是無限期，每年都要輪一回。實際上是製造一種壓力，永遠壓在知識份子頭上，以便他們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在這七年內，關於知識份子，毛澤東發了不少語錄，都是對知識份子提出警告。試舉其中一條：「……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一條語錄，把全國各級學校的知識份子統統劃入了資產階級。「反右

運動」之後本來早已失去師道尊嚴的教師們，從此成了專政對象。

早在文革之前兩三年，全國知識份子，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了。

十年浩劫

七年的準備，——牢牢掌握了軍隊，有力地爭取了群眾，徹底鎮壓了知識份子，這場運動，應該說很有把握了。然而毛澤東却十分慎重。雖然他是搞運動的專家，但是搞這樣的運動，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實在缺少經驗。因此他不敢像歷次運動那樣，開門見山，單刀直入。開始之前，他三思如何發動？開始之後，他苦想如何引導。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空前殘酷的整肅運動還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緣故。發動之初，並未提「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口號，更未提「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而是從破「四舊」開始，反對舊風俗、舊習慣、舊思想、舊文化。當運動逐步發動起來之後，當第一批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問世之後，才正式攤牌。——他非常清楚的，運動的阻力太大了，他將遭到全黨各級幹部的反對，他的估計完全正確，就在通過文化大革命決議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遭到大多數的反對，他是絕對的少數。他不得不又一次利用主席的權力，強行通過，並且威脅與會者：「我和林彪上山打游擊，江青留給你們殺！」說打游擊是假，恫嚇是真，——他手裡掌握着全部軍隊，誰敢抗拒？與此同時他下令，給紅衛兵大民主，叫他們把各級黨組織砸爛，把一切敢於反抗者捉起來，關入牛棚。至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終於被他點燃起來。這場鬥爭，

空前的廣泛、空前的劇烈、空前的殘酷，在全國每個角落展開，並且不斷升級，由文鬥演成武鬥，變成了空前規模的大內戰！毛澤東創造了紅衛兵，大小「走資派」也充分利用了紅衛兵，毛澤東用紅衛兵鎮壓，「走資派」用紅衛兵反抗，雖然鎮壓的力量遠遠大於反抗的力量，但反抗者也不甘心投降就範。這就完全打亂了毛澤東的佈署，他預定兩三年完成的任務，却被拖得遙遙無期。到了運動後期，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又發生分裂，林彪要搶班奪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屋漏又逢連夜雨！這場文化大革命，真正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它不僅拖死了無數黎民百姓，拖死了無數的中共的幹部，也拖死了助紂為虐的林彪，也拖死了這場運動的發動者——暴君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延續了十年，而在毛澤東死後，才由他人收場。

歷史的教訓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幾年了，但是留在大陸同胞心靈上的創傷，是難以醫治的。

歷史向人們提出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是什麼？

過去的悲劇，總算過去了。可悲的是，神州大地至今不容反專制，不敢反專制，那顆令人難忘文革浩劫的帝王頭像，依然高懸在天安門前，那些虎口餘生的改革家們，似乎早已忘却，就是他製造了文革災難。

封建主義的幽靈，並未從神州土地被趕跑，而是被藏起來，養起來了。如今只是災後淫威收斂，但是，誰敢保證，明日逢時不再大鬧？

北京高幹子弟座談

胡耀邦前途不保

鄧小平權力交接形勢總分析（第一部份）

北京柳平小組整理

編者按：

下面發表的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形勢分析座談會摘要。這份材料，將國內政治勢力進行了系統的分析 and 歸納。對鄧小平權力交接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讀完之後，可對鄧小平、胡耀邦權力轉移問題，有一個全貌性的了解。座談中提到很多人物和事件，本刊由于人力和篇幅所限，未能做背景性介紹。讀者若有不明之處，請來函詢問。座談會紀要較長，本期先登第一部分，下期爭取登完第二部分。希望大家讀完之後，積極參加討論，本刊「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歡迎來稿，凡通訊、報導、分析、評論、資料，均表歡迎。

總部：

按總部意圖，為慶祝中國民聯成立一周年和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兩周年，我小組召集了幾位幹部子弟，就國內形勢進行了座談。尤其對鄧小平、胡耀邦權力交接班問題，從多方面進行了探討。現將報告托人帶上，供參考。如果總部認為適宜，可將報告的部份內容於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以期引起討論，發表時，望修改有關姓名。座談會中的內容，僅代表發言者個人的看法，不代表我們整個小組的觀點，此點應加以說明。中春簡訊第一期已收到，并已散發，請放心，向同志們問好。

柳平小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座談會內容：近期國內形勢分析（本刊僅發表鄧小平權力交接部份——編者）
座談會時間：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下旬

座談會地點：北京

參加者簡介：

蕭莉：中國民聯北京柳平小組成員，國家幹部。其父為退休將軍。座談會主持者。

張冬國：國家幹部，同情中國民聯，曾積極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其父為退休將軍。

錢樹林：國家幹部，在國家機關工作。同情中國民聯，在西單民主牆時期曾活躍過。其父為部長級幹部，已退休。

王克冀：現役軍人，在某總部工作，對中國民聯持持平的觀望態度。曾積極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其父為部長級以上幹部。

于小占：從事文藝工作，同情中國民聯，其父為部長級幹部，已去世。
（註：文中的小標題由本刊編輯所加）

胡趙改革派

蕭：現在我們轉入鄧小平、胡耀邦權力交接問題的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平時總在私下談論，希望今天能夠條理化一些，理出個頭緒來。我們先分析一下國內有那種政治力量可以接鄧小平的班。

于：我認爲國內當前起主導作用的力量是黨內改革派。這個派別的政治力量很大，其領袖人物爲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班底也較扎實，骨幹力量爲共青團派，如胡啟立、郝建秀、王兆國等人。另一骨幹力量爲趙紫陽爲首的技術官僚集團，如田紀雲、李鵬及一些部長。改革派的社會基礎應該承認是較雄厚的，那就是從鄧小平改革中獲益的農民。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們比較容易滿足，認爲現在比過去強，過得去，就行了。聽說一九八三年鄧小平視察四川，上峨嵋山時在路邊碰上一位賣菜的老太太。鄧小平問她現在生活如何，她說較過去好過多了，鄧小平點點頭就走了。鄧小平走後，後面的人問老太太知不知道剛才問話的是誰，老太太說不知道。別人告訴她就是鄧小平後，老太太一下子朝遠去的鄧小平跪下來，連磕了幾個響頭，還叫老天爺保佑鄧青天長命百歲。你看，我們國家農民就是這個樣子。這就是鄧小平改革派的基礎——慾望低、易滿足的農民。

蕭：你說得有些道理。農民就是盼個青天，盼個好皇帝。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安徽老家餓死了五百萬人，楞沒有人揭杆而起。撤了第一書記曾希聖，換了李葆華之後，政

策改變了，農民開始有口飯吃。於是，我們家鄉的農民就高呼李葆華爲李青天，李到鄉下時，很多農民扶老攜幼給他磕頭。其實，這根本不是李葆華的功勞，是中央的政策有了轉變，李葆華只不過是一個中央文件的收發員罷了。我們的民主運動必須面對這樣一批農民，必須提高他們的民主意識。

錢：你倆講的都是事實，但我認爲不全面。你們說的那種農民固然有，而且以前比例較多，但是，現在的農民已絕不像以前那麼單純。我經常接觸農民，有直接感受。比如，我父親在陝北時，曾交過幾個農民朋友。近一兩年來，這幾個農民朋友常帶着他們的兒子到北京，目的是找我爸爸等人拉關係，做買賣。我和他們推心置腹地談過。他們承認現在日子比四人幫時代好過了，但他們說，當地農民生活好轉後，並不是感謝共產黨，而是到廟裏燒香拜佛。說這是老天爺給的。有的還說，共產黨拿下北京城之前，陝北生活本來不錯。共產黨進了紫禁城，他們生活越來越壞。現在四人幫被抓，是老天的報應。現在生活好轉，與共產黨無關，是老天爺懲罰了共產黨後，給了人民好生活。所以，他們去燒老天爺的香，不燒共產黨的香。這部分農民當不在少數，他們對共產黨已失去信任，他們不能稱是鄧小平改革派的社會基礎。陝北老根據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蕭：你講的當然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並不是說，當前從改革政策獲益者，都會支持鄧小平和胡耀邦。比如我姐夫兩個月前回江蘇

看了一趟，他們家鄉是常州市近郊，生活水平較城市還高。農民說，我們現在生活好了，是本來就應該的，要不是共產黨老犯錯誤，我們早就生活得這麼好了。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他們那裏的農民要求把土地買下來，不是像現在這樣從共產黨手裏租土地。他們還希望能夠合伙辦工廠，發大財，不受政府的限制。像這一部分從改革中獲益，但又不滿足現狀，要求進一步往前走的人，應該算是民主運動和中國民聯的社會基礎。

張：如果你們中國民聯在綱領中明確土地分給農民，並且可以自由買賣，那一定會獲得大部分農民的支持。

蕭：我們已將此建議轉達給總部。現在，我們扯得有點遠了。再回到國內政治勢力劃分的題目上來。克冀，你在軍隊工作，你覺得改革派在軍隊中的基礎如何？

王：這個問題難說，我沒有做廣泛的民意調查，只能說一下個人的感覺。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軍隊在改革中獲得了什麼好處？大家知道，軍隊始終是一個獨立王國，卅多年來，不管國內發生了什麼，軍隊的待遇都是不錯的。這兩年，軍隊的待遇沒有下降，但相對於發財的農民來說，待遇亦未有明顯改善。這就是說，平均來看，改革並未使軍人的個人利益增加，相反，却有所下降。比如，現在入伍的士兵每月津貼只有六塊錢，加上各種補助，不過十幾元。我到過山東一個連隊，一個戰士對我說，他的一個農村伙伴現在每月可從做生意獲利二百多元，頗有羨慕之意和當兵吃虧的感覺。我們首長也認爲，這是一種潛

在的危機。如果不讓軍隊在改革中獲得實際利益，從長久看，軍隊就難以支持改革。當然，這兩年部隊的現代化在改善，尤其是海軍的裝備有了較大改進，滿足了一些軍官的心理要求。但我認為，主要的是要使部隊的個人待遇提高，從高級軍官到

士兵，都要提高，提高的速度要與農民、工人、知識份子的相似。

張：這裏有個矛盾，要現代化就要有錢，如果大量的錢用於提高部隊生活水平，就不能加速工農業的現代化。

王：所以，現在中央軍委號召部隊要大規模投

大家認為，中國大陸當前政治勢力可主要分為五個：

第一：改革派，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此派風頭正健，但缺乏理論基礎，軍方基礎不穩固；

第二：恢復派，以陳雲、彭真、王震為首。此派有理論，有較強的軍隊基礎，他們想將中國經濟體制恢復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模式。此派當前勢力極為雄厚。鄧小平是介於改革派與恢復派之間的人物；

第三：青年民主派，包括從激進的黨內年輕改革派到中國民聯，要求中國政治、經濟走向多元。此派潛在力量很大，且有部份中青年軍官支持，但缺少聚集力量的時機；

第四：凡是派，以華國鋒為首，獲軍中忠於毛澤東力量之支持，唯群眾基礎薄弱；

第五：林彪勢力派，深植於原四野部隊，想為林彪平反，伺機而動，但缺乏領袖人物；

其餘政治派別，如四人幫、極左派等，無群眾基礎，已基本失去東山再起之可能。

入生產，號召部隊做生意，自己找生財之道。伍修權曾跟我們談過，他們對國際戰略的研究結果顯示，最少二十五年内不會發生世界大戰，因此備戰可以鬆口氣，抓緊時間搞建設。以後部隊要靠自己的生產掙錢，改善生活，不能光伸手向國家要。

蕭：部隊幹部對鄧小平、胡耀邦的改革政策的評價如何？

王：這正是我要談的。我接觸過不少老將軍，如宋時輪上將、呂正操上將等，都覺得鄧小平做得有點過頭。他們說：「改是要改，不過並不是什麼都改。」

蕭：根據你的分析，改革派在部隊中的基礎很薄弱，是嗎？

王：至少目前可以這麼說，另外，我們單位一些首長私下對我發過牢騷，對一方面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搞資本主義不理解。一位副軍長和我父親吃飯時就說過：「搞點資本主義也沒錯，資本主義可以使人發財。但不要把我們都看成傻瓜，用『堅持毛澤東思想』來騙我們。鄧小平、胡耀邦不如說明了，當前就要搞些資本主義。我兒子和女兒都直說他們喜歡資本主義。大兒子出國參觀回來，把資本主義說得天花亂墜。為什麼鄧小平、胡耀邦總是不相信我們？」

蕭：那麼，依你看，軍隊最支持那一派力量？

王：我的體會是較支持陳雲為首的穩健派。

陳雲為首的恢復派

錢：我發表點看法。我認為陳雲為首的一派不是什麼穩健派。我們稱之為恢復派。我在

計委工作過，深知此派力量之強大。此派的特點是：不同意毛澤東、四人幫及華國鋒的政策，但對鄧小平、胡耀邦的路線亦有保留。他們迷戀的是五十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迷戀的是蘇聯模式。他們認為蘇聯的經濟基本上是成功的。這一派人想將中國經濟恢復到五十年代的模式，改訂再恢復派。這一派有領袖人物，如陳雲、先念、彭真、王震等。根據我的印象，姚依林也屬於這一派。他們有理論根據，那就是正統的馬克思和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理論。在中央最近通過的『關於城市經濟體制的決定』的定案過程中，據說陳雲、姚依林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理由，成功地將『決定』限制在一個大烏籠內。我在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兩位朋友，甚至認為這個『決定』並非是趙紫陽的勝利，而是陳雲的勝利。雖然我的這兩位年輕朋友觀點較為激進，但他們的憂慮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恢復派除領袖外，還有一批骨幹力量，那就是部級及司局級幹部。他們大多已五十多歲，有些是留蘇的，或五十年代跟過蘇聯專家的。即使沒有留學蘇聯，他們在年青時接受的大學教育或業餘大學教育，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一套。他們對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是熟悉的，對蘇聯模式有天然的親合力。試舉一個例子，如果一會兒我們聊完天後，叫我做個法國菜，雖然全部的作料都有，我可能還得做成中國味，或做成不三不四的偏向中國味的菜，決不會做成道地的法國菜。道理很簡單，我腦子裏裝的全都是中國菜的燒法，我既沒有親眼見人家燒過法

國菜，更沒有親手做過。讓這批腦子裏裝着馬克思、斯大林經濟模式的人管中國經濟，能麼不恢復到五、六十年代的體制上去？至多來個修修補補，弄點兒個體小生產做個補充而已。另外一點對恢復派很有利，那就是，我國的工業基礎是蘇聯幫助建起來的。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鞍鋼、包鋼、洛陽拖拉機製造廠等。文革後，經濟被搞垮了。走新路不容易，恢復到五十年代的模式，或大部分恢復到五十年代的模式，是易於反掌的事。

于：老錢搞過經濟，從經濟觀點看，陳雲的恢復派勢力最大。

張：剛才小于把副總理李鵬、田紀雲歸于鄧胡趙改革派之列，按老錢的分析，似應歸到恢復派之中去。李先念是個和事佬，是個風派人物，不像陳雲、彭真等強人。李先念并不重要。

錢：至少李鵬是恢復派人物，他是留學蘇聯的，蘇聯的烙印很深。我有個同學和李鵬長談過經濟走向問題，李鵬明確表示我國不能搞自由經濟，他的談話中，留有很深的斯大林『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影子。我的同學認為，李鵬基本上不是個創新的人物。

王：叫穩健派也好，稱恢復派也好，這一派人的軍隊基礎是很強大的。目前軍中的很多人屬於這一派。如王震、余秋里、洪學智等，還有一大批不在軍職的軍人，如楊成武等。據一位可以接近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的朋友講，秦基偉在私下也對胡耀邦表示過異議。

蕭：看來，恢復派有領袖、有骨幹隊伍、有理

論、有軍隊支持，其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大家認為，華國鋒還有多大的實力，他能否構成一派？

華國鋒的凡是派

張：我認為，華國鋒很難單獨地構成一個大派，但能成爲一小派。恢復派中的陳雲、彭真、王震等，肯定反華國鋒，尤其陳雲最恨華國鋒。華國鋒是文革受益派，真心實意支持華國鋒的是葉帥，還有陳錫聯、汪東興、陳永貴、劉子厚這些人。這些人的社會基礎并不大，地方幹部中，擁護華國鋒的人不多。

王：可是，葉帥在軍中還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葉帥體健，華國鋒仍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但是，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即軍隊中忠於毛澤東的力量有可能擁出華國鋒做

華國鋒會東山再起嗎？



領袖進行鬧事。老軍人中，忠於毛主席的人大有人在，像陳再道、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傅鍾、江擁輝、張銓秀等。他們之中有些人雖不在軍職了，但與軍界聯繫甚多，很多老部下都在軍中。江擁輝、張銓秀現都是在職的大軍區司令員。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可能大家早就注意到了，那就是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他的思想基礎與華國鋒很相似。但是，李德生如果造反，可能會自己出來幹，他能力很強，瞧不起華國鋒。如果陳再道、許世友造反，倒有可能抬出華國鋒做領袖。

林彪的剩餘勢力

于：我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林彪的力量有沒有復興的可能？我父親原在「四野」，他雖然去世了，他的戰友還常到我家來。我的印象是，他們好像對後來的失勢很委屈。

蕭：你說的不錯。林彪的「四野」原來力量最大。解放後，尤其是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之後，很多軍除要職由「四野」的人擔任。總參、總政、總後三大總部及空軍、海軍，還有東北、成都、廣州、福州、濟南等大軍區，都被「四野」的人控制了。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勢力被整肅，「四野」的很多高級領導被逮捕、下獄。林彪死後的四人幫時代、華國鋒時代以及現在的鄧小平時代，「四野」的人一直受壓，高級軍官或被整、或被冷置、或被退休、轉業，中級軍官提不上來，情緒很大。

王：我的一個表親是「四野」的。他有一次到我家來說，鄧小平現在才否定文革，其實林彪早在十年前就否定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不就把文革、把毛澤東批得體無完膚嗎？他還認為，鄧小平今日之改革與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精神差不多。我問他：「照你的意思，應該為林彪平反啦？」他說，如果鄧小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實事求是地為林彪平反。看來，由於「四野」的人受壓太厲害，他們情緒較大，有為林彪翻案的念頭。張：我不大同意你們的看法，林彪勢力捲土重來的機會似乎不大。蕭：可能性雖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

平衡人物鄧小平

張：我對小于剛才的分析還有些看法，還沒有說完，你們就把話題錯開了。小于，可能還有諸位，把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完全歸在一起，統叫做改革派，恐怕不大妥當。鄧小平與陳雲是有些思想分歧，這從他們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來。但是，鄧小平與陳雲之間，也有很多共同點，甚至我感覺共同點多於分歧點。鄧小平對匈牙利改革頗有興趣，陳雲亦然。因此，我認為，鄧小平應該看做是改革派與恢復派之間的平衡人物。當前局勢較穩定，歸功於鄧小平的平衡作用發揮得巧妙。恢復派不滿時，鄧小平就安撫一下，做些讓步。恢復派扯後腿扯得太厲害，鄧小平就支持一下胡趙，給他們打打氣。問題是，一旦鄧小平去逝，這種平衡可能就被打破。改革派與

恢復派之間的衝突就有可能尖銳化。錢：我覺得你分析的有道理。蕭：鄧小平不但是政治強人，也是協調人。我們看「大參考」發現，外國擔心四人幫和極左派會東山再起，大家看法如何？

四人幫已完全勢微

錢：外國以為四人幫很有勢力，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四人幫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極小，即使毛澤東復活過來支持他們，也沒有多大可能。從中央到地方，從軍隊到老百姓，大家都討厭四人幫。華國鋒還有人同情，四人幫人人恨。就是那些忠於毛澤東的老軍人，也都極力反對江青、張春橋這班人。葉帥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與鄧小平有矛盾，但他更反對四人幫。

于：我的看法是，林彪「四野」勢力復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種可能性要比四人幫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大得多。我和小王有同感。我的一個同學在福建前綫工作，去年春節回北京見到我，就曾說他的姨父整天牢騷滿腹。她姨父原是「四野」的，是周赤萍的部下，與周赤萍並無密切關係。可是，林彪、周赤萍一倒，他就被削了權，現在成了個顧問。他發牢騷說，林彪是怎麼死的誰也不清楚，說不定是四人幫害死的，再抬上飛機，最後用導彈打下來，扣上一個判國的罪名。類似為林彪鳴不平的言論我聽到的不少。但我覺得，林彪的勢力抬頭要克服兩個問題，一個是要解釋清楚暗殺毛主席的動機；一個是要推出領袖人物，這兩點都不容易。

王：我認爲殺毛澤東的問題用不着解釋。或者說根本沒有那回事，是四人幫陷害忠良編造出來的；或者乾脆說爲民爲國除害，就是要除掉毛澤東，因爲看清了毛澤東胡鬧的本質。後一種說法不一定不得人心，文革後期，老百姓都恨透了毛澤東。「四野」要推出新的領袖人物，也不是不可能，目前在台上的，還有幾員大將。福州軍區司令員江擁輝就是一位。

青年民主派

蕭：好了，我們暫不做各種推測，這個問題留待後面討論。我同意四人幫翻不了身的看法，也同意林彪「四野」力量有突然再起的可能，但要出一個軍界強人，一個領袖人物，需要一個將「四野」剩餘力量聚集起來的人物和機會，但這並不容易。下面，討論一下青年民主派，就是我們這批人。

張：你提青年民主派，首先我想知道你對青年民主派的定義。

蕭：我所理解的青年民主派，指的是希望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的人士。這就有一個前提：承認當前的一黨專制不是民主政體，中國要有一個制度上的根本變革。由於這部分人大都在二十多歲至四十多歲的年齡組，故稱爲青年民主派。

張：那嚮往民主制度的五、六十歲的人，或七、八十歲的人怎麼辦？

蕭：他們當然也是民主派，是青年民主派的軍師或後台。他們思想年青，比三四十歲擁護專制的人思想還年青，也可算是青年民主派。

主派。

錢：我覺得青年民主派的稱呼比民主運動好。一提民主運動，就令人想到西單民主牆和民刊，或「四·五」天安門運動。我和小張都參加過「四·五」運動，在西單民主牆時期也活躍過一陣子，可算半拉民運份子。可是，我有很多同學、親戚、朋友，他們雖沒有去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甚至沒有去看過西單民主牆，但他們的思想比我還活躍，問題看得比我還尖銳，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渴望比我還強烈，他們不算民運份子？你叫他民運份子，他們可能還不領情，甚至會反感。但統稱爲青年民主派，大家都可以接受。

王：把這批人統稱爲青年民主派，未必十分科學。但一時還找不出更合適的稱呼。

蕭：關鍵是否贊同民主制度，凡主張中國要建立民主制度的人都在民主派之列。

錢：我認爲青年民主派的潛在力量蠻大的。經過文革，這一代人都認識到了我國的根本問題是制度問題。門戶開放之後，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對照一下自己的國家，更增添了責任感。對於建國前我國社會制度的分析，毛澤東稱它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其實是專制制度。建國後叫什麼制度？有人說是農業社會主義，有人說是封建社會主義，有人說是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多數青年人會認爲還是專制制度。封建專制也好，一黨專制也好，反正是專制。認識到專制的害處，就有對民主制度的嚮往。在座各位的父母，都是老共產黨員，都曾經有過美好的理想。但是，建國以來，我們的父母都被整過，有的還

四人幫已完全勢微。

坐了共產黨的牢房，甚至被整的含冤而死。從我們父母的親身經歷中，我們感覺到他們當初的理想並未實現，需要我們這一代來完成。我們要做什麼，就是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幹部子弟中，相當一部分人有民主要求。

蕭：「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北大學生選舉運動時，很多積極分子都是幹部子弟。

錢：當然，青年民主派中，幹部子弟可能僅佔少數，多數爲各行各業的青年，還有大批待業的青年。

王：可否概述一下青年民主派對當前改革派政策的評論。

錢：青年民主派基本上贊成改革，但覺得改得不够，應從制度上改，不但要改經濟、而且要改政治。

蕭：我看過中國之春雜誌曾發表過的一篇評論

華君武漫畫



江青：三突出嘛，怎么成了十突出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

，文章題目是「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意即肯定當前的改革、批評當前的改革，最終要超越當前的改革。這篇文章有一定道理。

王：如果按照你們的意見，在座的諸位，包括我，都被囊括在青年民主派之列。大家考慮過沒有，青年民主派的社會基礎在那裡？

錢：要講社會基礎，必須搞清兩個差別。第一個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差別。鄧小平主張包產到戶、主張開放、主張搞城鎮個體小企業，與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閉關自守、過度集中的工業政策形成了對照。凡是在鄧小平政策下獲得利益而又滿足於現狀的人，都可算做是鄧小平的社會基礎。青年民主派的社會基礎在哪裡？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搞清楚第二個差別，即青年民主派與鄧小平的差別。我們主張農民應擁有土地，農民可從國家購買土地及相互買賣土地。在工業方面，我們主張自由投資、自由雇工、自由貿易，主張保障私有財產及私有產權。這就與陳雲的「小鳥籠經濟」與鄧小平的「大鳥籠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第二個差別，就是青年民主派的希望，也構成了青年民主派的社會基礎。那些從鄧小平的政策獲得好處、而又不滿足於現狀、繼續要求往前走的人，必定會支持青年民主派，要求青年民主派代表他們的利益講話。這部分人包括下述幾種人士。

第一是農村的種田能手，他們要求有更多的地可種，要求能夠從國家、從其他農民那裡購得土地，要求土地的所有權，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從國家租借土地卅年。

第二是農民中的工商業能手，他們要求把土地賣出去，增加資本，更要求自由投資，繼續擴展他們的小手工業和小工商業。這就自然要求國家打破投資與雇員的限制。

第三是城市中想要繼續發展的小工商業者。現在有很多私人經營的裁縫店和小飯館，他們想要發展，必須要突破當前的政策，除非他們不想往前發展。還有，很多幹部子弟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公司，現在大都在發展階段，將來賺了錢怎麼辦？賺了錢不能投資怎麼辦？都吃喝玩樂了？都存起來？他們必然提出新的要求。

蕭：青年民主派的社會基礎還不只這些。那些在當前經濟改革中未有獲益、但可能在青年民主派的經濟政策上獲得好處的人，都會支持青年民主派。比如，當前大批城鎮待業青年無法找到工作，他們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家庭，什麼都沒有。他們絕對不支持鄧小平和胡耀邦。如果按着我們的主張，允許私人辦企業、辦工廠，就可以逐步解決這些失業青年的工作問題。這些人若了解青年民主派的主張，也會支持我們的。

王：關鍵是如何讓這些潛在性的社會基礎了解青年民主派的經濟主張，這是關鍵的關鍵。人家不了解，就不能支持你。官方爲什麼壟斷輿論、不實行新聞及出版自由？我看就是怕讓老百姓知道別的學說和主張。鄧小平佔了個最大的便宜，就是他的主張被毛澤東，四人幫批了好幾年。毛澤東和

四人幫做了鄧小平政策的義務宣傳員。人們了解了鄧小平的主張，才支持他復出。張：剛才蕭、錢二位分析的大都是潛在性社會基礎。

蕭：不僅僅是潛在性的，有些已是實實在在的。就算是潛在性的，也是不得了的力量。想當初，鄧小平未上台時，他的政策還未使農民獲益，就獲得了農民的支持。他就是靠這種潛在性的社會基礎東山再起的。我想該談一下青年民主派的軍隊基礎，誰能分析一下？

錢：我的哥哥和一位表哥都在軍隊任中級幹部。他們的思想和我們差不多。我表哥出國，對資本主義國家印象深刻。應該說，軍隊中也有一大批青年民主派。我自己也當過兵，「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時，很多年輕軍官都關心民主運動。

蕭：我想，青年民主派的政治主張，即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主要吸引的是知識份子，經濟主張可吸引工人、農民和失業青年。問題在於，青年民主派力量是分散的，如何獲得聚集力量的機會，是最困難的問題。鄧小平在經濟上放鬆、政治上收緊，就是懼怕青年民主派獲得聚集力量的機會。

張：鄧小平辭世之時，很可能出現機會。我剛才分析了他是平衡人物，他一辭世，權力的天平就要大幅度搖擺。他的辭世所遺留下的權力真空，各派政治勢力都要爭取填補，難免發生矛盾激化。在權力天平搖擺時，胡耀邦能站得穩嗎？胡耀邦的前途保得住嗎？（未完待續）

K字樓

北京市公安局第七處拘留所內幕

(香港) 滄 湛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間，我被中共某些要員戴上「現行反革命」及「反革命集團嫌疑首犯」的罪名，拋進了監獄。這座監獄被北京人俗稱為「K字樓」。中共建國初期，曾有兩個美國人因間諜案押在這座監獄裡，後來也曾著書講到，但西人的待遇在中國一直都是較

編者按
本期我們發表了兩篇反映監獄生活的文章。K字樓是中國大陸專制制度下的監獄，維多利亞監獄是香港英國殖民地的監獄。這兩所監獄有何差別？它們的差別是否反映了社會制度的不同？請讀者讀完這兩篇記實報導之後，自行判斷吧！



中國人自己要好許多的，即使是間諜，在坐監期間一樣可享受「禮儀之邦」的待遇，因此，這兩個美國人所描寫的，自然是這座監獄中較好的一面。
K字樓是北京公安局第七處的拘留所。有人會問：第七處是幹甚麼的，何以會有拘留所

呢？其實，第七處是審查處。一切刑事、政治案件、凡屬在北京市內發生的，其有關犯罪份子都可能會被關在這裡進行審查，這個過程在中國叫做初審，按照法律程序，審查後向檢察院起訴，然後由檢察院校實後向法院再起訴，最後由法院定案，判決。

K字樓位於北京城南，在永定門及陶然亭公園附近。從上往下看，此樓成一英文大寫字母K字形，臥在一個由灰磚砌成的高大圍城中。該樓也是由灰磚砌成，樓高三層。共分十二個通道。每一個通道有十間監房。另有一間廁所，一間洗臉間。樓外四周，種有楊樹、榆樹，其高與樓齊，估其樹齡當在三十年左右。

我被送進K字樓時，由於過多的激憤，頭腦處於極不平衡狀態，加之又是夜間（犯人們恐已入睡多時了），所以匆忙中不及細看，只覺得被拋在只容半人寬的木板床上。

天將破曉，我被從監房外傳來的喊聲震醒。其聲淒慘，似要撕碎長空。這時，睡在身邊的一個犯人冷冷地對我說：「該起床改造了。」

我問他：「是誰在喊，這麼慘？」

「聽慣了就好啦，天天如此，我們都當它是起床預備鈴。」他木然應道。

「他喊甚麼？」我並不死心的追問。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嫌我太多事，但終於告訴我：「天天只是一句話，小蘿蔔頭是怎麼死的？他以為自己是小蘿蔔頭呢。他媽的。」

（註：小蘿蔔頭是楊虎城將軍的私人秘書的孩子，後和楊虎城及自己的父母一起被殺死在重慶渣子洞監獄。）

正說話間，傳來陣陣毆門聲。大家好像被彈簧彈起一般，穿衣、疊被，從床下（其實只是離地一尺高的木板）拿出臉盆、肥皂等洗臉用具。其中一個犯人要拿大小便用的兩個塑料桶，等待看守來開門。

等前面房間的犯人洗完臉，輪到我們了。隊長（在K字樓裡叫看守是隊長）一開門，大家均以非常迅速的動作，靜而快地排着隊向通道盡頭的廁所或洗臉間走去（如果洗臉間有其

他監房的犯人則先去廁所）。通道內除了走路發出的刷刷聲和腳鏟拖在地上發出的嘩啦嘩啦聲響以外，一切都在靜靜地進行着。

上廁所，洗臉大約共三分鐘——五分鐘，然後回到房間自由活動。

回到房裡，大家都各自找一塊地方運動起來。例如：原地跑步、俯臥撐、擡手等，也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閉目養神的。（每個犯人所坐的位置就是晚上睡覺的地方，是依隊長的指定的，不可以任意調換）

直到此時，我才仔細觀察周圍的環境。此房約二十平方米大小，高約三米五左右。靠通道一面牆的中間有一個門（就是早晨出去洗臉時走過的門），門上有一個小窗，約半尺見方，向內鑲了一面鏡子，可供犯人們照鏡子用，對面牆有一扇窗戶，均上有鐵欄杆。進門左右兩邊是離地一尺高的木板通鋪，以給犯人睡覺用。兩個大小便用的塑料桶（原則上在監房內不許大便，只許小便，大便只能在早晚兩次放茅時去廁所解決）。因此，室內空氣頗差。門上還有一個喇叭，是給犯人們播的廣播及訓話時用的。

我正在觀察周圍的環境，突然聽到有人好像在跟我說話：「你是新來的？」

我回頭一看，是一個穿着一身舊軍裝的年青人在向我發問。「是的。」我簡單地答道。

「你是因為甚麼進來的？」他摸了摸刺光的頭（這時，我才注意到，房中其他犯人都光頭。）謹慎地四面看了看後問我。

「現行反革命。」

「哦。」他只是「哦」了一聲，就不再作聲了。

早飯是半個窩頭，幾根鹹菜，一碗玉米麵

粥。大家很快便結束了早餐。

吃完飯，那個向我問話的小伙子又走到我的身邊，向我介紹：「我叫屈鳴，是這個房裡的學習號。這地方是K字樓，除了秦城監獄，全國就是這裡最厲害的了。這裡關過許多名人，如：著名鋼琴家，葉劍英的女婿劉詩昆；著名芭蕾舞家白茹湘；短命外交部長姚登山……樓下除了單間以外（一個人一個房間），還關押了許多外國特務、間諜。四、五事件抓來的許多人，大多也是關在這裡。」

我問他：「你來了這裡多久了？」

「五年了。」他看了看窗外。「外面那棵大榆樹，發了五次芽，落了五次葉啦。」

「你甚麼時候可以出去？」我天真地問道。

「出去，談何容易，進了K字樓，想得自由，難了。我只是希望他們能快一點判我的刑，到了勞改場，還能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比五年都悶在這裡要舒服不知多少倍。」說完嘆了一口氣。一轉口又道：「兄弟，你應做個思想準備吧。」

我聽後，不禁呆住了，五年不出這裡，那不是太可怕了。這時，通道裡傳來隊長的吼聲：「開始學習！」

於是，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由屈鳴宣佈學習的內容。大家開始討論，屈鳴記錄。

大約上午十點左右，門被打開了，由一個犯人出去門口挽回一桶開水。大家爭先恐後地拿出自己的杯子，裝了水後坐回原處，繼續學習。

十二點左右，門被打開，由二個犯人出去，挽進一桶犯人午餐用的菜（白菜葉子，煮白水，撒一點鹽），另外一個籐筐，裡面放的是



金黃色的窩窩頭。由值班員負責分菜和分給每人一個窩窩頭（約四兩重）。

我因才進來，並不感到餓，也不想吃，於是順手給了身邊的一個犯人。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接着狼吞虎嚥。只一會兒功夫，就把兩個人的飯菜消滅了。看到他那個樣子，我覺得他太可憐了。

一個月後，我和這個房裡的十七個犯人都混得熟了，也知道了更多關於他們的事。因為知道清楚了，也更加謹慎小心地和他們相處。

有一次，一個強姦犯（他曾先後強姦了三十幾個少女、又和二十幾個少女、婦女通姦）用褲鉤在水泥地上磨刀片，被隊長抓住了，給他上了背手銬，以示懲罰。並且緊到最後一個齒輪。不一會兒，他兩手腫脹起來，大顆的汗珠從頭上滴了下來。但是，他一聲不吭，可謂是條硬漢。這樣一個人却是採花老手！

下午吃飯時，他叫我餵他，我因看他可憐，答應了。但是，我的這些舉動都被隊長看到了。

於是，我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這個滋味確實不好受。約過了半個小時，兩隻手腫脹的甚至看不見手銬，彷彿只是一條鐵鏈在兩手之間的肉溝相連接。疼痛穿心。但是，我却是一個愛面子的人，也強忍着不出聲。同號們看我如此情景，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事後，那個強姦犯對我說：「我真佩服你，沒想到讀書人有如此毅力，你知不知道，如果緊銬超過八小時，這兩隻手就會殘廢，只要你挺得住，隊長一定會鬆銬子，否則，他也會和我們一樣，嚐嚐這裡的滋味。好樣的，如果我被放出去，一定重重謝謝你。」可見此種人也有講良心的時候，只是一看到女色時，那良心却不知去了那裡！

K字樓裡的隊長們從來不把犯人當人看，他們認為，這裡的犯人都是流氓。無論甚麼案件都是一樣。所以，打罵犯人是經常的事。但是，有些犯人是怕他們的。

有一次放茅，隊長站在門口監視我們從廁所排隊向房裡走。突然，一個叫吳某的犯人，向隊長撲過去，雙手抄起隊長的雙腿一提，隊長仰面摔倒。不等隊長出聲，他就騎在隊長身上用手銬向隊長頭上砸去。直至其他隊長聽見

聲音跑過來，這場英勇搏鬥才告結束。當然，這個犯人難免被叫進一個房間，被幾個隊長當做拳靶子，大練一番拳擊了。但是，此種人是決不會屈服的，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展開襲擊，一直到隊長見到他面有難色，避而遠之為止。這種持久戰是犯人們反抗隊長暴力的最有效方法。但敢這樣做的人太少了。

凡遇到此種情況，我們全躲進房間，任由那個隊長被犯人暴打，因為，這是大家感到最痛快的時候。

為了消磨沒有自由的日子，犯人們想出了許多方法為自己消愁解悶。通常，吃完晚飯到晚上學習時有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自由活動。這時，大家會各展本領，盡情地娛樂，但往往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着。

打撲克是最受歡迎的娛樂。大陸的監獄是絕對不允許有這類東西存在的（勞改場除外）。犯人們用手紙（黃色的馬糞紙）裁成撲克牌大小，再將早餐的玉米麵粥存下來，將手紙一層層粘到一定的厚度。再在表面粘上寫口供用的白紙，畫上黑桃、梅花、紅桃、方塊等圖案，再寫上號碼，一副撲克算是完成了。通常圖案的工作都是由我來做。

在玩牌時，大家都擠在靠門的牆角，以防被隊長看見。另有一個犯人面對鏡子假裝整理頭髮，或用兩個衣服扣鈕拔胡鬚。這樣也可擋住隊長的視線。

另外，還有象棋。其製法是：用洗衣服用黃色肥皂做一方的棋子，後用紅色的衛生皂做字。再用紅色衛生皂做另一方的棋子，用黃色洗衣皂做字，棋盤製法與撲克牌一樣，只是面積大一些而已。

另外一些人沒有娛樂的興趣，就聊天、看



書（當然只是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等）。有時，犯人的家屬送東西來，偶爾也有一本字典。於是，這本字典成了寶貝。很多人（大多是政治犯）都背字典。

我學過日語，我家送來的是日本版的毛澤東選集。我根據自己的記憶，再參考毛著日文

版，編了一本日語教科書。也算我在K字樓留下的一個紀念吧。

星期天是不用進行思想改造的。大家可以自由活動，所謂自由活動也是在這個房間裏。照例，隊長會給一些針和綫，供大家拆洗棉衣，棉被等用。並有一段時間（約十至十五分鐘

左右）可到洗臉間洗洗衣服、被褥等。洗好的大件東西，由兩三個犯人拿到樓下去晒。其他人依然留在房內。

兩個星期可以寫一封信給家裏，所謂寫信並不是真的寫信，只是要東西。如：肥皂、牙膏、信紙、信封、衣服、鞋襪等，還可以要書。當然，隊長要審查過後，信才會寄出去。有時，你寫的信根本就沒有寄出去，被隊長扣留了。

星期天，是我們這些政治犯最活躍的一天。大家會談論一起互相關心的問題，或由老犯人介紹一下K字樓的所見所聞。當然，這些是不能被隊長知道的。因為監獄規定：犯人之間是不許互通案情的。

一天，門被打開，進來了一個蓬頭垢面，骨瘦如柴的人。看樣子是從其它房間轉來的。屈鳴告訴我，這個人在K字樓關押二十四年了。我問：「你怎麼知道的？」

「在K字樓呆得久了的犯人都知道他。」他說完，看了看大門，壓低聲音接着說：「他的罪名是特嫌。據說，因為找不到證據，影響又太大。所以，只好關着他。有一次，他問提審員：我的問題甚麼時候才能有結論？提審員這樣回答：等台灣解放了再開始審查你。」

我聽後問道：「如果他死了，台灣還沒有解放，那怎麼處理呢？」

「那就省事了，特務就是他的罪名。案件了結，又有面子。」屈鳴不加思索地說。

我聽後，不再作聲了。我知道他說的是事實。

過了一會兒，屈鳴又對我說：「告訴你吧，我原來是在其它房間，今年才調到這裏當學習號的。原來我住的那個房裡，有一個飛行員

，因和中學的兩個老同學在一起吃飯，喝多了一點酒，信口說道：甚麼時候，我駕飛機帶你們到外國去轉一轉。只此一句話，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我問：「甚麼罪名？」

「叛國嫌疑罪。」

「那也沒有理由判刑呀？」我忍不住地爭辯起來。

「另一個更可笑，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學雷鋒。有一次，這個人到王府井兒童商店買東西，向外走時，看見一個外國老太太抱着一大堆東西往自己的轎車走去。半路中掉了一個小孩用的鞋子，他想到雷鋒的拾金不昧，就檢起來放在那老太太的車裏，老太太看見了，向他微笑、點頭，並說了一句法語，可能是謝謝他的意思，於是開車走了。這個人很高興，剛想轉身回家。誰知一只手在他後面拍了拍，他回頭一看，是一個便衣警察。於是，他被帶到K字樓關了五年，進行審查。提審員這樣解釋，誰知你有沒有放情報在那只鞋子裏面。這是做好事的结果。因為毛主席沒有讓你把雷鋒精神用在外國人身上嘛。」

我聽後，感到又可氣又好笑。

一天傍晚，大家剛剛吃完晚飯，正在玩撲克、下象棋、聊天。忽然，門被打開了。隊長把站在鏡子面前放崗風的那個犯人拉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只見這個犯人只穿了一條短褲，全身的衣服都被扒光了。另用一件橡皮製的如女人穿的游泳衣似的衣服穿在他身上。然後用氣筒向這個橡皮衣打氣。一會兒，這件衣服像皮球一樣鼓了起來。

只見這個犯人的臉色，由紅到紫，一會兒，就變的慘白，並且躬着身子，慢慢地就昏倒

了。隊長這才停止了打氣，轉過身來對我們說：「這撲克牌，象棋是誰做的？」然後，又對屈鳴說：「你是學習號，發生了這樣大的事，你都不知道嗎？」

屈鳴無話可說。這時我要站起來承認。屈鳴悄悄地拉了我的衣襟，暗示我不要出聲。隊長吼道：「屈鳴，出來！」

屈鳴被叫了出去，我知道大禍將要臨頭，對號裏的犯人們說：「學習號被叫走了，這次相當麻煩，我們應該找幾個人來擔當責任，以免大家都受苦。」我又指了指倒在地的那個人：「如果大家都穿上和平衣（當這種橡皮製泳裝是雙層的，穿在身上，一打氣進去，人會被悶的上不來氣，隨着進氣的增加，穿衣者一定昏倒，體質弱者可能隨時會死。）可不是開玩笑的。我算一個，如果隊長找大家問話，就說是我做的。」

這時，那個強姦犯反對道：「不行，你如果穿上和平衣，肯定活不了。他媽的，老子擔當。我倒想嘗嘗和平衣的滋味。」

大家正在說話時，隊長又把門打開了，屈鳴被推了進來。當然，手銬和他結了緣。隊長罵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政府信任你（隊長在犯人面前每認為是政府的化身），讓你當學習號，帶領大家改造思想，你却他媽的胡鬧，好好想想。」

這次大禍被屈鳴一個人承擔了下來，真是不容易。大家都非常感激他。否則也許會使全部犯人都要受到懲罰。

但是，犯人往往是容易健忘的。雖然，經過這件事，表面上平靜了許多日子，過了沒有多久，這種公開化的騷動又再度發生，且比以前更為厲害，更為巧妙。

一天上午，大家手裏拿着毛澤東著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隊長從外面看進來，好像我們在學習——認真地改造思想。其實，大家都在專心聽一個同號講「基度山恩仇記」。這部書在大陸非常流行，更何況那些流氓、小偷們平時是不看書的。聽這部不朽的世界名著總比看毛澤東著作要舒服多了。這種講故事的主角，往往是政治犯擔任。故事講了一半，大門忽然打開了，我們開始以為又被隊長發現了，大家都現出緊張的神情，但誰知道，隊長站在門口說道：「放風了。」

大家聽說是「放風」，頓時高興的不得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監獄規定，每天都要放風的。但是，文革以後，不知由那位當權者破壞了這個規定。放風有時一天一次，有時連續兩三天；有時一個月兩個月才放一次，完全由監獄主管們自己決定。

大家排好隊，按照隊長的指示走出K字樓。K字樓的四面有用紅色磚頭砌成的起碼兩個人高的圍牆的風場，大小不同。有的二十平方米大小，有的四十平方米大小。牆頭上有崗亭和一味寬的路，供隊長在上面監視犯人們用。進入風場，犯人們則圍好一個圈，向一個方向跑步或走路，由隊長下令來決定。紅磚牆上經常可以看見其它監房犯人用自製小刀或釘子（有些是在進風場的的路上檢到的）刻上去的字。一般都寫外號。如：小三，我在六通九號房，我甚麼都沒說。老大寫。原來，這些紅牆也是犯人們互通風的一個好工具。有許多消息是由這裡傳出去的。

每次放風的時間大約在十五分鐘——三十分鐘不等。有些犯人經常這樣形容：放風、放茅時間的長短要看隊長今天的情緒，如果隊長的

老爹罵了他，他會來這裏拿我們出氣，如果隊長有了喜事，我們的時間就會被放寬一點。

最使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每次放風，幾乎都可以聽到其他監房（不清楚是那一間監房）的一個犯人，在K字樓走向風場的路上，振臂高呼一句毛澤東的名言：「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個多數也是政治犯，否則就是神經病。

當時的K字樓關押了許多精神病患者，而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因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而被不客氣地請來的。我們房裏的精神病患連自己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了，經常將大小便拉在床上而遭犯人們的毒打。而他也只是對這種虐待報以呵呵一笑而算啦。屈鳴告訴我，他是因撕大字報拿來當廢紙賣錢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我聽後也只能淡然一笑。

K字樓裏經常流傳許多傳說。是用甚麼方法進行傳播，我至今也不知道（因我才坐了十三個月的監獄，比起那些十年、二十年的「前輩」來說是太短了。）其中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甘肅日報副總編輯某××，是個才子。文革期間，他却糊塗地為蘇聯的托洛斯基翻案的萬言書中簽名，準備聯名給中央上書。結果被抓進了K字樓。在提審時，他以自己雄辯的口才，大發高論，搞得提審員多次啞口無言，下不了台，最後，提審員請示了有關部門後，拿出了絕密資料給他看，他才目瞪口呆，不再發揮他的才幹了。由此，我個人認為：政治同資本一樣，是非常骯髒的東西。這位甘肅日報副總編輯也由於這次的魯莽而毀掉了自己一生的前途，雖然他有過光輝的一頁。

K字樓的一樓，有一部份是關押外國特務、間諜的。這些外國人要比中國人的待遇好很

毛澤東說，要把「反革命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多。每天可以得到十枝香烟，並有音樂給他們聽。儘管外國人一再抗議，不願聽中國現代的芭蕾舞樂曲，如：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但也無濟於事。因為，喇叭的開關是控制在隊長手裏，放這些音樂是他的例行公事。

監獄的生活是難熬的，但是也是令人難忘的。我多少次想從腦海中將這段不平凡的苦難日子趕跑，但是，它好像刻在我的腦海裏，並時時映現在我的面前。

在一個講文明的國家裏，破壞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是應該予以堅決的鎮壓。但決不能容許某些當權者，不按照法律和程序，隨便判定一個公民的罪狀。據說：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中被抓進的人，有二十多個被從北京秘密押往上海，然後再秘密槍斃了。如果這是真實的話，那麼，這二十多人的生命又復如何交待呢？

最令人不能容忍之一點，即許多人在被捕後，其家人、親屬根本不知此人去了那裏，公安部門不予通知。我本人也是在進了K字樓二個月後，家人才知道的。有些人的家人根本從頭至終都不知道，甚至到派出所去報失，派出所是知道的，所以不告訴其家人也是奉命行事而已。

最可怕的是，在中國的監獄裏還具備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世界最先進的刑具。據說有許多刑具是來自美國、蘇聯的設計。中國著名民主人仕張東蓀先生就是在秦城監獄中，在八十八歲的高齡時受電刑後，而死在醫院的。這位張先生不但是一九四九年北京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更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世界哲學界有着重要的影響，曾被世界哲學界譽為：中國唯心主義的總代表。目前，香港新亞研究所的牟宗三教授就是張先生的得意高徒。像這樣一位文人、學者，而且是對共產黨有功的人，只是因為學術上的觀點不同，又因為張先生與前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的私人友誼很好而被扣上了「美帝國主義的潛伏特務及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罪名而死於共產黨的電刑之下，豈不令人震驚。

在這裏，我想引用一段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一位大獨裁者拿破崙的話來做為這篇文章的結語。他說道：「用不榮譽的鞭撻方法使人吐露秘密必須終止。用這個方法拷問人民的唯一結果，是使可憐的不幸者說出任何他們以為可取悅拷問他們的人的話。我禁止使用類似的合人道和理性的手段。」（引自：德國作家盧德威 EMLIL LUDWIG 著「拿破崙全傳」八十頁。）

被捕「偷渡客」的

獄中生活

(香港)晨星明

——記香港關押非法入境者的維多利亞監獄

一、越獄事件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晚九時，位於香港中區的維多利亞監獄警鈴大震，全獄值班獄警和預班獄警聞警緊急行動。喊聲、警鈴聲、跑步聲和無線電話機中的命令聲交匯一片，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都在盲目慌亂地追究剛才發出一聲巨響的原委。

兩分鐘前，值更警官聽到伍號監倉樓附近發出了一聲巨響，像放炮，也許是犯人推倒了窗牆，也許是一聲近雷，因為當時正在下雨。突然一個獄警從樓房與圍牆的夾道裡喊：「來人呀！有人越獄！」

透過濛濛細雨，只見從高高的五層樓頂垂下的一條繩子上，蕩着一條人影，正在向鑲滿玻璃柱和鐵絲網的高牆頭蕩去。

「包圍圍牆！」值班中尉向獄警們下達命令。

伍號倉樓關押着一百多名被拘留犯人和幾十名服刑犯人。這些非法入境者中，各種「高

手」都有，……有來自大陸的逃犯；在港打劫的匪徒；東南亞的販毒客；週遊世界的詐騙犯；還有經歷過越南、兩伊戰火的軍人；更有身份不明的各種「啞巴」、「傻子」和「神經病者」……

倉房內的情況一時不明，不知有多少人參與了越獄行動，也不知他們有否暴力準備。值班警官一方面用 CALL 機報告了懲教處長官××少校和兩個上尉；一方面向位於前院的警察總部求援。

警察總部配合包圍了伍號獄樓和整個維多利亞監獄，香港地區的值班警察都收到了警報訊號。在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一批手持警棒的便衣警員衝進了五號倉樓，把所有聚集在走廊上的犯人趕回了牢房，很快，一切都平靜了。

外邊繩子上懸着的犯人被抓了下來，樓外傳來了那名獄號為二四八三號犯人的慘叫聲。清查很快結束了，除了二四八三號犯人之外，沒有任何人缺少，也就是說這次越獄又未

成功。

據老犯人說：幾個月前，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雜技演員，竟然在大白天跳攀高牆而去，然而……

一百多年來，維多利亞監獄雖然發生過無數次越獄行動，然而很少有成功者，而防範的措施却隨着越獄行動的增多而越來越周全，不但圍牆加高了三次，連下水道內也加了防通鐵筋和蓋鎖。而這次行動，又導致了老式瓦頂倉樓的被廢用，犯人轉入了全鋼筋水泥的新牢倉。

二、越獄犯

越獄犯人經查是一名來自中國廣州的二十三歲的青年，因涉嫌在港犯罪被警方拘留，羈押於維多利亞監獄。他在入獄後，因害怕警方查出他以前所犯的罪情以及在大陸留下的積案，因而串連了幾個「朋友」，暗暗謀劃越獄。維多利亞監獄的牢樓，是一百多年前建造

的老式瓦頂起脊式建築。在最高層關押的犯人
可以打破瓦頂，掏洞上樓，而後用被單結成長
繩從空中蕩向五米開外的圍牆，把隨身攜帶的
毛毯丟在牆頭藜荏上，跳牆即可逃出。這條途
徑不知有多少人想到過了，從高層牢倉的每一
個屋間頂上被打斷打裂的瓦縫來看，就可想而知。

二四八三號及「同伙」在幾天中做好了準
備，他們擰斷浴室一段鋼筋水管在廿二號房（
二四八三號犯人所在的牢倉）打好了洞，收集
了十條被單並用水濕了一條毛毯，萬事俱備，
只缺一個下雨的天氣，到那時他們就會一個個
魚貫而出。第二天懲教處就會發現有十幾名甚
至幾十名犯人不翼而飛……。

九月十八日，天賜良機。不但有雨，偶然
間還響一兩聲沉雷，犯人們都在洗澡、扯家常
，而懲教處警員也正在忙於交班。二四八三號
攀上了樓頂，他一方面緊張地向腰間繫「繩子
」，一方面向牆外觀察着……：香港夜生活
剛剛開始，車燈如水，高樓如林，夜總會的光
虹燈在閃爍着，看來他們馬上就能滴入自由世
界的海洋啦……。

就在他剛剛踏上屋檐的兩槽瓦時，一連七
米長的兩檐瓦因支撐架年久失修而凌空被踩塌
了，「嘩——！」的一聲巨響……。
……：審訊持續至半夜，二四八三號始終
咬定說是他一個人幹的，盡管滿臉血跡的被拉
入了牢倉認人，但他沒有供出同伙。好小子！
有義氣！

三、男犯與女犯

犯人們大多數都急於逃出，因為風聞大陸

最近又在濫殺刑事罪犯，許多人都是在大陸犯
案逃出的。近幾天又傳聞北京政府的三人小組
將到港視事，這地方必不可少要的「光顧」一
番。

每到「放風」時間，犯人們都集中在小廣
場上談天，許多人在互相研究探討逃跑的辦法
，有主張暴動搶鑰匙的，有主張搶那架合金梯
翻牆的，有人說可以打昏獄警，用制服冒充警
員外出，還有人說可以裡應外合拋繩子進來爬
出去……。

「……：你們說的那些都不可能，除了有
直升飛機配合……：這裡邊什麼樣的犯人沒關
過？當年孫中山先生也曾關在這兒！想逃跑的
人何止一個兩個？……：」一個被大伙命名為
「間諜」的中年犯人說。

的確，這裡邊「人材濟濟」，有一個「啞
巴」，進來七個多月了，會識英文、中文、日
文、越文等等多種文字，年紀輕輕的就留下了
幾寸長的鬍鬚，雖然日日啞口無聲，但目光炯
炯，據同室人講，偶然可以聽到他在夜間說夢
話，誰也搞不清楚他的國籍。

白天，所有的被拘留犯人集中在一間大廳
中，看電視、下象棋、談天……：除了這些
活動之外，在大廳西北角的一塊空走廊上，常
有一個小小的「貿易會」。犯人們是不准帶錢
進來的，這在入獄前已經被搜查得一乾二淨。
但獄中有自己的「貨幣」——香烟。香港政府
每天發給一名犯人三支香烟，雖然質量是很差
的，但在獄中却算是寶貴。對於那些聲稱「飯
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的「烟鬼」來說，三
支烟根本無法渡日，更何況那些年紀在二十歲
以下的「小烟鬼」們，根本沒有資格領取這份
「照顧」。因此，香烟就成了獄中公認的流通

貨幣。現將香烟與「貿易會」上經常流通的幾
種商品的比值公佈一下：

橙子一個——兩支香烟

維多利鹹魚一條——兩支香烟

油煎雞蛋一個——三支香烟

維多利小麪包一片——一支香烟

美國「蘋果牌」牛仔褲一條（新）——三

包；（舊）——兩包

電子手錶一隻——兩包

名牌機械錶一隻——四包香烟

至於隨身可以攜帶的各種金筆、戒指，以
及允許親友送入的各種食品、衣着，均可加入
流通。有幾個不抽烟的越南難民，專門讓外邊
的朋友送香烟進來，而後交易成爲值錢的貴重
物品。每有一些有身份的人進來，這幾個老「
商販」便圍攏上前，喧寒問暖、而兩眼不住地
打量 and 估價來人所佩帶的鍊、鐲之類……。
枯燥的男性群體生活，對女人格外感興趣
。平時只能彼此打渾罵情，說一些有關女人與
性方面的趣話，但每當有女犯經過放風廣場時
，男犯人便不約而同地觀賞「春光」，一直目
送到看不見爲止。

「往哪裡看？」值班警官常常半真不假地
喝一聲這些「掃瞄雷達」們以示玩笑。
女人走了，男犯們還在品頭論足，……：

香港有大批非法入境難民。





香港在默默變質嗎？

獄中的懲教處長官非常負責，他每天都要親口嚐一遍犯人的飯菜並留下意見（但他從來沒有嚐過早餐中的醬豬肚和醬牛肉，也許是顧慮一大塊肉嚐一口成本太高。但恰恰是這兩樣東西「牢不可破」，每逢早餐就看到青年人牙撕手扯地吃牛肉，常常弄得手臉油膩膩的，真是「吃魚不多，腥氣不少」，至於老年人只好不忍而棄。）

懲教處最高長官每日幾次巡視在遊藝室和廣場上活動的犯人，有意見可隨時提出。香港是個法治的地區，一切都必須依照法律行事，但獄警也常有罵人之例。有一次一名「太平紳士」臨獄視察，一名挨打住院的「大陸仔」當場向「太平紳士」檢訴他挨打的事，太平紳

士詢問了懲教處最高長官，那名長官答應立即查清懲辦。但這種事通常都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初入獄的人不了解獄中的「集團劃分」是常常要吃虧的，表面上看大家全在一個大廳裡活動，但這裡邊却有着層次極為分明的「集團」，「越南幫」、「台灣幫」、「大陸幫」、「外籍幫」等等，而越南幫中又分有「南越幫」和「北越幫」，大陸幫中又分有「廣州幫」、「潮州幫」、「福建幫」和「北方幫」。每一個幫團都有固定的幾張桌椅做為領地，因此一些初來乍到的人不知裡表，常常誤入別人的領地，不是遭了刮臉就是當場撞走，人類的獸性在這裡得以明顯的再現，為了一條鹹魚、一支香烟或一個座位，常常可以爆發群體之間的衝突。有幾次「戰爭」都是在「中越」集團之間進行的，真是「外邊打大仗，監獄裡打小仗」。越南人數量雖少，但甚為「抱團」，而中國人雖多，但各個幫派彼此牽制，一個集團與越人衝突，其他集團則不聞不問，致使華人集團個個「畏越人三分」。這裡面不知是否顯露了我們民族的一些劣根性。偌大一個中華，彼此以仇相見，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眼睜睜地看着別人個個強盛起來，唉……

六、香港在默默變質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的國家願意接納難民入境了，除了有產者和知識份子，其他百姓難民大多無路可走。

大陸來的「偷渡客」是不能叫做難民的。因為北京方面在聯合國難民組織中宣稱「中國從沒有難民問題」，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

和其他成員國一同宣稱自己還可以接納難民。隨着越南難民的遞增，港府無法負擔如此之多，只好決定將其中一部份送往大陸。然而，這些越南難民人多不願意到他們那個「同志加兄弟」的地方去謀生。有一次，十幾名因颶風而被英輪救往香港的越南難民為了抗議港府要強送他們去大陸而集體絕食，但他們的請求沒有被批准，三天之後，港府拒絕了他們要召見新聞記者的要求，並把他們分押在小牢房中進行了分化瓦解，聽說最後還是送往中國大陸去了。

有人擔心地認為，香港現在在每年外流有產者與知識份子五千至八千名，而非非法入境的難民與失業游民達三萬名，這種狀況在默默地改變着香港的人口成份。特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加劇人口非法流入。而不特赦非法入境者，那麼香港社會的犯罪率將難於從根本上降下來，無論增添多少警察。

警方驚呼，最近「蛇頭」集團和偽造身份證的行業大增，而且犯罪手段和犯罪工具都趨於現代化，不但有高速汽艇、電腦之類，並有手槍之類武器配備。據一些關在獄中的「蛇頭」講，他們與香港水警、海關的一些人士俱有密切關係。而關在獄中的「偷渡客」們，更是詳盡地交流了五花八門的偷渡方法和取得非法身份證、假護照的途徑。經過了這所非法入境的「大學校」，那些「偷渡客」更加有信心殺回香港，他們宣稱：「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我們一定要回來佔領它！」

……維多利亞監獄，高牆閉壘，近百年來日日不變地吞進吐出各種膚色的「偷渡客」，不知道十二年之後它還會是這個樣子嗎？……

中國民運的客觀基礎及應有的主觀努力之我見

(加拿大) 董今狐

最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附近推銷「中國之春」，它的銷路在短期內直線上升。顯示這雜誌和它代表的中國民聯及中國民運本身，實在受到許多華人的歡迎。當然，我答應推銷「中國之春」的本身，也表示我對它的歡迎。

我是個有三十年黨齡的國民黨員，七十年代初期前後，還曾追隨在台黨中央的領導和海外文革份子周旋。七九—八〇年之後，我因為不能同意三不通和永不接觸的政策，沒有再積極活動，雖然我自認還是國民黨員，還相信三民主義。我的許多朋友，似乎都在委婉地「開導」我，但我愛朋友，更愛道德責任，因此也委婉地堅持我的立場。在他們看來，我是個桀傲不馴的壞蛋。厚道一點的至多解釋可能是年紀大了，腦筋退化的結果，有時還會罵一聲「依老賣老」。但是，我對「中國之春」的青年朋友的請託，却在無一面之識的情形下一口答應，連自己都不免覺得奇怪，莫非這就是魯迅所謂的「俯首甘為孺子牛」麼？！

如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我個人對中國民運乃至「中國之春」的執着，可能也是僑社喜歡「中國之春」的理由，而其原因，在於對下列客觀事實的認識：

一、近代中國的民主，一直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雖然有人懷疑中國民智未開，未必可以立即實行民主，但對這一歷史方向，却少有

人反對。

二、中國民運的最大挫折，在一九二四年國共兩黨共同採取「民主集中」制之後，時至今日，「集中」已使人民、黨員、領袖和國家共同受害達數十年，多數人都厭棄「集中」，希望「還我民主」。

三、中外古今的歷史證明，民主雖然在不同程度的民智、傳統、官僚制度等條件下都會成功，却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大致對等的政治勢力的存在。從一九一一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後，民主體制先後受帝制、軍閥、及國共兩黨的獨裁的騷擾，其共同原因在於當時都只有一個獨大的政黨。但是現在，國共對峙卅餘年，眼看都沒有能力（恐怕人民也不允許）併吞對方，在這個縫隙之間，民主的歷史潮流必然從中湧出，而香港的九七問題，可能正好提供良好開始的起點。

其實，許多客觀條件，至少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明顯。一九七二年在明報月刊出現的拙稿「給國家留一面鏡子」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另稿「從加京看僑情及國共和解」，便曾分別介紹「有人提出國共兩方及中立人士合組籌備會，籌辦全國大選」的建議，認為「目前，到了全民政府的時機」，在那前後，許冠三先生等作者在明報月刊等書報刊物中發表了更精闢的見解。

然而，即使是海外的刊物，似乎都常受到

有力者的左右。就明報月刊而言，文革過後不久，發行人金庸先生去北京、台北先後見到鄧小平、蔣經國兩位先生之後；接着主編胡菊人先生離開「明月」（為何離開？不便臆測）。像許冠三先生的「皇權、黨權、民權」一類的鴻文，便被「實事求是」及「風花雪月」的學術及性情文章所取代。很像是國共兩黨的民主「集中」，已經以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戰手法，直接間接地控制了海外僑社的輿論。所以，在過去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中，「輿論」似乎顯示中國人已經失去對民主的認同和能力，使像我這樣不自量力想要獻身「中國民主統一，世界和平繁榮」的人覺得氣餒和無奈。

但是，中國走向民主這一必然的歷史潮流，恐怕不是人力所能轉移的，左右的勢力也許延遲了民主的步伐。然而人們對「中國之春」的歡迎，顯示中國民主的命脈不絕如縷。

不過，「中國之春」至少目前也許不是中國民主應有的完全面貌，它的許多作者，有過太多的民主「集中」的權術經驗，他們的民主觀念中，不免有「集中」的陰影，他們會在策略上過度重視內部運作等權宜，因此造成第二代「民主集中」團體的不良後果。

另外，他們也會受到各種方式的經濟誘惑或壓力，王炳章老弟在護照困擾下也許不至於英雄氣短；但是，多少人能夠長久不受個人或家庭的生活壓力？尤其在海外獨立的生活還是

頗難支撐的，堅持原則也可能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萬一他們的團體要散、要失敗，我們不必驚奇而且還當諒解。

不過，從他們的表現看，他們的志氣和學養都像足以不斷自求精進、足以擔當民族使命的重大責任，只要他們認定並堅持民運的原則

——民主，我們就當馨香禱祝，也大可拭目以待、努力參與，這應該是我們共同主觀努力的方向。（八四年九月廿日於加拿大）

不要「大民主」要真民主

（大陸新移民）嚴 璜

報載北京徹底否定大民主，評論員文章指出：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為特徵的大民主，在新中國憲法上早已取消。還說這是四人幫在文革時，在鬪走資派、反官僚主義的幌子下鼓吹的大民主。又說取消大民主，依靠社會主義法制，以保證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按其大意看起來，這「大民主」好像是四人幫的遺毒。

這位評論員，要麼是一個初出茅廬、不學無術的小伙子；要麼就是一個老得患了健忘症的老學究；再不就是一個隱蔽的四人幫分子，玩他棄車保帥的文字遊戲。

如果是一個神經健全，而又經歷過或注意過大陸這三十多年政治變動的人，他必然會知道：所謂「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統稱）是早於四人幫面世之前，即一九五七年，毛老先生在大要陽謀時的發明創造。也正是由於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廣，當年大陸

各級機關單位，甚至會限時、限額地要求屬下職工，每天減工時或停工來進行「四大」。

後來四人幫在文革時運用「四大」，也是經毛老先生御准的。

「四大」這一種特殊的手段，在文革時，的確也在民間起過一點揭露官僚主義的作用；但絕大部分則是造謠惑眾，以達到打倒政敵和誣害忠良為目的。

從千萬萬件事實中挑選其較突出的一例：有一回，全國城鄉、各族各階層利用「四大」大力宣揚「毛主席去安源」的歷史事件，其實質却是藉此宣判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現在，劉少奇已獲得平反，足見當年的這個「四大」是何等的荒謬和無恥！（可是，在為劉少奇平反時，却不見有人追究這一筆賬）。

「四大」式的大民主，的確是任何要安定團結的社會所不能容許的無政府主義的表現。今天大陸為了預防四人幫餘孽借此興風作浪，

嚴加禁止是必要的。

但是，為什麼這一種唯恐天下不亂的手段能在大陸這個特定的社會出現和濫觴呢？毛老先生當年的威信使其黨徒和人民不能不順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也有以致之。

人民長期有意見不能說，更沒有報紙、刊物讓他們發表，所以既然統治者說容許他們如此做，那天真的、膽大的，便真正「四大」出他們經過獨立思考的心裡話。（後來全都中了陽謀）。而更多數的群眾在「四大」中則是人云亦云，被利用了而不自知，還以為參加了革命行動，行使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而得意洋洋。

悲乎哉，渴望民主的中國人民。且看今後社會主義法制是否真正能夠給你們提供切實的保證吧！



廿一世紀的中國

——何去何從？

(台灣) 張望

十九世紀末年，西方殖民主義向世界各處蔓延，傳統的中國社會也在此時遭逢波濤洶湧之西方文明侵襲，致使整個中國起了震撼。生於斯時之中國人突然接觸到了迥然不同之西方文明，由於其思想、觀點均與農業時代之中國大不相同，因此，當時中國所承受的非祇西方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已，其所引發的文化影響尤其深遠。蓋因軍事、政治上的影響至多不過一、二百年，但文化之衝擊却屬千百年之大事。時至今日，中國仍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中摸索、尋覓出路。而在此大時代中成長的億萬同胞，也仍於茫茫蒼海中等待著指引迷津的燈塔，重亮光明！

一世紀的動盪，導致炎黃世胄飄零四海，他們緬懷故土之鄉愁，隨著歲月之消逝，有增

無減。風塵僕僕的老人也永遠掩飾不了胸中之激情！曾幾何時，李小龍之拳腳功夫風靡世界，打出了中華民族僅存的尊嚴，然而隱藏於此脆弱尊嚴之後，却又是那麼淒涼的無奈！想我悠悠中華，至今除了武術外竟拿不出東西為民族爭輝，所能引以為榮的東西，亦儘為古人所遺留，這個時代對歷史的貢獻竟交了白卷，百年來所得到的祇有衰敗和動亂，致使憂國之士痛心！

自清末年間，論中國前途之議題不下千萬，但終不出「本位乎」？「西化乎」？和「俄化乎」？至今猶然！毛澤東在六十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但是數十年來，中國在共產制度一意孤行下，社會問題暴起，國家日趨貧瘠，民不遘生，為錦

繡山河平添一份陰影。現在鄧小平復起，為進行整黨運動，喊出徹底否定文革之口號，但在否定文革後，鄧氏並未能提出一份具體的建國方案，反之，中國大陸有可能再歷經一次假否定文革之美名的血腥權力鬭爭！在此同時，亦有許多中國各地領導階層表示中國必需採納資本主義中的若干重點為發展方針，也有人謂中國必需要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但不論如何，各種建議似都指出中國之前途應以採納西化為目標（社會主義源自英國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資本主義以 ADAM SMITH 的 WEALTH OF NATION 為典範）。目前之中國則正徘徊於各家理論之間，在近乎百年之動亂循環下，吾人似又回到原來的問題，本位乎？西化乎？俄化乎？！

正當中國前途問題處於徬徨無際之緣，筆

者欣見中國民主聯盟運動之興起，此一運動似為中國的前途注入了新血，更使久對國事抱失望者，重拾關懷之情。然筆者對中國民主聯盟運動未來之發展也至為關心，盼能於此對「民主」一詞略作闡釋。當前許多人直覺的看法認為西方制度即代表民主，社會和共產主義即和

當代中國不僅要有勇奪金牌的青年，同時也要有為中國走向民主探索道路的青年。圖為中國民聯青年正在進行奧運期間的民運活動。



不民主有關，此乃極其錯誤的觀點，誠然，目前確有許多社會、共產主義國家淪入極權專政，但同樣的，也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却是非常民主，蓋此二者不可一統而論。實際上，「民主」這一詞令與意識型態是兩回事，民主的基礎乃是在執政者對憲法的尊從，和憲法所給予國民的權益，譬如美、日等國的憲法不一，然因其政府對憲法之尊從，致使其人民享有極高的民主權益。反之，菲律賓也是一個以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為治國宗旨的國家，但因其政府蔑視憲法，使其成為非常不民主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瑞典和蘇俄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同為社會主義的行列，但由於二國執政者對憲法的尊從不一，使其民主程度之差異，有天壤之別！

有了以上之體認後，筆者就想就中國前途而分析。中國民主聯盟運動之領導人即稟著為中國人民牟取民主、民權而奮鬥，亦即表示此一運動乃是在追求執政者對憲法之尊從，和為國人爭取憲法所應給予國民之權益。這種為民立命的崇高理想正是當代青年所應承當的使命。然除此外，歷史給予了當代中國青年另一重大使命，那就是為苦難的中國重覓新方向！未來的民主、民權憲法須在何種思想下實施於中國，而這新的思想是否最能配合中國的國情和民願，將中國導入燦爛光明之前途，乃是當前最迫切之課題！

今日吾人對這種思想有個新名詞，即所謂「意識型態」，亦有人謂之為「主義」，不過筆者對後者有些意見。意識型態乃是社會價值的意識在經過整體細緻的規劃後成為社會思想的型態，簡單地說就是社會價值觀。而主義却是一種存在於社會型態下的理論，也就是說一個

社會有了某種思想型態後，就會因其而引起各種適合此型態的理論（主義），而為政者為求國家富強，就須辨別何種理論最能符合當時之社會型態和價值觀，而採用之！以目前的中國大陸而言，意識型態和社會理論兩方面都有必要加強研究。

中國自周公制禮迄今，就一直以社會倫理為傳統的價值觀，從朝廷中的君臣體制至家族中的長幼秩序皆是源出倫理觀念。但現在，舉世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各國幾乎都開始本著以金錢為本位的利益價值觀，資本主義近世之所以能受到舉世之重視，也是因其在眾多理論中最能符合利益價值觀（INTEREST VALUE）。當然，也有些理論反對資本主義，但因他們皆欠缺具體的構想，和無法塑造出本身的價值觀而難以蔚成氣候！譬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不滿資本家之壟斷後進行改革，但社會主義者僅改善了社會福利制度，根本上仍以社會的利益價值觀為其思想中心。再看共產主義，持此論者，欲徹底否定金錢價值觀，故一切國有化和配額制，但因其無法建立新的價值觀，因此在國家的生產力和對外貿易時仍採用以利益價值為衡量的標準。其國民在看到此種思想中空和矛盾情形時，因無思想上的替代，自己本身的思想也變得非常空虛與矛盾，導致事事皆以現實為主，是引發中國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之一！

東西文化在這大時代中相逢，造成了許多人之茫然思想和價值觀念之不同，使人衡量事情的標準不一，當然吾人很難武斷的批評孰是孰非，但很明顯的其已對中國有了巨大之影響，未來若要中國興盛，這時代裡之青年必須自勉為思想家，為中國開創非凡之事業；重振民族之尊嚴！

中國科學界

不科學的「鑒定會」

(中國大陸留加研究生)劉田剛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科技界，常有一些叫人聽了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的新鮮事兒，科技界的「成果鑒定會」就是一例，報上常看到某某科研成果又「通過了鑒定」。比如前些天才見報的上海某研究所發現了新的腫瘤基因，這一成果「通過了鑒定」，也就是說，上下左右都承認了、鐵定了。海外學人們對這種鑒定會大多迷惑不解，因為這是中國的「特產」。西方科學界雖然活躍，對研究成果的爭論、肯定、否定，活動頻繁，卻從未聽到過這個新名詞兒。科研成果幹嘛要通過「鑒定」？怎麼個「鑒定法」兒？

作為過來人，我常為此頗費口舌，現在寫下來，好讓更多的人明白其中究竟。

在我原來工作的那個電子研究所裡，每年總有那麼三五次鑒定會。一個課題做完了，或者初有結果，就向上頭打報告，說是成果出來啦，需要「鑒定」。要來一筆錢，到賓館訂下房間，然後寫一些邀請書，蓋上單位的公章，敬請對口單位、關係戶、本行的頭面人物，還有行政領導、科委代表「光臨指導」。訂好一個日子，然後坐下來「鑒定」。「鑒定會」一般是兩三天，頭天上午先是各位代表閱讀要鑒定的論文（剛剛發到手上），然後下午聽作者講解。第二天，再進行討論；大家「提意見」，有時也看看實物，參觀一下試驗設備。到第二天下午，由主持人綜合大家的發言，寫成一個「鑒定會結論」，內容包括該題目的創造性、價值、將來應用前景、還要改進的方面等等，然後再拿到會上宣讀一遍，如無意見，就此通過，於是每個參加者代表原單位簽名立案。這樣，××省科委，××大學和科學院××研究所的鼎鼎大名就赫然紙上（如果留意的話，

可以發現有些產品的廣告上都把這些單位的大名列在前頭）。最後，大家依次入席，頻頻舉杯，慶祝一項「新成果」大功告成。在這幾天裡，旅差費由原單位報銷，伙食由會議上慷慨補助，每晚有電影票戲票招待，一般還每人贈送「紀念品」，如提包、衣料等，也有送短缺商品的。在我參加過的兩三個和聽到的十幾個「鑒定會」中，沒有見過有人提反對意見、拒絕簽名的。我們科裡也常接到外單位的「鑒定會」邀請，對這樣的美差，科長總是盡量照顧：看誰有空、離的開，「鑒定會」地點離誰的老家近，或者誰好久沒有出差了，該輪到了，就派誰去。我也有幸到廣州去開過一個有關圖像管理的一個什麼迴路的新計算方法的鑒定會，自己并不熟悉，匆匆讀了一下論文，不甚了了。但簽字的時候我沒有猶豫：無功不受祿，報答還來不及呢，還猶豫個啥！

中國的科技要來個大發展，這種不科學的「鑒定會」之類，首先要改革一下。它所「鑒定」出來的結論的可疑性是很顯然的：參加人由主辦者邀請，就像是學生指定了老師來考自己，學術上的「反對派」，是難以接到邀請的。即使來了，在面對面的情況下，恐怕也難以啟齒。就好比是記名、當面舉手的選舉。還要考慮到將來人家也會反過來參加我的「鑒定會」，何況又受人厚待，還是彼此吧。於是乎，雙方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我以為，科技成果應該分作兩類：一類是有市場價值的，另一類是基礎研究領域的發現。對於有市場價值的成果，市場的接受與否就是最好的「鑒定」，它不干別人的事，也用不着要別人來肯定。比如一個新元件、新藥品、新工藝，有的有科學價值，有的沒有。就像圓

形的茶杯，有人把它改成了梨形的，只要有市場，被用戶歡迎，賺了錢，就是成果，也是發明者、改進者的工作成績，用不着開「鑒定會」予以肯定。這類成果的好壞，只能到市場上去試。沒有市場價值的，開了「鑒定會」也無濟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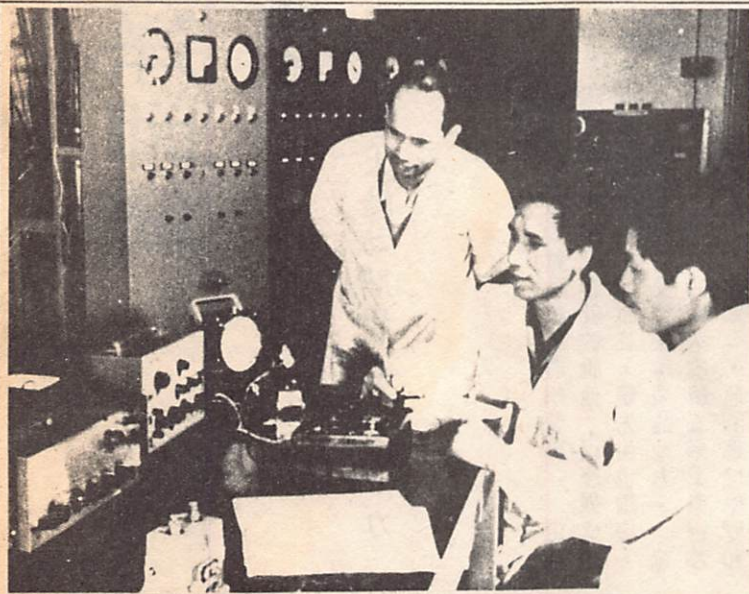
屬於基礎科學的，由於還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只能先在科學界交流、驗證。世界科學界的成果，都是在學術出版物上進行交流的。論文發表以前，由同行的專家先進行背對背的審核，決定接受與否，提出修改意見。發表以後，還由科學界在以後的長時間內考察其能否經得起推敲、能否被科學界所認可。正確的、靠時間來考驗、完善、確定，站不住腳的最終被淘汰。「鑒定會」也有，那就是科學界的各種科學獎金，但與我們不同的是，那是在一定的時間之後，正確性已為全體科學界所接受，而不是初見結果。另外，也不包括那些有直接經濟效益的成果。

奇怪的是，國內這種自欺欺人的「鑒定會」，近年來頗有越開越旺之勢。不科學的東西，怎麼反被科學界所擁護呢？這只能從中國的特殊現狀中去找原因，就像是人人垢病的每週半天或一天的「政治學習」，誰都知道它沒用，但又都樂得其所：聊聊天、打打毛衣。黨政領導趁此發發號令，顯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兩相情願，故報上盡管略有微詞，人們還是樂此不疲。

考「鑒定會」興旺不衰的原因，大約是這樣的：科學專項成果，本來應由專業期刊組織專家審查，決定取捨。可是中國雜誌少、周期長、發表難。正像政治生活缺乏民主討論的氣氛一樣，中國的科學界也普遍存在着外行領導

、行政干預、門戶林立、「老頭子說了算」、重名氣、輕質量，學術刊物往往為學術界頭面人物所把持，有的幹脆就是關係刊物，青年人、學術觀點不同的人很難涉足，雜誌的信譽自然受到影響。另外，技術問題也很嚴重：期刊內容龐雜，至今還沒有人系統地分類編目，提供一個可行的檢索工具。比如各大學的學報就是跨學科的包羅萬象。沒有系統的檢索工具，要想找到有關的專門文獻，無異於海裡撈針。更要命的是論文即使發表，上級主管部門的黨官也不會去讀，讀了也不會懂，怎麼辦呢？

科學成果要實行同行評議。



在這種現實面前，中國式的「科學成果鑒定會」就應天時地利而生了。「鑒定會」一開，顯然可以為作者造起聲勢，提醒上司，擴大影響。「鑒定」之後，才有響噹噹的成果記錄在案，以後申請經費、確定個人貢獻大小、以至調資晉升，就可以不發愁了。因此，我們現在還無權責怪中國科學家們的這項因地制宜的「發明」，如果他們也書呆子似地把論文寫出去就算完事，那十有八九是石沉大海的。遇到特別好的成果，外面鬧翻了天，本單位領導還無動於衷，所謂「牆裏開花牆外香」，絕不是個別的現象。最近「人民日報」披露了這樣一件事：內蒙古包頭第九中學的老師陸家義在數學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論文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學校領導竟一直認為他「不務正業」。一直到他死，都未能調到一個適合他的單位去工作！嗚呼！——這裡只好嗚呼了。這樣痛心的例子，我們聽得多了。

這是基礎科學中的例子，「鑒定會」因此是他們適應環境而生存的一種手段，不可放棄的。那麼，可能有經濟價值的成果，怎麼也要來「鑒定」，多此一舉呢？奧妙在於：在投資生產以前，不大內行的黨官可以聽聽反映、探探虛實，也作宣傳。「鑒定通過」之後，將來縱有風險，也好有個推托，保住烏紗帽最要緊——真是中國的事，自有中國的道理在。

為了讓中國的科技有一個大發展，在別的大事當中，我以為有兩件事是必須辦的：一是科技管理體制要大改，搞應用科學的，要徹底尊重市場價值規律。科學是要建立完整的評價晉升制度，徹底實行「同行評議」和「同行決定」，與黨官無關。二是科學交流出版工具要完善和獨立。

外行領導亂拜洋師傅

讀報偶感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余力

本世紀最著名的鋼琴家阿·魯賓斯坦在他的自傳中說過，在種類繁多的音樂表演藝術中，最容易騙人的是指揮，因為任何一個不太蠢的業餘音樂愛好者都會頗為像樣地隨着音樂揮舞指揮棒。

廣州樂團最近聘請到的那位「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年度首席指揮」大概就屬於這一類業餘音樂愛好者。

據「廣東僑報」報導，今年八月四日，廣州樂團開了場音樂會，指揮是個叫賴德梧的指揮家。報導這場音樂會的記者說，音樂會非常成功，因為賴先生「熱情奔放，指揮技術嚴謹」。但讀者很難完全相信該記者的報導，因為這位記者的音樂知識顯然相當有限：在報導音樂會節目時，他就錯把白遼茲（H. BERLIOZ）說成是德國作曲家。不過，報導還說賴先生獲得廣東省文化廳、音協和樂團負責人的祝賀和感謝。爲什麼呢？因爲賴先生是「加拿大著名的指揮家」。

要知道賴先生在加拿大如何著名，首先得

看他的學歷。

賴先生說他「曾就讀於廣州音專」。但他似乎未畢業，否則記者就會說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廣州音專」了。而且，賴先生也謙虛，他說：「廣州是我接受音樂啓蒙的地方。」意思大致是：他在音專的學業成績或畢業與否都不重要，那不過是「啓蒙」，他的輝煌學歷和成就是出國後才開始的。

那麼，賴先生在國外的學歷如何輝煌呢？——他「曾到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奇怪的是賴先生不提拿到過什麼文憑，取得何種學位，或受業於那位名師。也許賴先生謙虛？或者是真正的藝術家無須文憑，要知道巴赫、貝多芬、莫扎特都沒有什麼文憑；但他們也沒有誇耀自己曾在「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要沾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大名之光，却不會獲得任何文憑或學位，是不是有些奇怪？其實，稍知外國音樂院情形的人都清楚，音樂院都沒有校外課程，就讀並不需要任何資格，但若獲文憑，自然得考試，香港也有這種英國皇家音樂院的

考試，但從未有人敢因爲準備這類考試就自詡爲「在英國皇家音樂院深造」的。當然，賴先生並未誇口自己考上了什麼，他只說在那兒「深造」。然後，他又「在多倫多研習指揮法」。在多倫多，賴先生又很謙虛地不會提及自己曾受業於任何人，有何種成就，哪間大唱片公司請過他灌製唱片。

總之，這就是賴先生在國外深造的全部學歷：沒有文憑，沒有學位，也提不出什麼值得一提的老師。他只是「深造」和「研習指揮法」。

至於賴先生的音樂活動，其記錄似乎比他的學歷堂皇些，因爲他曾擔任過許多樂團的「音樂總監和指揮」。音樂總監或指揮這類銜頭自然動聽，但也該問問是什麼團體的總監。賴先生自報的團體有四個：（一）「多倫多華人室內樂團」，（二）「多倫多華人合唱團」，「尼亞加拉青年交響樂團」，（四）「尼亞加拉交響樂團」。頭兩個團體，顯然是華人社區的業餘音樂團體，在加拿大住上幾年的華僑大都知道，任何一個業餘音樂家只要有時間和興趣，都可組織這類社團及自任總監。至於「尼亞加拉青年」或無青年二字的「交響樂團」則比較費解。多倫多倒有一條街叫尼亞加拉街（NIAGARA ST.），但以這條街命名的「交響樂團」，誰知道它有多少隊員，業餘的還是職業的，灌過什麼唱片？加拿大的重要交響樂團如「多倫多交響樂團」、「蒙特利爾加交響樂團」、「溫尼伯交響樂團」、「渥太華交響樂團」都以自己所在的城市命名。但這些樂團似乎不覺得賴先生是「加拿大著名指揮家」，所以既未委任他爲總監，亦未請過他當「客席指揮」。不過，加拿大幾乎每間中學都有自己的樂隊，業餘音

樂愛好者如有興趣，自己組織個樂隊，自任總監和指揮，倒不是什麼難事。

那麼，賴先生開過什麼重要的音樂會嗎？報上提了兩次，一次是一九七八年指揮溫哥華交響樂團演奏中國作品。這大概是賴先生音樂活動中最重要的成就了，因為溫哥華樂團是水平很高的優秀樂隊。但賴先生忘了提音樂會後的樂評，因為這次音樂會之後，六年之內溫哥華樂團沒再提起他的大名。——不像廣州樂團那樣一聘請就是三年，而且是「首席客席指揮」！第二場是五年後在多倫多「又開一場」。這次，賴先生忘了提他指揮的是什麼樂隊，如果是比溫哥華樂團更著名的，比方說，多倫多交響樂團，他會忘了提嗎？關於這場音樂會，他提的是自己寫的（？）樂評：「加拿大樂壇為之轟動，廣大華人歡欣雀躍，熱淚盈眶」——哇！這還了得，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加拿大音樂會聽眾並不以熱情稱著，有時連世界一流的大家如吉列爾斯（GILLES）、羅斯特洛波維奇（M. ROSTROPOVICH）的音樂會都不會滿座，而賴先生指揮的「黃河大合唱」却能轟動樂壇，他不著名還成嗎？

簡而言之，這位「著名的加拿大指揮家」的全部學歷是「就讀音專」、「維也納深造」

他一下成了大指揮。

、「多倫多研習」，但沒有獲得任何學位或文憑。他任過多次樂團的「音樂總監和指揮」，但這些樂團的名聲大概不出多倫多的華人社區。他指揮過的唯一正規樂隊是溫哥華交響樂團，但在一九七八年指了一次，此後六年，溫哥華樂團以及任何較為重要的加拿大樂隊從未再請過他指揮。但就憑這樣的學歷和資格，他居然被「廣東僑報」譽為加拿大著名指揮家，並受聘於廣州樂團作三年首席客席指揮。

當然，要求廣東省文藝界的負責人們熟知西方音樂界的情形是不實際的。但在聘請客席指揮之前，至少應運用常識，作些調查。幾乎任何居住國外的音樂愛好者都知道，西方職業音樂家大概可成兩類：一類是開音樂會的，這些人不希罕學位（因有成就之後，自然有名大學贈與博士榮銜）。因此，比較難判斷其實際成就，但是否在重要的國際比賽中獲獎，是否有大唱片公司邀其灌製唱片，或是否有資格在大都市經常開音樂會或指揮重要的樂隊應該是評判的標準。據筆者所知，在這類音樂家中，目前「外籍華人」只有馬友友和傅聰。另一類是教授或研究音樂的，要判斷其成就，通常比較容易：正式文憑和教職——自然應該來自重要大學，因為在美國，連校址都沒有的「大學」居然也可以發賣「博士學位」的。

如此胡亂聘請指揮，浪費金錢和貽笑大方還是其次，辱沒本國的藝術家才是大禍。一個連音專都未畢業的學生，在國外混了十幾年，沒有任何學術或實際成就，居然成了「特邀的首席客席指揮」。而為着這一榮譽，這位「著名指揮」連行騙都不必。因為，平心而論，賴先生在自報學歷或成就時，雖有自我吹噓之嫌，但大概不會撒謊——除了自報曾「轟動加拿

大樂壇」。他只是非常技巧地忘了提一些他其實從未得過的成就——諸如曾在維也納或多倫多深造時取得過何種學術或文憑，在多倫多轟動樂壇的那場音樂會他指揮的是什麼著名樂隊，他任總監或指揮的「交響樂團」在加拿大如何重要……等等。同時，他又非常技巧地點明許多會讓愚人們眩目而令他沾光的響亮名字：「維也納音樂學院」「多倫多」「溫哥華交響樂團」。但這就是他的全部技巧。奇怪的倒是為什麼廣東的音樂界會如此甘願地對他為「加拿大著名」。大概是國內某些領導，盲目排外之後崇洋，以為外籍華人只要自稱專家，必有可觀之處，只要肯俯就擔任「客席指揮」，就匆匆忙忙地捧為「首席」，且一聘就是三年。

這種情勢很有些像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在果戈里筆下，一個二十來歲的，連話都說不連貫的無賴青年，被地方官捧為欽差大臣，因為這青年來自莫斯科，而當地的官員們又被「欽差大臣要來了」的消息嚇昏了頭。在廣州，一個連音專都未畢業的人被捧為「首席客席指揮」，因為這位先生去過維也納，來自多倫多，而領導內行的外行們，又不知道如何區分一個真正的專業指揮和只會頗為像樣地隨着音樂揮舞指揮棒的業餘音樂家。

這大概也是外行領導內行的德政吧：在未來的兩年內，廣州樂團將會在一個被廣東省音協和文化局捧為「加拿大著名」的業餘指揮家指導下排練或開音樂會。雖說，幾乎每一個被指揮的廣州樂團樂師所受過的音樂訓練大概都會優於這位「首席客席指揮」，但他們能說些什麼？因為國法國規如今都要他們尊重外國專家！

香港人民的福祉，應由香港人民自求追尋

(香港) 公洪芝

中國之春前曾連續發表專文評析香港九七問題，并提出若干具體的建設性意見，本人深感欽佩。我想在這裏談一下很多香港人在香港都不敢說的感受。

鄧小平針對香港收回問題，提出「一國兩制」設想，並允諾香港在收回後保持現況五十年。我認為，鄧小平此一想法，其目的明顯是對台灣統戰而設計。

問題在於，鄧小平如何保證他死后此一諾言不變呢？中共的新憲法明文規定有「四個堅持」。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任何法律，當然包括鄧小平的話，都不能與憲法相抵觸。既然如此，「一國兩制」顯然與「四個堅持」背道而馳，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是違背憲法的。

因為中國大陸為「人治」政權，執政者從不尊重憲法，我們姑且相信鄧小平能信守他的諾言，也可假定趙紫陽、胡耀邦二人能信守鄧小平的承諾。可是，胡、趙兩人年紀都很大了，況且胡、趙聲望遠不如鄧，對局勢控制力也遠不如鄧，鄧一旦撒手塵寰，胡、趙能鎮得住大陸嗎？如果鄧去逝後，左派勢力再度抬頭，或者第三梯隊接班人選不允許「一國兩制」，那麼香港人民又怎麼辦呢？另外，大陸人民與香港人民分別在兩種制度下生活，生活水平有很大差距，大陸人民會答應嗎？所以，「一國兩制」在憲法上、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行不通的，很多香港人都以為這只不過是一種統戰口號而已。

過去卅多年，中共自毀諾言，不知凡幾。鄧小平執政後，信誓旦旦說不再搞政治運動。曾幾何時，鎮壓犯罪及反精神污染運動接踵而來。現在，又大搞否定「文革」的運動。中共的運動，何時停過？

香港今天是英國殖民地，這是中國的耻辱，但是香港人民的自由、社會的繁榮是有目共睹的。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實際上承認了大陸是一個火坑。現在，雖然北京政府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但是，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共任命；香港法律不能與基本法抵觸；中共駐軍香港及對香港預算實加審查等。我們了解，凡熟悉組織管理工作者，都知道組織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事與經濟，掌握了人事與

財政，就是控制了組織。中共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下之人事與經濟，均控制在手。以中共不民主統戰手段及知識，怎可能允許「港人治港」？再進一步分析看出，北京政府與英國之協議，目前屬於國際法協議，中共可能會遵守。但是，一俟中共收回香港，此一協議即喪失「國際性」。中共可將之變為「國內法」，隨時可以撕毀。試想，在中共與英國談判時，香港人民尚無法表達意見，中共收回香港後，香港人民那還有發言權？那時，恐怕香港人民只能淪為刀下之俎了。

從實際看，中共已在多年前就對收回香港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滲透部署，如擴大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光大企業。如果中共真是信守「港人治港」，又何必極力控制香港呢？現在情況尚且如此，英國屆時一撤，香港還能逃脫「黨人治港」的命運嗎？記得一九五一年中共與西藏地方簽署過十七條協議，到後來，這個協議不是很快就變為廢紙了嗎？事實上，中共已為將來撕毀香港問題協議埋下伏筆。鄧小平發表談話說，中共一定要在香港駐軍，而且，如果香港將來發生混亂，中共將進行干預。可見他仍在迷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鄧小平的講話意思是，香港人民只有老老實實地俯首貼耳，不能對中共不滿而發生一點騷亂，否則，中共將用「維持香港安定」為名，出兵鎮壓。鄧小平可稱是有預知之明，他早就料到香港人民可能對中共控制香港不滿而進行反抗，所以他有言在先：只准香港人民老老實實，不准香港人民亂說亂動。中共在收回香港的宣傳上，一再強調「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但中共的「四個堅持」使我們懷疑，中共的「愛國主義」是「愛共產黨」、「愛馬列主義」，而非真正愛中國。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實在悲哀。我們在大陸不願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冒死偷渡來到香港。在香港又熬過打黑工的困難階段，現在我們總算有了合法的身份。可是，再過十幾年，就要回共產黨的手心之中，想起來，真不知前途何在？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積極投身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把中國大陸變為民主、法治的社會，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

畫像

(香港大陸新移民) 黃流

紅星農場東風生產隊裡有一間獨立的宿舍，人們來來往往，永遠聽不到裡面的人說話，入夜時分，也難得看見裡面有燈光。它老是那麼壓死氣沉沉、黑古隆冬的，日子久了，人們鬧着玩，把這宿舍就叫做太平房，住在裡面的三個中年職工——宋觀才、馬如龍、牛阿貴，則順理成章的被編為一號死人、二號死人和三號死人。

這太平房裡很簡單，三張板床、三床蚊帳、一條水煙筒。門角堆放着鋤頭、鐵鏟、犁耙等農具，農具旁是兩個瓦鍋、一個火爐、一把柴草，門板上掛滿破爛骯髒的衣服。三張床的床底都有一對拖鞋，而床上則都有一個木箱，那是用來裝置衣物的。房間的地是泥地，烏黑

而潮濕。這房子過去是用來養病牛的，因住人住了多年，倒也不再具有牛屎牛尿氣味。房中唯一的點綴品，是在向門的牆上，貼着一張毛主席像。

在一個生活閉塞、甚少娛樂的地方，人們多喜歡互相串門、胡說八道一番，以此來消遣工餘的閒暇。但這一間太平房，却極少有誰去拍門。原因很簡單：三個「死人」都曾經是牛鬼蛇神。後來雖說是解放了，隊幹部却又不叫他們從監護房，即這個太平房中搬出去，因而所謂「解放」，只怕未必當真。

有趣的是：這太平房中的三個「死人」，也安於被孤立，樂於被孤立，他們每天準時開工，每天在飯堂裡吃三餐，隊裡敲鐘開會便去開會，沒有會開就只有把自己關在太平房中。似乎這三人世界也挺有趣。有些特別積極的份



子曾經偷偷地窺探過他們，希望窺探出太平房中是否有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可惜都大失所望。他們通常三個人合煮一鍋粥吃，吃完就各自安寢。星期六晚上則多一個節目：宋觀才讓一車一馬跟馬如龍下棋，馬如龍又讓一車跟牛阿貴下棋，誰輸了就罰誰在下一個星期裡負責煲粥。那宋觀才簡直是永遠的勝利者，牛阿貴則幾乎天天都要煲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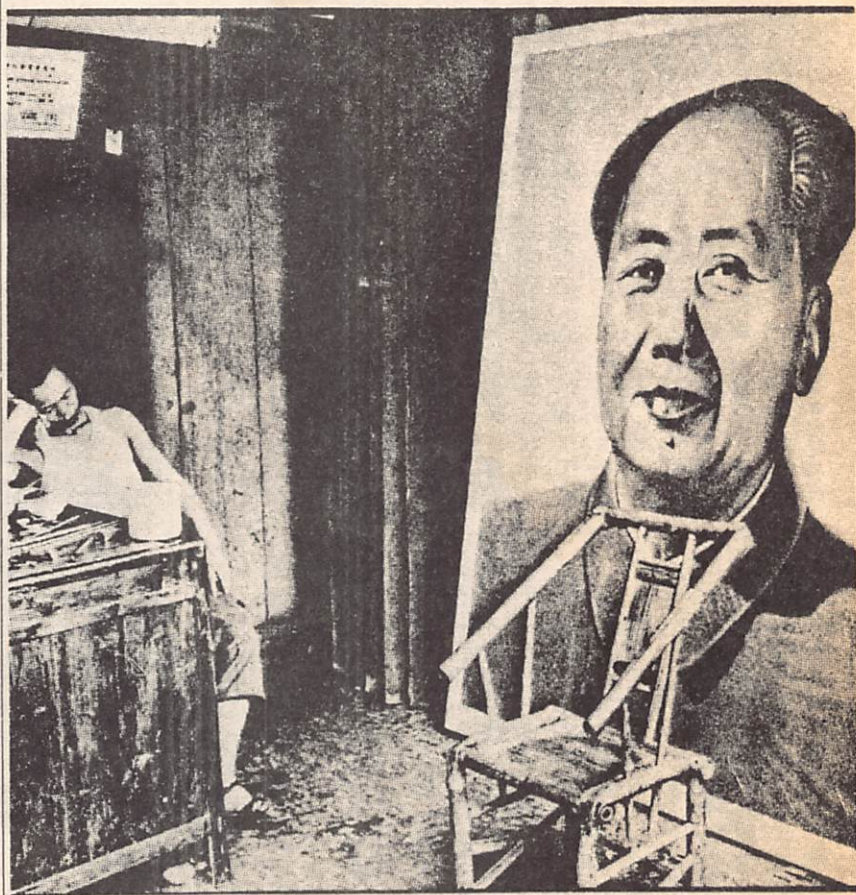
然而，在農場實行包產到組之後半個月，一天晚上，正當三個「死人」在棋盤上廝殺之時，忽然有人拍門造訪，三個人都不寒而慄。

開門一看，是他們的生產組長牛得勝。三人着驚不忘客氣，慌忙讓座。但牛得勝不像是來串門的，他擺了擺手，跟着便粗聲粗氣道：「我來是想問一問你們：現在是『向錢看』的

時候——包產到組了，你們爲什麼還是半死不活的幹活？這不行！他媽的，農村包產到戶，農場却只能包產到組。我被迫背你們三條死屍。我把你們當人看待，你們可不能連累我拿不到獎金。」他喘了口氣，立即又說：「你——」他指了指宋觀才，「我知道你鬼靈鬼精，好主意好方法多的是，你要大膽說出來，不要裝聾作啞，現在是不管什麼鳥了，能弄出孩子的就是好鳥。……你——」他又指一指馬如龍，「你不要馬如蟲！現在的路綫，不再堆滿釘子、地雷了，你幹活要跑快一點。不要像老大爺的鳥。……還有你——」他再指一指牛阿貴，「你以爲像條水牛，想不到給閹幾閹，水牛變成了狗，而且是生了十多胎的母狗。……」他的手不再指誰，而是揮舞着，「總之，你們是死是活，我本不想理會，但，現在是包產到組，你們仍然是死屍，就是害我、害整個組。……」

簡直像一輪炮彈轟炸，炸得三個人目定口呆。

「你們現在就檢查一下，究竟是什麼鬼作祟，使你們老……老是半死不活。」牛得勝叫嚷完後，見三人都不吭聲，他腦袋一歪，又道，「你——」他拍拍宋觀才的肩膀，「你父親已經摘了地主帽，你本人的罪呢？不過是妄想變天，全沒有實際言行。你怕什麼？……你呢——」他的手指戳到馬如龍的胸脯，「你父親的右派帽已經摘了，還宣佈是完全冤屈，至於你本人，只不過是寫了封下流信，給女孩子送禮罷了，那一個識字的男女不下流、不討好女的？大家都體諒的。……還有你，——他在牛阿貴的胸脯捶了一拳，「你雖然撕毛像來大使，但你是貧農，擲下地噹噹響，全是要飯碗的響



現在，毛主席的像都被取下來了。

聲，就因爲這樣，沒送你去勞改，而且也不帶帽管制。現在又不大管政治，只管經濟了。你還憂慮什麼鳥？」

三人都像繩索吊着頸脖的死屍，搭拉着腦袋一聲不吭，一動不動。牛得勝顯然下了很大決心，要弄清三人半死不活的原因，所以很耐心地站着，等候答覆。

等了許久，硬是等不到誰開腔。他終於不耐煩了，便在太平房中張望，想通過觀察，從

他們的生活環境中尋覓出答案。

太平房中很慘暗，他把宋觀才床上的棋盤旁邊的油燈舉起來，一步步的各處巡察。

當他看到牆上的毛主席像時，他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眨巴着眼睛想了片刻，忽然冷笑道：「我看原因就在這裡。」他背向毛主席像，手向後指了指，「現在家家戶戶都已經不掛他了。這是鄧小平時代，一切阻手阻腳、妨碍四化的、妨碍大幹的，都應該……」他做

了個撕掉的手勢，「好了，畫人像不用畫出腸肚。我是痛快人，誰害我……拿不到獎金、害我……那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然後，他把油燈往地上氣沖沖地一放，便走開了。

二

牛得勝把原因點破，不用三人寫檢討，這值得煮一鍋糖粥來慶賀一番。但牛得勝要求把毛主席像撕掉的提示，却又把三人嚇得魂飛魄散。

那是三人都刻骨難忘的：就在不久之前的文革中，有一天，牛阿貴因為大便急了，一時間找不到紙，也找不到棍子，他隨手把一幅陳舊破損的毛主席像撕下，便打算上廁所，他發夢也想不到，就這麼樣他就當場被揪了，肚子裡那一泡屎尿也不准他蹲着拉出來，而要他在拳腳交加下全拉在褲襠裡。接着，則是全農場遊園，五隻門牙被鬪打掉，兩根胸骨被鬪斷，全身上下被鬪出三十九處傷痕，然後是關押進太平房中，天天向毛主席請罪。這還是從寬處理呢，如果從嚴處理，那情形還敢想嗎？這彷彿還是昨天的事；而今天，這毛主席的像，再讓他撕一次？天啊！不行！絕對不行！

當三人驚魂稍定，想到永遠正確、永遠當紅的生產組長牛得勝，竟會下那樣的指示，三人倒也覺悟到時代急劇變了，毛主席已經見鬼去了，看實際生活，人們顯然對毛主席已不再那麼恭敬了。但是，三人却硬是有同樣的憂慮：這些變化能說明什麼？社會主義就與忽晴忽雨。吸取正反教訓，誰敢擔保眼前對毛主席的不敬，不是黨的陽謀？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引蛇出洞」？再有，就算眼前的一切變化不是



「毛澤東的像為什麼不能撕？」

陽謀吧，但鄧小平可以鹹魚翻身，過上幾年，誰敢擔保毛主席不會借屍還魂？共產黨就慣於這麼反反覆覆，所以，毛主席的像惹不得，惹不起，絕對不能惹。

當三人都認定，撕毛主席像絕不可以，新的憂慮、恐懼便又來了：怎麼樣對付牛得勝呢？說良心話，誰能不服了牛得勝，他的確看得準極了。就因為早晚看見毛主席像，他們就想到革命，想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想到過去幹社會主義，自己是死人，現在幹金錢掛帥却活了，運動一來，將無法交代？……牛得勝既然看得準，他又下了一「撕掉」的命令，不照辦能行嗎？不行！「不怕官，最怕管」，牛得勝是吃鐵飯、拉銅屎的永遠革命派，血冷得很，不聽他的，只怕早晚要吃他的坑害，天啊！不撕不行！真的，惹不起他！不撕不行！

該怎麼辦？三人都呆了。

宋觀才是上山下鄉的高中生、地主仔，方型臉孔，一對眼睛漆黑鬼靈。他腦筋轉得挺快，深感沒有現在也就沒有將來，畫像必要牛阿貴或馬如龍去撕掉才行，因為見牛阿貴和馬如龍都在考慮不撕不行。他思量見機而作，因而忽然做出不關己狀，拿起水煙筒，咕咚咕咚的只管悠閒抽煙。

馬如龍也是上山下鄉知青，讀過兩年初中，圓臉孔，一對眼睛泛著白光，那眼珠好像陷在污濁的泥漿裡，轉動不靈。他腦筋遲鈍，當他想到不撕不行，他沒法再想下去了，嘴巴張開，好像牙齒痛得緊。

牛阿貴是本鄉本土的農民子弟，像牛牯一樣粗壯，一對牛眼，一個牛鼻，那嘴巴又厚又寬又大的，幾乎也像牛嘴，一想到不撕不行，他一拍大腿，便向馬如龍叫道：「撕吧！既然牛得勝叫撕，你還怕什麼鳥？」

「我……我……」馬如龍大驚失色：「他哪裡指定要我撕？」

「你別裝糊塗了，他最後說話時，是臉對着你。我記的很清楚。」

「你胡說！你胡說！」馬如龍非常氣憤：「我也記的清清楚楚，他說到撕掉時，是向你揮手。」

牛阿貴眨巴着眼睛一想，只覺牛得勝似乎的確向他揮過手，當下目定口呆，終於嚙了一口唾沫，忽然又道：「他其實沒有點名叫誰，他是要我們去撕，我們該誰去撕？當然是你。」

「怎麼就該我撕？」馬如龍撞天屈似地叫起來。

「你的床鋪離這畫像最近。」

「但你的手比我長，你的手脚比我快！」馬如龍氣得圓臉孔發青，小鼻子發白。他突然

發覺他和牛阿貴的理由同樣荒謬，便又轉口道：「我是這態度了：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要撕，誰貼上去的便該誰撕。」

「好！我同意！」牛阿貴突然響應。拿手指着馬如龍，眨着眼睛想了片刻，手指忽然轉向宋觀才，「好！我想起來了，是你宋觀才貼的。」

宋觀才居然不慌不忙，他鄭重地反問：「是決不含糊——解鈴還須繫鈴人？」

牛阿貴也不思索，便嚷道：「對了，國營貨品——不能討價還價的。」

宋觀才作狀沉思，忽然漫聲道：「是我貼的，我絕不推卸責任，上刀山、下油鍋，我也一定去。但是，我記得，你搞錯了，我只是塗漿糊。至於貼上去的，千真萬確是你牛阿貴，再說，這幅畫像是你牛阿貴買回來的，這是你的財物，你細心想一想，是不是？」

牛阿貴抓爬看腦袋楞了片刻，那臉孔忽然變得像苦瓜，過了好一會，才又哭喪着臉道：「我是得罪了毛主席，才變成牛鬼蛇神，再犯就是屢教不改。你們去撕，有甚好歹也只是初犯，會從寬處理。我們是難兄難弟，要互相幫忙才是，你應該記得，當初你被鬪爭回來，腦袋腫得分不出眼耳口鼻，是我天天給你敷藥、餵飯。……」

宋觀才楞了一楞，眼眶濕了一濕。低迴了好一會，才又傷感道：「是的，想到報恩，我實在應該幫忙，可是，你高頭大馬吃得消鬪打，我呢，如果再給鬪打一次，那就不是腫了，而是要抬去埋掉了。再怎麼從寬，也享受不到。」

牛阿貴腦袋一歪，想起宋觀才的確書生文弱，的確豆腐一樣的經不起摔打。不禁嘆氣，

也不好意思再說了。他忽而轉對馬如龍，正要叫馬如龍見義勇為，沒想到馬如龍却破天荒的敏感一次，搶先說道：「我這身體，是中看不用，內裡早已爛了、空了。你知道的，我老是遺精。……」

牛阿貴不禁又是一楞，看看馬如龍，想起他並非撒謊。當下不禁頓足叫苦。叫了一會，忽然又滿懷歉意道：「你們吃不消再鬪打，我也吃不消『屢教不改』，咱們講交情，也講講運氣吧，這事情抽籤決定！」

「好！又講交情又講運氣。」宋觀才立即響應，並且從床上扯出三條蓆草來做簽子。

一聽抽籤，馬如龍嚇得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他刻骨銘心的記着：他的父親本來是革命幹部，反右時候，右派材料報上去了，上面却三番四次的打退回來，說是名額未夠，那時誰也想不到當了右派會有什麼事。爲着敷衍過關，科室裡於是來個抽籤解決，誰抽了短簽便權且當右派，並胡謔幾句不滿意語。就這樣，他的父親便抽籤領了一頂右派帽，下班回家還笑呢。沒想到半個月後便天昏地暗，撤職、勞改，越呼冤罪越重，終至家破人亡。剩下的而今平反了，仍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前事難忘，他當下震慄着連聲高叫：「我不抽籤！我不抽籤！……」

他好不容易才發現：宋觀才不停地向他使眼色。他楞了一會，才猛然想起：宋觀才是要騙術。這騙術他是見識過的：宋觀才拳頭裡捏着的三條簽，其中兩條，其實只是一條最短短條的兩條頭，最長的一條，則是全部塞在拳頭中。就因爲這樣，宋觀才絕對不會輸。也因爲這樣，他馬如龍如果比牛阿貴先抽，宋觀才就必定要暗示他應該抽哪一條，否則三條簽一扯竟

然只剩一條，他宋觀才的把戲就拆穿了。想明白，當下他也不吭聲了。當宋觀才把三條簽子伸到他面前，他慌忙拉住一條，一扯，宋觀才死抓不放，他慌忙抓另一條，一扯，扯了出來，一看挺長，他吁了一大口氣。

輪到牛阿貴抽，他抓了一條。宋觀才連聲問決定了沒有？牛阿貴牛脾氣，牛眼一閉，叫聲「定了」，便死力一扯。宋觀才雙手一鬆一幌，跟着手心裡拿出一條，三人一比較，牛阿貴咯了一聲，一張長臉越拉越長。

「好啦！牛哥，這是天意。」宋觀才嘆息道。

牛阿貴楞了許久，終於一拍胸脯，道：「好吧！我撕！怕什麼鳥！他媽的武大郎吃毒藥，反正吃是死，不吃也是要死，怕也沒用。」他說着，真是走去撕。

但他只撕開一角，忽然又不撕了，轉身說道：「撕是我撕了，但你們要保證，保證不檢舉揭發我。」

「這還用說嗎？」宋觀才聲調感激道，「我是你照料着活回來的。至於馬如龍，他那次被綁跪着批鬪半天抬回來，腿癱癱了大半個月，我記得的，你天天幫助他拉屎拉尿。他難道會恩將仇報？」

「好好！這就是了。」牛阿貴禁不住又心酸又心甜，往自己的胸脯狠捶了幾拳，以壯胆色。正準備去撕，却忽然又道，「還有，將來有人追查起來，問是誰撕的，大家要幫忙減輕我的罪，就說是三個人一齊撕，分不出誰先誰後，可不可以？」

宋觀才的方型臉忽然扁了，叫苦道：「撕一張畫像，還要三個人一齊撕？硬說是一齊，這豈不是倒成了反革命集團？」



運動來了，就一定要挖出階級敵人。沒有蛇就挖鱧代，沒有鱧就挖泥鰍代，泥鰍也沒有，就抓蝌蚪……

牛阿貴如夢方醒似，忙問：「那該怎麼說好一點？就說是牛得勝命令我撕的？」

宋觀才頓足道：「這不可以！牛得勝鬼得很！到時他會說你含血噴他，他決不會認賬的，他這個黨員不是人，他懂得三十六變。黨支書又是他的親戚，我們惹老虎也不能惹他。……」

牛阿貴不禁頭皮一陣發麻，手足無措。宋觀才看在眼里，頓然驚覺自己警告得太早。應該等牛阿貴把畫像撕了才說這些話。當下他慌忙又若無其事的說道：「我仔細想過了，其實你也不用怕，撕掉了將來有人追究，我們來個都說不知道，誰也沒有撕。」

牛阿貴一想有理，登時轉驚為安，傻呼呼的笑了笑。

然而，當他昂揚着腦袋，再去撕毛主席像的時候，馬如龍却猛然一把把他拉住，緊張張道：「撕不得！我越想越撕不得！牛得勝將來決

不只是不認賬。為着立功，為着當先進，他肯定會倒來一把，搶先搶快的揭發。我寫的情信，就是他請求我代他寫的，沒有署名，他親手遞給女的，人家不愛他，罵他下流。他不吭聲。文革一來，他居然就搶先揭發，說是我請他王八蛋做紅娘，騙他遞下流信……我算看透了，我們一定要死人一樣的規規矩矩，不讓誰抓住辮子，才能在下一次運動中，不被揪扯出來……」

他話未說完，宋觀才便苦着臉道：「你這就叫『看透了』？我告訴你，運動來了，就一定要挖出階級敵人。沒有蛇就挖鱧代，沒有鱧就挖泥鰍代，泥鰍也沒有，就抓蝌蚪，反正把頭砸扁了都像蛇。就因為凡運動都必然這樣，所以，下一次運動，我們就絕對逃避不了被揪。你是死人也挖出來批鬥：『你為什麼死躺着？』『你為什麼死不看毛著？你以為死了，我們就放棄對你的警惕？』情況就是這麼樣

。所以，我想過了，想逃避下一次運動，是癡心妄想。想怎麼樣使群眾心照，在鬪打我們時，看去拳頭很凶，但打下去不重，這才是實際的……至於牛得勝，他越不是人，我們就越不能不服從他，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想過了，這畫像一定要撕。」

馬如龍的腦筋轉得太慢，說得急促的、含意複雜的話，他聽了等於沒聽。他因而沒理會宋觀才的意見，激動道：「你別說了，你這也想過，那也想過，為什麼你不撕？」

「你……你叫嚷什麼？」宋觀才惱火道，「我是要你撕嗎？我絕對未想過要你撕！你怎麼搞的？」

「我明白！我也很希望有人撕而與我無關。」馬如龍理直氣壯，挺起胸膛，「但是，擺明誰撕了，誰將來就可能被撕掉腦袋。牛哥對我們有恩有義，我們不能明知是火坑，却讓牛哥去跳。」

「可是這火坑一定要一個人去跳！我們是抽籤認命！……」

「算了！這抽籤不算！」馬如龍嚥了口唾沫，好不容易才沒有洩露騙局。

見馬如龍良心發現，感激動容，宋觀才啞了好一會，終於歉疚道：「好吧，不算就不算，你馬如龍說該怎麼辦吧？」

馬如龍盤算了半天，幾乎等於沒有盤算：「這事情最好還是通過民主協商，反覆討論，充分醞釀，再作決議好不好？」

這一來，三人都沉默了，房中只聽見蚊子嗡嗡營營的聲音。

過了許久，宋觀才見馬如龍只是發呆，牛阿貴只是乾瞪眼，他耐不住蚊子沒頭沒腦的叮咬，估量已是深夜一時，便決斷道：「萬全之

策肯定沒有。就這麼辦吧！誰都不要去撕。我們想辦法一個個的搬走，不住這太平房了。」

說完，他不想再議論，於是吹熄了油燈，上床安寢。見說要散伙，牛阿貴和馬如龍都如雷轟頂，張口結舌。隨後，兩人情緒很激動的在房中摸黑研究，直到蚊子越來越多，實在抵擋不住，才各自鑽進蚊帳之中。

三

牛阿貴向來最早入睡，但這一個晚上，他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

他羞慚和歉疚，關於撕掉畫像，從牛得勝是向誰揮手來說，從誰手長腳快來說，從解鈴還須繫鈴人來說，從誰最吃得起鬪打來說，從認命抽籤來說，有那一條不是該由他牛阿貴去撕的？自己竟然就是不撕。這算什麼？他媽的自己，真是婊子養的。

他狠狠地罵自己，却又原諒自己：婊子養的，畢竟還是人養的，而被批鬥的人，簡直是比不上老鼠嫖出來的。老鼠被打時只管吱吱哀叫就行，而人被批鬥時，可憐被打得褲襠裡又屎又尿的，却還要叩頭請罪，千萬句感激挽救。

自己被體諒，可以不撕畫像，除了暗自慶幸，他也萬分感激：馬如龍真沒說的，夠交情。宋觀才嘛……看來也沒說的，總算有情有義。

然而，想到畫像不撕就要散伙，他禁不住又心痛、迷惘、驚惶。宋觀才像諸葛亮一樣聰明，失去宋觀才，他和馬如龍就將像螳螂掉了腦袋，不知天高地厚，只能瞎爬亂動。他還記得，那年鄧小平鼓吹三項指示為綱，大幹快上，他牛阿貴和馬如龍就說天晴了，幾乎就在生產小組上發言表示擁護，幸虧宋觀才及時向他



就用鄧小平的像來代替吧……

倆使一個眼色，他倆慌忙閉上狗嘴，這才避過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還有，當「四人幫」被抓起來後，他和馬如龍都嚇得面無人色，馬如龍斷言內戰將會發生。宋觀才却笑道：「天將晴十年以上，我們可以下下象棋，加些菜吃喝了。」由此，三人才得以過了幾年寫意的、畢生最輕鬆的日子。另外呢，就由於宋觀才聰明，全隊數他讀書多，數他腦筋靈活，隊長及科驗組常向他請教，這就使人們不敢藐視「太平房」。他牛阿貴和馬如龍真是沾光受益。至於馬如龍，雖然馬如蟲的，說話做事都慢吞吞，要死不活，但心地挺和善，他有個姑媽在香港，時常有錢寄給他。隊裡飯堂每逢加菜，他總是買三份回來，大家一起享用，吃到最後一片肉，并總是說：「牛哥是牛，消耗大。」接着便把肉硬夾進他牛阿貴的碗裡。一片肉有幾兩重？但那份情重千斤呵！還有，太平房中的電鍋、碗筷、爐子、油燈、水桶，哪一樣不

是馬如龍掏錢買的？那年三個人被鬪打，誰不是由頭爛到腳？醫藥費、補養費誰出？還不是馬如龍拿出來……總之，三個人，是凳子的三條腿，有智出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苦難的十年文革才熬過去，又因為誰都得不到女人疼吧，看來也必要三人在一起，大家才能都有下半輩子。所以散伙的事，怎麼可以？不能散伙！牛阿貴思想後，不禁發了狠。他於是專心致意的，只管想法如何對付毛主席像。

他一直思量到天發亮，眼睛才突然一亮：他媽的，為什麼不可以來個又是撕，又是未撕——用一塊紅布把畫像遮蓋起來？堂中央不是也這麼樣掩蓋毛主席嗎？

似乎腦筋一開竅，便再也堵塞不住，當他想到好端端一幅牆壁，掛一小幅紅布，像豬屁股打一個紅印似的難看和招人注意，竟隨即又有了改良辦法：現在是鄧小平說了算，就用鄧小平的像來代替那幅紅布吧。

也真難為他，他跟着就想起十多年前，他的農民表哥收藏有十大元帥及一些中央首長的畫像，裡面似乎就有鄧小平的像。

因為向來被宋觀才和馬如龍嘲笑，說他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這回，他要證明一下他頭腦也發達，也為着讓宋觀才和馬如龍驚喜一下。他早上起床，什麼話也沒說，臉未洗，口未漱，便立即徒步二十公里，趕去他表哥所在的農村。

這天，表哥剛好進城。幸好他姑媽挺親切，他因而在表哥房中翻箱倒櫃的尋找。他找了半天，總算找到了。但他打開一看，却發現畫像保存的不太完善。他感到失望。憂煩焦灼之餘，他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補救

的辦法。然後，他二話沒說，把鄧小平的畫像一捲，急急忙忙趕回農場。

次日，馬如龍起床，驟眼一看，立即眉開眼笑，拍掌道：「真沒想到，牛哥你真行！這真是光芒萬丈！這才叫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宋觀才驟然一看，也覺欣喜，他微笑着趨前一望，那笑容却突然僵住，跟着眼耳口鼻似乎都被蚊蟲叮咬着，老不停的打皺和搖動。因為牛阿貴在等他稱讚，他好不容易才牙痛似哼道：「真虧你想得出！這的確是鄧小平時代……」

這以後，一連幾天，牛阿貴和馬如龍的精神狀況起了大變，得到了牛得勝的稱讚。至於宋觀才，他却還像死人，他不是不想振作，只是每當他要發奮做人時，就總是不能自制的產生幻覺：一對毛主席的眼睛在逼視他，那眼睛有時在樹叢中，有時在池塘裡，有時在頭頂，有時在背脊，有時在轉動的牛車輪間，有時竟然在女人起伏的胸脯上……他不敢直視這一對眼睛，因為太恐怖了，那似乎是鬼影幢幢的黑夜，要把他勾攝進去，他似乎是瞄準着他的手槍槍洞，有一顆子彈在沉默……

因為他老是像一個死人，自然要吃牛得勝的罵，這已經夠他難受的，可憐還遭到了生產組其他人的辱罵，十年文革鍛鍊了他，使他能忍耐，能夠像狗似的趴下去苟且偷生。但給辱罵得多了，他還是不能不尋思：不錯，從「北京之春」被扼殺，魏京生受審，可證明這時代，是鄧小平臉孔，睜着毛主席的眼睛。但自己有必要那麼驚恐嗎？處身現在固然要慮及將來，但現在過不去，有將來也是假……就這麼樣，他決定了，人們向資本主義走一百步，自

己應該走五十步。為着走出這五十步，也為着自己不致神經錯亂，他必要離開太平房。

他決定了便立即幹，因為生產隊的領導都對他有幾分敬重。他的言行也比較正常，所以他去幾間宿舍一串門，倒也有樂意讓他搬過去的，他於是收拾床舖。

他沒有理會牛阿貴和馬如龍的驚愕。等床舖衣物收拾停當，才黯然地解釋：「對不起，我實在不搬走不行。真的，再住下去，我會發瘋……」他不想說明是長着毛主席眼睛的鄧小平像使他驚惶，使他神智恍惚，使他要搬走，他想到了：他說出來，牛阿貴和馬如龍決沒有胆量把這畫像撕掉。這可是既得罪毛主席，又得罪鄧小平的蠢事。既然如此，倒不如不說破，免得他倆又神魂不安，又變成「死人」。

「怎麼會瘋呢……」馬如龍突然哭了，哭得好像死了爹娘。

「你嫌我們蠢！是不是？我們是蠢，但沒聽過蠢是會傳染的……」牛阿貴說道，也突然放聲大哭，眼淚鼻涕橫流。

「不，不是這個……」宋觀才狼狽不堪。他既然不忍直述搬走因由，頓覺無話可說。

牛阿貴和馬如龍只管涕泗縱橫，那份淋漓的真情摯愛，把宋觀才弄得呆了，呆着呆着，他不禁思緒如潮，想起三人如何在危難中相濡以沫，相煦以濕；想起三人如何經常的爾虞我詐，但到頭仍互相體諒、互相愛護；想起三人盡管都一又怕苦，二又怕死，但在十多年紅色恐怖中，却都能鐵着良心，絕未互相檢舉揭發過……想着想着，他不由不迴腸蕩氣，也不由不流下熱淚。給感激的浪潮衝擊着，他的心震慄。頗費躊躇的思量片刻，他才忽然親切而傷感道：「其實，你們兩個也應該搬走，這裡不

能再住了。我想到欠你們許多恩，才提出這忠告。我們都不要留戀了，都去投胎做人吧！理由我不說了，說了對你們沒好處。至於你們搬去哪一間宿舍，我盡快替你們聯繫。再有，分手了。我送你們幾句話，你們要好好記住：只要黨中央選堅持黨的領導，你們就要堅持低着腦袋做人；只要黨中央選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你們就要堅持半殘半廢、半聾半啞；只要黨中央選堅持社會主義，你們就要堅持不致富發財；只要黨中央選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你們就得堅持腦袋像一個冬瓜……」

他好不容易才使牛阿貴和馬如龍安靜下來，讓自己搬走。過了兩天，他也果然幫忙，讓牛阿貴和馬如龍都搬出了太平房。

當晚，宋觀才鬼鬼祟祟地回到太平房，把那幅睜着毛主席眼睛的鄧小平像取了下來。當他把畫像拿在手裡時，他突然驚恐起來。他呆立良久。他慢慢環視周圍，見的確無人發現他才吁了一口大氣。然後，因驚恐而慘白的臉，則浮出了笑容。

但突然，他的笑容，好像被誰撕掉，他眼前又出現了那可怕的畫像，這畫像在擴大、在飄動、在上升，星星、月亮全被遮蔽了；它似乎要籠罩一切，但天外的風吹動着，使它波動，而天內的空氣起伏，則似乎要使它裂開。空中似乎還傳來紙的啪啪捲動聲……

他皺皺眉頭，想到自己堅持別人走一百步，自己才走五十步，決不會出什麼差錯，當下強顏一笑，隨後，賊似的閃回他的新居去。

作者附識：關於有人抽簽當了右派的事，乃鐵的事實，絕非虛構。為免誤會，特此鄭重聲明。

胡總書記與韓文公

(中國大陸旅美作家) 王亦令

「韓愈，字退之，諡文公。唐代作家。文起八代之衰，名歷宋元明清而益盛。只在共產專政的最黑暗時期，傳統文化大遭批判，韓愈因其『載道』而被貶尤甚。」

「胡耀邦，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清算極左派，即依以為骨幹，遂任其接班，付以大事。對外採取相對開放政策，對內緩和和高壓專政，有助於國力復蘇，有利於法治和民主的抬頭，有功於後來的全國大一統。」

請讀者諸君保留本刊，一百年後再拿出來對照那時出版的「中國古代人名大辭典」，「韓愈」和「胡耀邦」的兩條注文，大概跟上面我所撰寫的這兩段語意相同。此是後話，現且按下不表。

單表我今天何以把胡總書記與韓文公相提並論。讀者一看本文題目，早就產生疑問了：這兩人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拉扯在一起？並非我硬要拉扯他們，乃是胡耀邦本人願意向韓愈靠攏。

話說當年韓愈謫官潮州，但他不以天高皇帝遠而稍失其愛民如子之心，刻意獎勵農桑，安撫黎庶，尤以「驅鱷」一文膾炙人口，潮人感念其恩德，立祠為祀。這種事，在中國的歷

朝歷代，各州各府，都是屢見不鮮的。到了江山一旦變紅，除了少數「杜甫草堂」之類，或者「明十三陵」「蔣氏墓道」之類，受到中央的別有用心之明令保護，作為某種政策的點綴以外，其餘祠堂皆歸於封建之列，統統的剷除、打倒，韓愈當然更是不在話下。

一晃三十年，大好河山在極左派的糟塌蹂躪下，不堪卒觀，國貧民窮，與世界水平差了一大截，到達了「老百姓無法按老樣子生活下去，統治者無法按老樣子統治下去」的地步，於是，有中與人物出而收拾面臨崩潰的殘局，一改極左派歷年的倒行逆施，處處「對着幹」，興滅國，繼絕世，曲阜的孔子像栩栩如生，杭州的岳武穆廟貌一新，而潮州的韓文公祠也不例外，新供奉一尊凝眸沉思的韓愈，祠堂懸匾，由胡總書記御筆題額：「韓文公祠」。

王子曰：文公立祠，理所應該；中共高抬貴手，不加搗毀，大好事也；但胡氏題字，則不倫不類。

恕我斗膽直言，胡總書記的法書，實在並不那個。偶而對東洋客揮揮毫，小日本自會九十度鞠躬「哈姨哈姨」地拜領墨寶，那是綽綽有餘的，而且也無傷大雅，可優為之。若說一本正經給「韓文公祠」題寫匾額，那就未免有點像俗語所謂「孔夫子門前賣字」「關老爺面

前耍刀」矣；韓文公在天之靈或許會生氣，至少很不樂胃。以言身份，也不相稱。韓愈的祠堂，最宜由飽學碩儒或文人作家來題額，才配。

以上只是從書法和身份立論，這其實只是小不妥而已。下面我要從政治上分析，因為胡耀邦題字原也着眼於「政治掛帥」，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我懂得胡耀邦的用心。他是想乘此機會替韓愈平反、翻案，對古代作家的評價來個空前大漲，從而也為當今的知識份子撐腰打氣，另一方面也向海外遊客顯示中共的大轉變。此乃中共傳統：領導人題字，就意味着對該一事物的權威性首肯。

我認為，如果胡耀邦們真想跟極左派分道揚鑣，真想使中國早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就應該拋棄那種一切以領導點頭或搖頭作為取捨標準的做法。立祠之類的事，不需你們親自插手，你們只需堅決不干涉人們的法權和自由，並且也嚴厲飭戒各級領導不許干涉，就足夠了。老實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各代的歷史人物，其存在皆如日月經天，從來不因中共之批而倒，也決不依賴中共之捧而榮；尊榮自在人心，不在於官方的評價。中共之或批或捧，皆無關傳統文化和歷史人物的痛癢，也無補於當前的國計民生，徒見中共之狗逮耗子多管閒事耳。尤其要不得的是如下的心態：世上萬事萬物的好壞是非，必須由我說了算，我捧什麼老百姓才許捧什麼，我批什麼老百姓跟着批什麼。如果死抱這種心態不放，要想現代化，難矣哉。

此外，對胡耀邦講來，還有一個極需警惕之事。毛澤東當年最喜到處題字，跟他那疊疊

惡蹟相比，這種舞文弄墨四下招搖還不算最壞的惡行。然而，毛澤東在大眾的心目中早已腐臭透頂，儘管胡耀邦們一時之間還需要設詞幫這位偉大陽謀家粉飾功過，在四個堅持中還得把他那臭招牌掛着，這或許是對付那些「人還

政治笑話



兩位清官

泰 恒

一位上訪者從省府大樓裡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守候在門口的朋友急忙迎上前去，關切地問：「你的問題這一次還沒有得到解決？」
「哎！別提了！這些做官的沒有一個不貪財，真正為老百姓辦事的，你一輩子也休想碰到一個。」

「別洩氣嘛！我剛才還打聽到說咱們省有位叫張寶鹿的同志就很不錯，經常幫老百姓解決問題。還說要是他也解決不了，還可以去找他的母親——在中央工作的茅西汾同志。她最樂於幫人解決難題。你不妨再試試。」

「可省府大樓這麼大，誰知道這位張同志在哪个房間辦公呢？」

兩位正商議着，旁邊過來一位彪形大漢，手裡提着一個沉甸甸的大提包，走到他們跟前輕聲對他們說：「要找張寶鹿同志嗎？跟我來。他沒在大樓裡。」

兩位默默地跟着。穿過一條小巷，到了個偏僻處，那位壯漢停住了腳步，把大提包打開放在地上。但見裡面裝滿了該省出產的三種名酒：張弓大麪、寶豐大麪和鹿邑大麪。每瓶標價十五元。

「原來這就是幫老百姓辦事的張寶鹿同志

在，心不死」的左派的權宜策略，但從歷史眼光來看，毛澤東其人必定是越往後越臭，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如尚抱有青史流芳之心，那就必須在行動上儘可能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毛的一切作風和習氣，半點

不用說那位中央的茅西汾同志，一定是茅台酒、西鳳和汾酒啦！」兩位會意地笑了，立即高價買下這三種省產名酒各一瓶，再次上訪去了。
(洞庭)

政治笑話



高度的階級警覺

恒 泰

一對年輕夫婦路過濟南大明湖時，忽然聽見湖邊傳來呼救的聲音。

「不好！有人落水了。我得趕緊去救他！」男士邊脫衣服邊向發出呼救聲的方向跑去。

「別冒險，你不能去！」說時遲，那時快，女士一個箭步衝上前，攔腰抱住她的丈夫。

「快鬆手讓我救他！我的水性很好，你不用害怕我會出什麼問題。」男士極力要掙脫妻子的雙手。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女士雙手抱得更緊。「我是說咱們最好先去外調一下，看看落水者究竟是紅五類還是黑九類？有無海外關係？祖宗八代有無政治問題？再決定是否救他。免得犯喪失階級立場的嚴重錯誤。不然的話，咱們的命運可能比落水者更糟。」(嵩)

政治笑話



一天等於二十年

恒 泰

一個深夜，中共元老陳雲和鄧小平聚在一

也不能沾有，才能在後世心目中維護自己的相對清白，才能使自己的形象在最大程度上免受那位大行主席的污染。這種到處題字的舉動，也應在避免之例。
(甲子冬寫於美國加州棲雲閣)

起商議對付毛幫除黨華國鋒的辦法。兩位為何時對華採取行動爭得面紅耳赤。

「不錯，我們必須消除華國鋒這個隱患。這是毫無疑義的。」陳雲說道，「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這也都怪你把事情搞糟了……」

「什麼？我把事情搞糟了？」鄧小平火冒三丈，「你說這話有何根據？」

「可不是你嘛！」陳雲亦不相讓，「你想想，你說的那個『英明領袖華國鋒同志至少可以帶領我們大幹社會主義二十年』的胡話到今天尚不到兩年，現在就要搞掉他，難道不顯得有些操之過急？我真不懂你當時為什麼要說那樣的混話？」

「什麼？你說老子說混話？」鄧小平火上加火，「我看你是活糊塗了。難道你忘了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正是馬克思所預言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代？你去算算從我說那話到今天，已有多少個二十年過去了？等老子都變成萬歲爺了，還說操之過急！難道說還要等到咱們都去見馬克思時再與華國鋒較量不成？況且你能擔保馬克思那個滑頭到時會站在咱們一方？我看你說的才是混話呢！」

「好了，好了。你真了不起！你簡直就跟毛澤東一樣偉大，我佩服你！」陳雲無可奈何地說，「就按你的意思辦吧。反正按你的公式算來，我最多也活不過半天了。」

雜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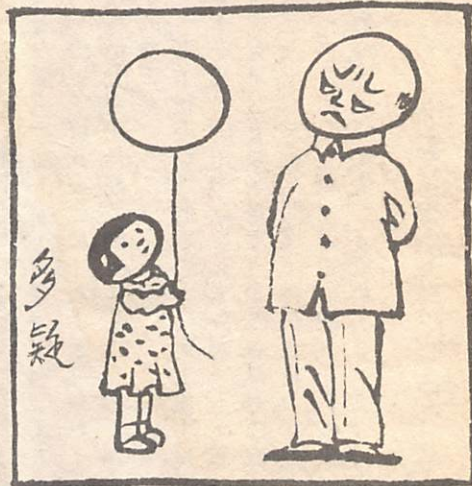
(大陸新移民) 雲中童

用遺傳來解釋

近聞廖承志之子廖暉接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一職。

為何挑選廖承志之子接任此職？難道廖暉果真得到其父之真傳？

看來又不像。因為根據香港「百姓」雜誌的一篇專訪報導，廖暉自稱一向在軍工系統負責技術方面的工作，不大不小也是個團級幹部。但從來沒有接觸過僑務工作，可以說對僑務工作毫無經驗。唯一的經驗就是在家時看過其父批閱的文件。因此，當黨中央需要他擔起這



個重擔時，他感到壓力很大。但「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他還是走馬上任了。當了一段時間的第一副主任作為見習階段，現在他就正式接任僑務主任之職了。——根據「小廖公」夫婦這些自述，我們實在看不出他有勝任此職的根據。

更退一步來推敲，如果廖公當年有意其子將來繼承衣鉢，一定會留他在身邊工作。按照廖公在黨內的地位，想把兒子留在身邊工作是「易過借火」的事。先讓廖暉從僑務辦一個普

通辦事員身份混起，其父又在旁扶持、指導，相信竄升一定會快。況且這樣做，做得自然，更加使人相信其得乃父的真傳。但是廖公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兒子送去軍隊「磨煉」。這一方面反映廖公為兒子的前途打算用心良苦（因廖公積幾十年黨內鬭爭的經驗，知道沒有槍桿子支撐的權力到底是虛置的），另一方面說明廖公並沒有打算把兒子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廖暉得其父真傳的推測也只能否決了。

那麼，中共決策層是根據什麼認為廖暉是勝任此職的呢？或者站在更有普遍性的角度來看，中共是根據什麼來選拔幹部的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來只能從生物遺傳理論來解釋了。

聖人的聯想

不久前，拜讀了國府的海外宣傳品「中華民族四大聖人」。

要問四大聖人其為誰？曰：孔子、朱文公、孫國父、蔣總裁。

我真是對中華民國的臣民既羨慕又嫉妒。請想一想吧！中華民國成立至今這幾十年歷史與中華民族淵源流長的幾千年歷史相比，當然顯得很短暫。但就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中華民國的人民就有幸得到兩位（！）大聖人的直接領導。而我們的祖先幾千年來却從來沒有受到過聖人的直接領導，只是有過時過境遷後的精神領導。因此，炎黃子孫怎能不對這種空前絕後的幸運表示感激涕零，「叫我怎能不歌唱

?!」(這雖是大陸人民當年歌頌偉大領袖的一句話，但用來表達中華民國人民這種莫大幸福感也是很貼切的)

當然，我們大陸的人民在比賽擁有聖人方面也不會甘於落後的。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聖人還是「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現一個」的特種大聖人呢！不過，「我們」

的聖人是不屑於與國府系統的聖人爲伍的。「我們」所擁有的聖人系列是：馬、恩、列、斯、毛。這其中有個特色，就是以洋鬼子爲主，而中國血統的只有一個。在今天的時代——台灣海峽兩岸都風行崇洋媚洋的氣氛下，「我們」大陸的聖人系列因爲洋鬼子多，當然更應吃香(實際上是是否吃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敢

計劃生育與異化

(香港中學生) 白逸鴻

王若水和周揚說了一句：「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結果，不是換職，就是作檢查，可見其罪不小。可是，正當胡喬木先生勸他們走出「死胡同」時，我竟在這昏暗窄小的「死胡同」裡，窺見到社會主義社會不但有「異化」，而且還在繼續加速「異化」之中。比如，中共至今仍在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到一定的時間，我們就可看到它所收到的惡果。

再過三五年，通過計劃生育來提高人民健康，將成爲絕望。十個有了第二個孩子的父母，恐怕有五個以上要到醫院作「常客」，這是結紮手術帶來的後遺症。至於國家本身要拿出多少錢來醫療這政策的後遺症，那更是無可估量的。

再過三四十年，由於男女比例的不平均，社會會因婚姻問題而混亂，到處都是「王老五」；輕女重男的封建時代觀念又可能「異化」成重女輕男的「原始社會觀念」。大概「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還原到原始社會的母系時代吧，那就不能怪人們說它「共產共妻」了。

再過五十年，鄧大人早已作古，蓋棺定下的論，恐怕是由他想像的「流芳千古」，「異化」成爲「遺臭萬年」。計劃生育帶來了那麼多問題，還能不遺臭萬年嗎？

諸位，筆者在此，決不是反對他們的宏大目標。可是，利用強硬的違反科學的手段是不可能實現美好的願望。這與毛澤東當年的「萬畝田」、「大煉鋼」的盲動性又有什麼不同呢？這些都是「異化」的根源。

胡說八道)。

雖然台海兩岸的聖人及聖徒時常有對罵動粗的時候，表現不出聖人的風度，但是我們都要正視及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全中國人民——無論大陸人民還是台灣人民——在最近的短短的幾十年中，就有幸親身接受過聖人的直接教導。這真是幾千年才有一次的機會，但却給我們這代人遇上了。那麼，得到了這種空前絕後的幸福，我們還需要追求其他什麼嗎？我們應該知足了。

但是我有一點深感不解的是：由聖人直接治理的社會，理應是昇平盛世，百夷來朝，爲何偏偏是民怨載道，百族侵凌？不信嗎？請看看史實吧：中華民國先後有兩位聖人的直接領導，但却是先給外族入侵，後給家奴欺凌，被趕到海島一隅苟喘偷生；在這幾十年間，大陸是給一位毛聖人治理，但也是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而我們祖先時代的聖人，沒有一個直接出來治理過國家，反而每一個王朝都有好幾百年的歷史。

這是爲什麼？

經過這種對歷史的反省、推敲，我認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聖人，最好不要出來直接治理社會，最多等自己死後做個遙遠虛無的精神領袖便該滿足了。否則，自己熱心獻身的社會反而因福得禍，命不久矣。這可能是因爲聖人的直接領導過於英明，相比之下，人民的智慧過於蠢鈍，不能理解聖人的偉大之處，不能緊跟聖人的「偉大戰略部署」，反而弄巧成拙。我想，這大概也是「物極必反」的道理吧！

徵求盟徽啓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公開徵求盟徽，要求如下：

一、體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及多元的精神；

二、體現民族風格；

三、簡單易記。

錄取者將給予二百美元酬金，贈送全套中國之春雜誌，並成為中國之春雜誌特別榮譽訂戶。盟徽草案請寄本刊通訊處。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元月廿五日

增設信箱啓事

由於來信、來稿日益增多，原總部及編輯部信箱已不夠用，現增設另一信箱：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請各位盡量採用上述新的信箱。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元月廿五日

本刊徵求特別榮譽訂戶並出售全套雜誌

尊敬的讀者：

值本刊創辦兩周年之際，本刊編輯部為解決財經困難，決定徵求特別榮譽訂戶，並出售從創刊號至二十期全套中國之春雜誌。

一、凡繳納一百美元以上者，均列為本刊特別榮譽訂戶。本刊除永遠寄送雜誌及有關印刷品外，還將呈送一份「中國之春特別榮譽訂戶證書」，以為存念。

二、本編輯部存有一定數量的逾期雜誌。現特出售從創刊號至二十期全套「中國之春」，連郵費在內，北美地區三十美元，港澳地區一百港元。世界其它地區三十美元，另加郵費（空運三十美元，海運四美元）。全套雜誌為數不多，請速來函。

此致

敬禮！

中國之春編輯部 1985.1.25

祝賀創刊兩周年

回執單

中國之春編輯部：

我願 1) 成為中國之春榮譽訂戶，現寄上_____元；

2) 購買從創刊號至第二十期全套中國之春雜誌，現寄上_____元。

我的地址為

此致

撰安！

1985年 月 日

請您訂閱中國之春

訂費 (每年)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地址：英文 _____

機關：60美元(半年30美元) 200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半年12美元) 72港元

中文 _____

學生：18美元(半年9美元) 60港元

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總 _____ 期) 開始

加郵資：航空：10美元 平郵：5美元

中國之春

感謝各界捐款人士

中國之春雜誌自第十七期起向各界徵求捐款以來，得到了各界鼎力支持，至今為止，共收捐款美金 8932 元，加幣 430 元，荷幣 100 盾，我們在此向各捐款人致以深摯的謝意。

中國之春編輯部已利用此筆捐款購置了一台可放大縮小的影印機為 Toshiba 的 BD-4515 型，共價 2190。剩餘之數已移作印刷和捐款人指定用途。

現將捐款人芳名列後：

M H Chang	\$20	C Y Lee	\$150
W Ho	\$100	C Y Lee	\$20
C F Chueh	\$150	L Lie 以柏楊精神捐	\$100 (荷幣)
Y W M Lou	\$100	E C Su & H J Su	\$20
Dr. C Lee	\$30	E Tsai & Y L Tsai	\$50
T Y Gee	\$60	G F J Mo & P Z Shan	\$50
H C Len	\$100	H P Lau	\$100
C Hew	\$50	J Sin	\$20
H K Chung	\$60	Dr. I T Chao	\$300
B Ho	\$50	P T Y Sung	\$400 (加幣)
H Y Mui	\$100	A J Gregor	\$25
H N Tam	\$50	K H Hsiao & M M Hsiao	\$10
C H Kuo	\$10	J Bates	\$30 (加幣)
C Y Wong	\$20	R. Yang, Jr.	\$100
C M Cheung	\$100	R Y Jr.	\$100
W Kazer	\$40	F T Fand & M L Fang	\$125
W T Wang	\$20	F Chen	\$26
D H Huang & B King	\$20	Y Chao	\$28
B M S Wong	\$200	P S Lee	\$20
M C Hsu & R R Hsu	\$30	M Siu	\$26
		R Yang	\$12

另無名氏捐款共 26 筆，計 6440 元。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港澳聯絡站：

1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
好望角大廈 21 樓 3 E 2 室
電話：3 - 31838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便局
四十六號信箱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G.P.O.Box 376
Melb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洲雪梨支部聯絡信箱：

P.O.Box K522, Haymark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9505
4800 Bielefeld 1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020-999037

歐洲比利時聯絡站：

P.B. 246
5000 Namur Belgium

非洲毛里求斯聯絡站：

已成立，聯絡暫經總部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P.O. Box 23 Station G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4M 3E8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Postal Station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A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1827 Haight St. Box 100
San Francisco, CA 94117
Tel: (415) 621-2513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Box 67 A 84
L.A., CA 90067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Mr. Bell M. S. Wong
9453 Cloverdale CT.
Burke, VA 22015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42821, No. 806
Houston, TX 77042 Tel:(713)879-7107

美國亞利桑那州暨圖桑聯絡站：

P.O. Box 42561 Sun Station
Tucson, AZ 85733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總部聯絡信箱：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月刊(中文版)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國)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港) 中國之春書屋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
好望角大廈 21 字樓 3 E 2 室

■電話：(美國) (718) 429-6777
(718) 507-6442

(香港) 3-318387

■定價：(美) 2.00 美元 (加) 2.00 加幣
(香港) 6.00 港幣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FLUSHING, N.Y. ≡
≡ PERMIT NO. 355 ≡

ISSN 0735-8237

Lee, T.P. 19-25#8444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